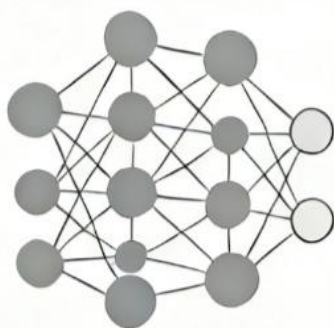


资本的当代升维

从生产资料到劳动力生产的支配革命

著：张皓翔



作者简介：

姓名：张皓翔

单位：河南省南阳市第五完全学校高中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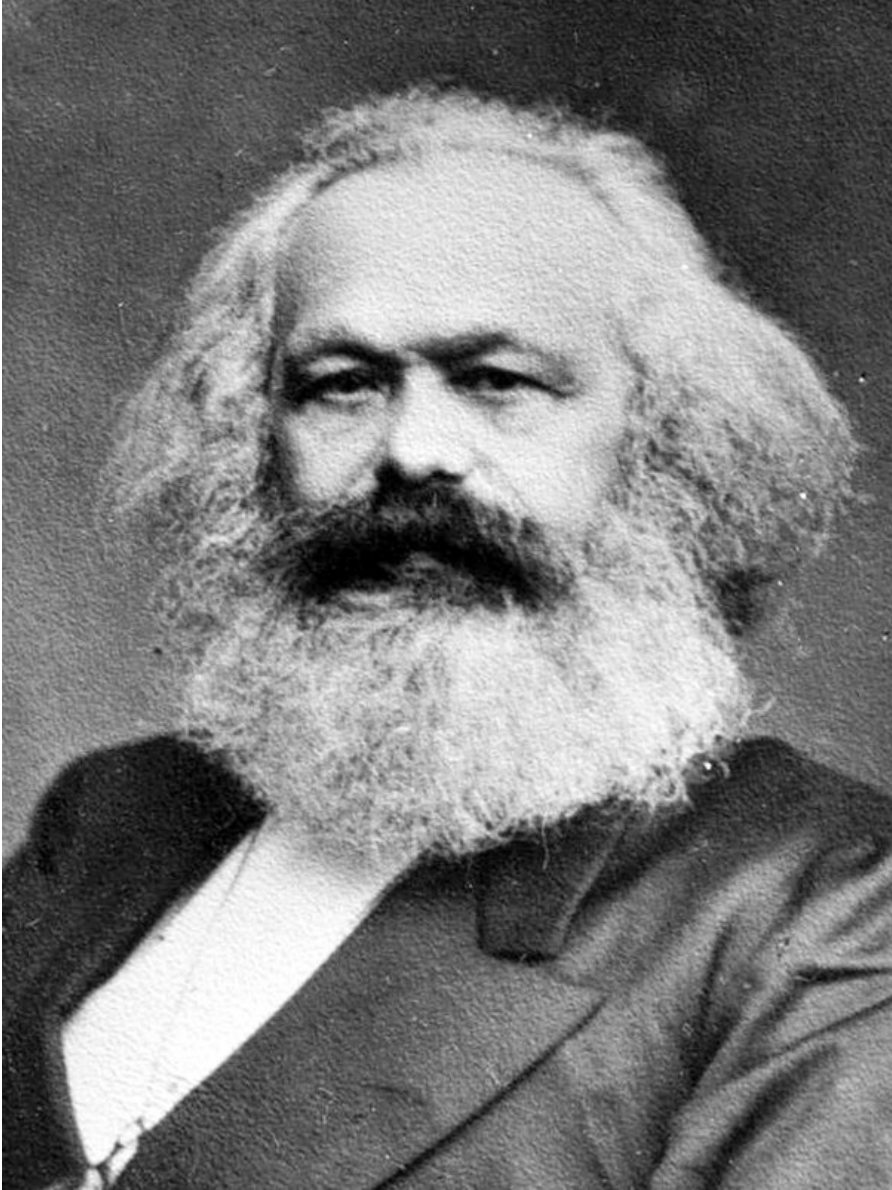
邮箱：nyzhanghaoxiang@outlook.com

ORCID: 0009-0001-2997-7726

本书 DOI: 10.5281/zenodo.18244088

其研究始终源于对时代症候的困惑：为何在技术昌明、物质丰盈的今天，一种深层的无力感与生命被系统性安排的倦怠，却成为普遍的体验？他的工作横跨文化、教育及技术伦理等领域，尝试追踪这一核心问题在不同生活场域中的显现。

本书是这项长期探索的一次系统尝试。通过构建“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这一分析框架，本书试图揭示：从教育内卷、工作异化到生活数据化，诸多困境共享着同一个经济根源——即数字资本对生命再生产全过程的殖民。它不满足于现象描述，而是致力于为理解当代支配与寻求解放，提供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学解释坐标。





前言

本书并非诞生于书斋中纯净的逻辑推演，而是根植于一代人具体的、弥漫性的生命体验。它是一种在“内卷”中耗尽的疲惫，是被算法与绩效无声规划后的空虚，是目睹自己的生活、教育乃至休闲被悄然编码为某种外部价值数据时的深刻不安。这种体验并非特定行业的困境，而是遍布从校园到职场、从生产到生活所有场域的普遍气候。当一个尚未正式踏入传统“生产”领域的学生，也已然清晰感受到这种被设定、被优化的压力时，它所揭示的便不再是个体的脆弱，而是一个时代的核心病症：资本的支配逻辑，已经完成了其决定性的“升维”，从对“生产领域”的垄断，扩张为对“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全过程”的系统性殖民。

既有的解释框架在此时显出了它们的乏力。无论是将问题归结为个人心态的文化批判，还是停留于技术宰治的现象描述，都难以触及那驱动着一切形式规训的经济学内核。当权威的理论图景无法标定我们切身痛苦的坐标时，探索便成了唯一的出路。因此，本书是一项自觉的、从生命体验的荆棘地中反向开凿的理论工程。它的作者并非学术建制内的权威，而是一个在窒息感中挣扎，并执意要为自己的世代寻求根本答案的探索者。这一看似“边缘”的位置，恰恰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批判视角：它迫使我们剥离术语的遮蔽，直视生存本身的灼热；它让我们无可回避地重返那套最古老、也最锋利的批判武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并尝试用它在数字时代的断面上，刻下新的诊断。

由此，我们构建了贯穿全书的核心分析框架：“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掌控能力—生产完整性—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的三元辩证联动。这一框架是我们剖析当代支配形式的“手术刀”。我们将首先追溯这一支配结构的历史生成（第一章），随即运用它来重构当代的阶级图谱、揭示剥削如何从“价值占有”深化为“生命过程殖民”、并演绎异化链条的完整生成逻辑（第二章）。基于此，本书将提出一个核心论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已表现为“社会化大生产对劳动力商品化的系统性生存依赖，与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全过程的资本主义私人掌控”之间的致命悖论（第三章）。随后，我们将展开一幅“全景敞视”的图景，具体呈现资本如何通过教育系统、工作伦理、算法治理以及数据提取，在教育场、工作场与生活场中完成对整全生命的精密编程（第四章）。

而本书的归宿，绝非止步于批判。诊断的终点，是治疗的开端。在第五章，我们将指向解放的实践纲领。我们论证，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必须包含两个不可分割的阶段：首先是政治革命，夺回生产资料，粉碎维护旧有生产关系的国家机器；其次是更为深刻的社会革命，目标直指“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即在教育、健康、时间安排与个人发展等关乎生命再生产的每一个领域，重建劳动者的自主性与集体主权。这一纲领，既是对资本主义的终极超越方案，也是对一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因旧法权残余与未竟革命任务而仍在经历异化的社会所提出的、持续自我革新的内在要求。

最终在第六章我们将视角回返至理论本身——直面“当代政治经济学的贫困”这一核心命题：当数字时代的批判话语常陷入文化、心理等“悬浮式分析”时，本章以全书构建的“三元辩证框架”为锚点，对当代批判理论进行系统性收编与整合：

一方面，锚定“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掌控-生产完整性-劳动力生产掌控”的底层逻辑，为文化异化、心理规训等现象找到政治经济学的根源；另一方面，通过这一框架的统摄，让分散的批判视角重新回归“资本-劳动”的核心矛盾，既回应了当代理论的碎片化困境，也为数字时代的批判研究重建了政治经济学的根基。

本书的写作，始于一种切身的困惑与痛苦，但它的抱负，是成就一种冷静而彻底的理论清晰。它试图告诉每一位读者：你所感受到的无力与烦躁，并非个性使然，而是资本逻辑在生命政治层面运作的客观效果；而你所渴望的自主与完整，也绝非空想，它必须通过对那种将人贬值为“劳动力商品”的全部社会经济关系的根本改造来实现。

全世界致力于夺回自身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的劳动者们，联合起来！

张皓翔

2026年1月15日

目录

第一章：历史起点与核心范畴

- (一) 从资本的原始积累到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形成
- (二) 三元辩证联动分析框架

第二章：阶级、剥削与异化

- (一) 阶级定位之重构：基于“劳动力生产掌控权”的新图谱
- (二) 剥削形式之深化：从价值占有到生命过程殖民
- (三) 异化链条之完成：四种异化的整合与异化的新发展

第三章：基本矛盾的当代重构

- (一)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
- (二)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重构
- (三) 理论定位：矛盾重构的唯物史观根基
- (四) 资本主义的自我升维

第四章：全景敞视：生命三个领域的编程与失权

- (一) 教育场：从“人的培养”到“人力资本的训练”
- (二) 工作场：从“职业约束”到“算法设定的丧失”
- (三) 生活场：从“社会规训”到“闲暇与数据的失控”
- (四) 结论：被围困的生命与解放的出路

第五章：夺回掌控：无产阶级解放的两阶段纲领

- (一) 第一阶段：政治革命——夺回生产资料与粉碎国家机器
- (二) 第二阶段：社会革命——夺回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
- (三) 革命主体的重构：在历史辩证法中锻造解放的先锋与根基
- (四) 统一战略：无产阶级革命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 (五) 历史辩证法的统一——从资本主义批判到社会主义的自我革命

(六) 关于劳动力商品化的几点补充

第六章：权力的解放

- (一) 权力的来源
- (二) 权力异化的防御

第七章：政治经济学的贫困

- (一) 与“生命政治”的根本分野
- (二) 收编手术：在政治经济学的光源下透视“悬浮批判”
- (三) 告别贫困：以政治经济学锚定批判理论的解放航向

结语：在历史辩证法中迈向人的解放

附录

- (一) 历史发展定点论——为一切总体批判的辩护
- (二) 辩论
- (三) 金句汇编
- (四) 注释

宣言

一种深刻的失控感，正在全球的劳动者中蔓延。它不是对贫困的恐惧，而是对自身生命被全面编程、被系统性安排的无力。从绩效考评到算法设定，从学习教育到工作生活，无一处不透露着这种对自身劳动力生产过程的掌控能力的丧失。

有哪一位学生，不曾因自己的热爱与未来的生计而矛盾？

有哪一位劳动者，不曾因每日看似自主、实则被事工的工作而疲乏？

又有哪一位社会个体，不曾因内心之所想与社会的外在要求而挣扎？

旧世界的一切力量——学者、官僚、家长、资本家——都试图将这种痛苦归因于个人的软弱、懒惰或选择失误。然而，从遍布全球的症候与挣扎中，我们只能得出一个判断：在资本逻辑扎根之处，一个自我指涉的、致命的循环已然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赖以存续的体系，必须不断消耗它企图永久掌控的对象，即劳动者生产与再生产自身劳动力的能力。

面对这种将生命过程殖民化的统治，一种同样彻底的回应，正成为历史的要求。它的纲领，可以凝聚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命令：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

第一章：历史起点与核心范畴

(一) 从资本的原始积累到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形成

当资本的号角刺破旧世界的穹顶，土地、金银、矿产，乃至人类社会里最独特、最稀有的生命，都如潮水般向资本盘踞的区域聚拢——这看似壮丽的征程，底色却是浸满血腥的暴力。

资本的拓荒者站在圈占的沃野上高歌时，世代耕作的农民正背着行囊，在异乡的风里漂泊；当他们立在大西洋的潮头举杯时，贩奴船的舱底里，非洲黑奴的呜咽挤不出半寸落脚之地；当他们踩在殖民地的土地上高呼“自由”，漫山遍野的罌粟花，早把罪恶织成了利润的罗网。

他们口中的“壮举”，是世界人民的悲歌。而这段用剥夺写就的历史，既是资本主义升维的起点，也是研究其本质的必答命题：它是人类文明在物质生产上的突进，更是文明在道义与尊严上的折堕。

而这段历史，这段叫做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不仅深刻地造就了当时劳动者的普遍困苦，甚至藏着今天我们每一位劳动同志普遍无力的历史根源。而这一切，都要追溯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部奥秘所根植的那个基本事实——劳动力商品化[1]。

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一转变并非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一场以“资本的原始积累”为名的历史性断裂。所谓原始积累，其本质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强制分离[2]。在英国，它表现为一场持续数个世纪的“圈地运动”：地主与新贵族通过立法与暴力，将公共土地与农民份地变为私人牧场。被驱逐的农民不仅失去了生活来源，更丧失了他们作为独立生产者的全部根基[3]。与此同时，海外殖民掠夺为欧洲带来了巨量金银与原始资本[4]。这一进程的结果，是塑造了彼此对立的两个阶级：一边是集中了土地、货币和生产资料的少数人；另一边是数量庞大的、被剥夺了一切、只剩下自身劳动能力的“自由”劳动者[5]。

正是这种“自由”的双重性——既摆脱了人身依附，又自由得一无所有——使得劳动力普遍地转化为商品成为可能与前提。出卖劳动力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生存的唯一出路[1][5]。当劳动者在市场上将自己的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出售时，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发生了：他的劳动不再是为了直接生产使用价值，而是为了换取工资；支配其劳动过程的不再是自身意志，而是购买其劳动力的资本。劳动力商品化，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雇佣劳动关系——的诞生。

这种新关系彻底改变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性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主要服务于所有者的个人劳动与消费。而在雇佣劳动关系下，生产资料所有者购买劳动力进行生产，其目的不再是使用价值，而是价值的增殖。生产资料由此转化为资本，其私有制也相应转化为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一种以占有并支配他人劳动、剥削剩余价值为核心的所有制形式。

因此，从原始积累的暴力剥夺，到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枢纽转变，再到资本主

义私有制与雇佣劳动相互锁定的生产关系的确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与逻辑链条。它清晰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阶级结构、矛盾与运动，都建立在“劳动力是商品”这一基石之上[1][6]。

而如今随着算法、平台等资本新形态的出现，劳动力商品化[1]这一基石所蕴含的潜能，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释放和放大。数字资本展现出三大与传统工业资本迥异的根本特性，迫使我们的分析视角必须发生双重转变。但这一双重转变，最后又指向了同一个结果。

第一，灵活性与动态性：即生产与资本流动的高度灵活性。在传统资本形态中，生产与资本流动在根本上是相对静态的。生产在固定场所、固定时间、按固定流程进行；即便在流通领域，也主要表现为商品在物理空间的位置转移。然而，数字资本彻底颠覆了这种时空结构。它的生产可以瞬时发生、全球协同、24小时不间断；其流通以光速在虚拟网络中进行，资本的形态（从数据到算力到金融衍生品）转换也瞬息万变。这种极致的灵活与动态，使得将生产资料简单理解为厂房、机器等“静止之物”的视角，已无法把握资本运动的真实脉搏。

第二，虚拟性：即资本形态与价值创造的虚拟性。这不仅是指生产资料从车床、流水线等实体的生产资料变成了数据、算法和平台协议等虚拟的生产资料，更深层的在于价值创造与价值载体本身的虚拟化。在工业时代，价值凝结于钢铁、棉纱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制成品之中。而在数字时代，价值越来越体现为访问权、注意力时长、网络效应、乃至对未来数据变现能力的预期。价值日益脱离厚重的物质实体，悬浮于由代码和共识构建的虚拟空间。固守于“实体生产资料”的传统分析，在面对平台经济时，便显得日益狭隘与滞后。

第三，泡沫繁荣性：即资本积累的泡沫化繁荣特性。当代数字资本的繁荣景象，往往由金融市场的估值游戏、用户增长的神话、以及流量的垄断性支配所驱动，而非基于实体产品的稳定利润。这种繁荣具有强烈的投机与泡沫化特征，资本积累的过程与实体经济的支撑之间出现了深刻的断裂。若仅仅着眼于对这种泡沫繁荣的文化解读（如“内卷”心态）或时间批判（如“社会加速”），则极易浮于表面，无法触及驱动这一切的资本逻辑内核。同时也警惕我们，如果仅将从实体生产资料的传统的视角转变为数据、平台等虚拟的生产资料这一视角的话，不仅无法克服传统视角的局限，甚至还会被这种泡沫繁荣性所迷惑。

这三种特性，共同向我们的批判理论发出了不容回避的挑战与召唤。

· 其灵活性与动态性，要求我们的视角必须从静态的“物”转向动态的“过程”，从对固定生产资料的占有，转向对流动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掌控分析。

· 其虚拟性，要求我们的视角必须从有形的“实体”跃升至无形的“关系”与“能力”乃至是“潜能”，追问在虚拟空间中，何种新型权力架构在组织生产与分配价值。

· 而同时，其泡沫繁荣性也要求：如果我们不能穿透繁荣的泡沫，追溯价值与权力的终极源泉，任何分析都将沦为对表象的描述。

于是，一个看似矛盾的视角转换要求摆在我们面前：一方面，我们必须“升维”——将分析提升到更动态、更抽象、更关乎“过程”与“能力”的层次；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复古”——穿透所有新技术与新形态的迷雾，坚定不移地回归到政治经济学最古老、最坚实的问题：价值从何而来？权力因何而生？

答案，最终共同指向了那个未曾改变的根本：劳动力[1]，以及对其生产过程的掌控。数字资本的一切新特性——其动态的调度是为了更高效地榨取活劳动；其虚拟的价值源头依然是人类注意力、创造力与数据化劳动的凝结；其泡沫的基底仍是社会总体劳动时间所支撑的剩余价值生产。变化的只是支配的形式与技术，不变的是支配的实质与对象。

因此，我们的理论重构，恰恰需要从这组围绕“劳动力”及其“掌控”的核心范畴开始。

(二)三元联动辩证分析框架[7]

在确定了“劳动力”与“掌控”为核心的范畴之后，我们需要围绕他们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而在真正的构建分析框架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界定几个核心概念。

(I). 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掌控能力

指行动者在既定生产关系中所处客观地位赋予其对生产资料（土地、工具、机器、数据、平台、算法等）进行功能性支配与运用的可持续潜能。它是决定生产过程中权力关系的结构性基础。

(II). 生产完整性

指劳动者能够相对独立地完成从意图构思到产出完整商品的全过程，并亲身见证劳动对象化于最终产品之中的劳动状态。它是“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掌控能力”在劳动过程中的直接外显与现象学表征。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此值得一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资本家先垫支了劳动力的价格[8]。而后工人在资本家的支配下进行劳作。进一步的说，劳动者对劳动力的生产必须依附于资本家，依附于对生产资料绝对控制的个人和组织。否则没有了资本家垫支的劳动力价格，劳动者无法完整的，独立的生产自身的劳动力，所以劳动者仍然是丧失了生产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完整性的。简单的说，劳动者不是先生产出劳动力之后再到市场上进行售卖的。而是只有当别人（资本家）购买了他还未生产的劳动力之后，他才能在别人的支配之下生产这个特殊的商品。因此劳动力这一特殊的商品仍然适用于我们的生产完整性。

(III). 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

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是指劳动者基于其主体性，对自身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包括其生产（技能习得与塑造）、维持（身心再生产与健康）、发展（能力升级与转型）、部署（时间安排与劳动投入）以及产出（劳动成果与衍生数据）——拥有自主界定权、过程主导权与成果处置权的根本潜能与制度性权利。

该能力包含三个不可分割的层面：

① 个体潜能层：劳动者实际具备的、可迁移的自主安排其劳动与再生产的技能与意识。

② 社会权利层：由社会制度保障的、免于资本强制而自主决定劳动条件与生活节奏的法定权利（如工时、休假、数据隐私）。

③ 集体权力层：劳动者通过组织化形式，对影响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条件（如教育体系、医疗资源、平台算法）行使民主共决的能力。

其本质，是劳动者与资本之间围绕“生命过程主导权”的斗争核心。资本积累逻辑必然试图将这一能力压缩为一种适应性的、商品化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而解放政治的目标，则是将其恢复并发展为一种完整的、创造性的“生命主权”。因此，该能力的存废程度，是判断劳动者异化深度与解放可能性的终极标尺。

需要特别阐明的是，本文提出的核心范畴，尤其是“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其力量正在于其辩证的、关系性的本质，而非一种可被标准化度量的静态属性。它旨在揭示一种权力关系的存在状态与变化方向。正如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并非为了给商品定价，而是为了揭示拜物教秘密一样^[9]，本框架的目的在于剖析“掌控”与“丧失”的动态博弈结构，为理解阶级形成、剥削升级与异化蔓延提供一种定性而非定量、辨势而非计量的批判性分析工具。将其僵化为指标体系，本身即是对其辩证精神的背离。

这三个范畴之间存在着严密的辩证联动关系，构成了一个逐层推进的解释框架：

· 第一联动层（历史性剥夺）：丧失【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掌控能力】(I)→ 导致丧失【生产完整性】(II)

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原始积累）核心在于系统剥夺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掌控能力】(I)。这一结构性剥夺的直接后果，便是劳动者【生产完整性】(II)的普遍瓦解。农民失去土地，便无法独立完成耕作循环；手工业者脱离工具，便不能产出完整产品。此联动清晰地解释了古典工业化时代异化的生成逻辑：生产资料支配权的转移，必然外显为劳动过程的碎片化与产品控制权的丧失。

· 第二联动层（本质性转化）：丧失【生产完整性】(II)→ 标示丧失【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III)

【生产完整性】(II)的瓦解并非终点，而是更深刻转化的症候。它标志着劳动者【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III)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异化。这是因为，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生产”与“消费”（即劳动过程）在时空上不可分割。当劳动者因【生产完整性】(II)的瓦解而无法在自主的生产中“消费”自身劳动力时，他唯一能实现的“生产”，便只能是在出售后、在资本的支配下进行。于是，他对自身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III)，便从一种完整的、指向使用价值创造的潜能，被异化为一种残缺的、仅指向交换价值实现的商品化潜能。其唯一出路是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此时，该“能力”便从一种完整的、自主的潜能，被压缩并扭曲为一种商品化的、依附性的形式潜能——即只能在市场规则下出售自身劳动力的“能力”。因此，生产完整性的状况（存续、瓦解或畸变），是判断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掌控能力实质（自主还是异化）的关键现象学指标。

· 第三联动层（当代性深化）：丧失【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III) 成为支配核心场域

在当代条件下，资本的支配逻辑实现了关键性跳跃：它不再满足于仅剥夺【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掌控能力】(I)并利用【生产完整性】(II)的瓦解，而是将矛头直接指向并系统性地殖民【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III)本身。这是因为，

当物质生产资料 (I) 的控制趋于稳定且全球化分布后，资本的增殖焦虑必然转向对“活劳动”的更深层挖掘——即对劳动力生命过程本身的精细化、全方位提取。通过算法调度、弹性雇佣、绩效监控与生命政治治理，资本意图精细掌控劳动力的再生产节奏、技能开发方向、身心状态乃至闲暇时间，从而在更深处剥夺劳动者的自主性。至此，我们完成了“历史逻辑”的勾勒。然而，资本主义的统治绝非一次性的历史设定，而是一个持续的再生产过程。在当代，一个更为深刻的辩证反转正在发生：资本对【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III) 的系统性殖民，不再仅仅是【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控制能力】(I) 与【生产完整性】(II) 丧失的被动结果，反而跃升为能动地、持续地再生产出后两种丧失状态的核心机制与动力源泉。这意味着，对资本真正统治的分析，必须将焦点置于【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III) 的特定丧失形式上。

第二章：阶级、剥削与异化

(一) 阶级定位之重构：基于“劳动力生产掌控权”的新图谱[10]

在我们掌握了分析的利器之后，解析便告开始。若要理解当代资本社会的真实图景，就必须首先理清阶级的划分。阶级分析，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主线，是考察一切经济关系的本质，更是明确我们自身处境与斗争方向的关键。不能清晰地把握阶级，就无法彻底洞察社会的结构与运动的根源。

然而，既有的阶级理论——无论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占有”论[11]，还是马克斯·韦伯的“财富-地位-权力”分层范式[12]——在今日都显出其局限。前者受制于其所处时代的生产力形态，难以完全涵盖数字时代生产资料（如数据、算法）的复杂占有形式；后者则因其根本的方法论缺陷，导向了去立场化、去实质化的表象描述。

因此，我们的批判须从韦伯范式开始，且必须超越简单的标签化否定，直指其理论内核的不彻底性。

马克斯·韦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未忽视“财富”这一经济因素[12]。但其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他迅即将“财富”与“地位”、“权力”这些本属上层建筑的范畴并置，视为多元、平行的划分标准。这种做法，在方法论上模糊乃至消解了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其结果，是使分析停留于社会表象的多元描述——描述谁更有钱、谁更受尊敬、谁更有影响力——而未能像历史唯物主义那样，穿透这些表象，去揭示其下层根本的生产关系与剥削实质。因此，韦伯的理论纵然不是唯心主义的，却也绝非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

这种理论上的不彻底性与暧昧性，并非偶然的学术偏好。其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了他的理论即使包含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仅仅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单个资本家”与“整个资产阶级”的矛盾那样，是一种资产阶级长远阶级理性的体现[13]。它如同一套精密的“社会气候学”，旨在诊断风暴以更好地加固房屋，是一种为维护制度长治久安而进行的内部预警与系统调适，而非为被剥削者提供一套能够揭示其真实处境、从而颠覆这一秩序的革命性分析工具。

它解释了不平等，却回避了剥削；它描述了分层，却模糊了对抗；它诊断了冲突，却消解了革命。在韦伯的范式下，阶级被化解为“阶层”，斗争被淡化为“流动”，资本主义的矛盾被转化为可管理的技术性问题。而这，恰恰是我们必须突破的理论幻象。

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根本立场的前提下，推进阶级分析的标准。我们不仅需要问“你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更要追问“你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掌控着什么？”——不仅是对物的支配权，更是对自身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自主权。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绘制出一幅既能穿透历史，又能照亮当代的、真正属于劳动者的阶级图谱。

那么，我们为何又说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占有理论[11]具有其时代局限性？这绝非是对其革命性与科学性的否定，而恰恰是遵循其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必然结

论——任何理论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需随历史条件的发展而发展。

前文已指明我们所需的两重视角转换：一是“升维”，要求视角向更动态、更抽象、更注重过程联动的方向演进；二是“复古”，即穿透一切新形态，坚定不移地回归“劳动力”这一价值与权力的终极根源。正是在这两方面，马克思受其所处蒸汽时代生产力具体形态的制约，其经典理论的展开方式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若以图像喻之，传统阶级理论——无论是马克思的二元对立，还是韦伯的多元分层——其图像模式更接近“点状分布”。每个阶级或阶层在图表上对应一个乃至多个相对静止、孤立的点，阶级间的流动是点与点之间的“跳跃”，关系是相对外在对立的。这种模型在分析结构相对稳定、生产资料形态相对固化（土地、工厂）的工业社会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图景中，这些“点”本身变得模糊、流动且相互渗透。一个程序员可能同时是小额股权持有者（微小的生产资料占有者）、高级雇佣劳动者、个人数据生产者乃至零工平台上的接包方。其阶级位置不再是一个静止的“点”，而是一个在多种属性间动态滑动、充满内部张力的“状态区间”。此时，点状模型便显出其僵硬与局限，它难以描述那种持续存在的、系统性的依附状态，也难以捕捉那种形式上拥有一定掌控权（如专业技能）、实质上却丧失总体支配权的矛盾体验。

因此，我们必须将视角从“点”转向“线”乃至“场”，用更具连续性与动态关联的“曲线”来描绘阶级光谱。这条曲线的横轴，是“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掌控能力”的强弱连续统；纵轴，则是“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的自主程度。每个人在这张动态图谱上的位置，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点，而是一个受其技能、契约、数据权利、集体谈判能力等多种变量影响的、可能随时间波动的位置。

而构建这条“曲线”的坐标系原点与基准线，正是“劳动力”本身。“升维”要求我们关注曲线的形状与波动——即掌控能力的具体实现形式与动态变化过程；“复古”则确保我们永不忘记，所有波动都围绕着“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这一中轴发生。一切的“能力”，最终都指向对自身或他人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支配潜能。

于是，我们便得以运用前文奠定的“实际掌控力—生产完整性—劳动力生产掌控权”这一核心框架，对阶级进行一场既接续经典、又直面当代的划分与阐释。这不再是简单的标签更换，而是一次分析范式的升级：从静态的占有关系诊断，跃升为动态的掌控过程批判，并最终将一切问题的根源，锚定在生命过程的主导权斗争之上。

而要分析阶级，就必须直面经典的两大议题，与当代的四大主体。

先说经典的两大议题。

第一，是如何在理论层面透彻地阐述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所提出的“半无产阶级”这一关键范畴[14]。这绝非一个单纯的历史考据问题。它犹如一剂犀利的“药引子”，能够帮助我们刺破当代社会经济分析的诸多迷雾。

第二，是如何基于我们的新框架，根源性地解释经典理论中不同阶级所固

有的、截然不同的阶级属性。例如，无产阶级何以具有其彻底的革命性？资产阶级在历史关键时刻又为何往往表现出其动摇性与妥协性（软弱性）？这些属性绝非凭空产生或道德评判，它们必须从更深层的、物质性的生产关系中寻找答案。

厘清了这两个经典议题，我们便获得了穿越历史烟云的望远镜。接下来，才能运用这打磨好的理论透镜，去精准对焦并剖析当代的四大主体，绘制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而复杂的阶级图谱。

首先是第一个议题。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极具创造性地运用了“半无产阶级”这一概念，用以精准描绘半自耕农、贫农与佃农等群体[14]。在中国“双半社会”的历史语境下，这些农民群体就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利而言，与城市工业工人并无二致，甚至在生存条件上往往更为恶劣。若仅从经典理论——如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占有”或马克思·韦伯式的“财富-地位-权力”多元分层范式——的外部特征审视，他们无疑应被归入“无产阶级”的宏大范畴之中。

但如果我们运用前文所确立的三元辩证分析框架[7]来审视，则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是“零掌控”的典型。他们与生产工具彻底分离，被囚禁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某一孤立环节，无法独立生产出一辆汽车或一部手机。他们的劳动被深度碎片化，“生产完整性”被彻底瓦解。同时，由于他们必须自由地出卖自身劳动力，其“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也从根本上被剥夺——他们无法自主决定劳动的内容、节奏与目的。

而毛泽东同志所论的“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贫农与佃农——则完全不同[14]。他们或许不占有土地，或仅占有极少土地，但关键在于：他们并不完全依靠出卖自身劳动力为生。他们在劳动安排上仍保有一定自主权，能够相对独立地决定种植何种作物、何时耕作以及如何安排农事。换言之，他们可能对生产资料的“法律或事实占有”很弱，但由于其劳动力尚未完全商品化，他们仍保有着对自身劳动力生产过程的较强掌控能力。正是这种残存的掌控力，使得他们的“生产完整性”得以部分保存——他们能够相对完整地经历从播种到收获的农业循环，并见证劳动成果从自己手中诞生。

因此，“半无产阶级”之“半”，其本质正在于他们残存着对自身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并由此维系了部分生产完整性。这一点构成了他们与纯粹无产阶级的本质区别，也深刻塑造了他们独特的阶级属性与革命态度：既因受剥削而具有革命要求，又因保有微末的独立性与小私有幻想而可能表现出动摇与不彻底性。

同时我认为，我们也应认真的剖析一下雇农，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阶级划分，更深刻揭示了工农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首先要明确一点：在毛泽东同志对半无产阶级的分析中，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雇农”并未被归入“半无产阶级”范畴[14]。他们本质上是成熟的农业雇佣工人，或者更严格地说，属于农业无产阶级。其根源就在于，他们与工业工人一样，完全依靠出卖自身劳动力为生——他们的劳动力被彻底地商品化了。因此，他们也像工业工人一样，彻底丧失了对自身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成为农业领域中

“零掌控”的典型群体。

那么，为什么说这一剖析有助于我们把握工业与农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呢？

这需要引入我们重构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对劳动力商品化的系统性生存依赖，与资本对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全过程的资本主义私人掌控之间的矛盾（此矛盾将在第三章详细阐述，此处暂不展开）。基于这一矛盾，再审视“雇农”这一特殊群体的出现，它向我们昭示了一个冷酷的历史事实：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内在逻辑上必然要求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卷入商品化洪流。

在第一章第二节中，我们已经论证：劳动力商品化的必然后果，就是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生产之实际掌控能力的丧失。而在当代条件下，资本对这份掌控能力的系统性殖民，已跃升为能动的、持续地再生产出“生产完整性瓦解”与“生产资料掌控力丧失”的核心机制与动力源泉。

这套逻辑，从三个层面揭示了历史规律：

第一，它解释了马克思的经典论断：为何社会越发展到后期，就越趋于分化为二元对立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15]。因为资本积累的逻辑，就是不断将“非商品化”的劳动力（如自耕农）转化为“商品化”的劳动力（如雇农），从而持续扩大纯粹无产阶级的队伍。

第二，它也揭示了资本的扩张本能：资本必然尽其所能，去商品化一切它可以同化的劳动力。因为劳动力商品化不仅是社会总价值的根基，更是资本实现增殖的唯一活水源头。农业，这一曾以自耕农和小农经济为主的领域，绝不可能被资本逻辑永久豁免。

第三，由此，我们可以推演出农业发展的历史性宿命：未来农业的生产组织模式，必将与工业化进程趋同。它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任务分工精细化、生产环节分化、经营领域分责；它将走向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传统的自耕或佃农模式，将被普遍的雇佣劳动关系所取代；大农场主（农业资本家）将日益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导力量。

最终，整个农业生产部门的生产关系与经营逻辑，将与工业生产部门愈发一致。农业无产阶级的普遍化，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资本逻辑在地理与产业上完成其全域统治的必然一步。

接下来让我们谈一谈经典中的第二个议题：阶级属性的考察。

在经典理论中，我们常说无产阶级具有彻底的革命性，而资产阶级具有动摇性与妥协性[16]。经典解释虽然成熟，但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第二节中所论证的：我们的分析视角在当代必须实现“升维”与“复古”的双重转换。那么，对阶级属性成因的分析，也应当随之深化。

传统解释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是经济地位的根本决定作用；二是具体生产组织形式的直接塑造[16]。关于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将在后续章节展开，此处暂且按下不表。问题在于第二个方面——生产组织形式。

在当代，生产组织形式已发生巨变。经典理论中作为无产阶级核心构成的工业工人，其全球劳动力占比已不再占据主导——国际劳工组织（ILO）的长期追踪数据显示，1991年全球工业就业占比约22%，服务业为34%；到2023年，工业占比仍维持在22%左右，而服务业占比已攀升至52%（ILOSTAT数据库，2023），世界银行的同步统计也印证了这一趋势，服务业劳动者已成为全球就业人口的绝对主体。

这一结构变化直接带来无产阶级构成的重塑：服务业劳动者无疑属于无产阶级范畴，但其生产组织形式（如分散化、个体化、非固定场所）已不像传统产业工人那样高度集中、纪律严明。于是，一个尖锐的问题随之浮现：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已丧失了革命性？或者说，如当代一些观点所认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在今日已被大大削弱？

我们的回答是：绝非如此。

他们的革命性绝不会消失，也绝不会被削弱。其根源在于，生产组织形式至多是阶级意识与革命性外显程度的“促进因素”或“干扰因素”，而绝非其“决定因素”。它可以影响革命意识表达的方式、时机与集体行动的效率（例如，分散的服务业劳动者组织起来更为困难），但绝不能改变革命性得以产生的根本土壤。

那么，决定阶级属性（如革命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有且只有一个：劳动者“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的丧失程度。

这一定位之所以根本，是因为它直指资本统治的终极内核。正如前文不止一次揭示的：在当代，资本对劳动力生产实际掌控能力的系统性殖民，已不再仅仅是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掌控力”与“生产完整性”的被动结果；它已经反过来，跃升为能动的、持续地再生产出后两种丧失状态的“核心机制”与“动力源泉”。

因此，正是对这份“生命主权”（即劳动力生产掌控权）丧失程度的不同，从根本上塑造了截然不同的阶级意识与政治属性。下面，我们以小资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与纯粹无产阶级的对比来具体阐明。

首先，是对劳动力生产实际掌控能力“没有完全丧失”的群体。以保有“生产完整性”的自耕农和手工业者为典型。他们能够亲眼见证完整的产品从自己手中诞生，并能清晰看到剥削（如地租、中间商利润）具体截走了哪一部分。这种生产状态，使其意识形态中必然存有对小私有制的深切眷恋。他们将剥削理解为“量的、局部的问题”，其斗争目标往往局限于成为“拥有更多生产资料的更好私有者”。这种基于个体、碎片化生产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他们在革命性上具有天然的不彻底性与动摇性。这正是他们被划分为“小资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的深层政治经济学根源。

与之相对，是“完全丧失”对劳动力生产实际掌控能力的群体，即“零掌控”的无产阶级。以产业工人为典型。在资本主义分工下，他们的劳动被彻底碎片化，无法与任何完整产品建立直接联系，其所遭受的剩余价值剥削是结构性的、隐匿的、无从指认的。这种彻底“无根”的生产处境，塑造了他们独特的阶级意识：使他们能够超越对个别资本家的愤怒，清醒地认识到自身与整个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根本对立。正是这种源于最彻底“无产”状态的意识形态觉醒，锻造出他们彻底的、集体主义的革命性。

因此，从意识形态分析的维度出发，“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的存废，不仅是我们划分阶级的根本标准，更是理解不同阶级政治立场、革命态度与历史命运的关键钥匙。革命性从未消失，它只是随着“掌控能力”丧失形式的复杂化（如服务业劳动者的“灵活性剥削”），其表达方式需要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予以更敏锐地辨识与更有效地组织。

接着便是对当代四大主体的再定位

① 产业无产阶级：是劳动力商品生产权的彻底丧失者

无产阶级的经典定义是“自由得一无所有，只能出卖劳动力”。我们的框架进一步揭示：他们不仅是出卖者，更是“对自身劳动力商品生产掌控的彻底丧失者”。

- 他们无法决定自己这个“商品”生产什么使用价值（生产内容由资本决定）；
- 他们无法决定自己这个“商品”的生产过程（劳动节奏、技能应用由工厂规训）；
- 他们甚至无法自主安排这个“商品”的再生产周期（休息、培训服从资本节奏）。

因此，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掌控能力】(I) 为零，【生产完整性】(II) 彻底瓦解。其阶级本质是：他们对自己的“劳动力商品”从制造到维护的全过程，丧失了所有自主权。其革命性正源于对这种“商品生产权”被彻底剥夺的集体体验。

② 传统小生产者/半无产阶级：劳动力商品生产权的部分保有与依附者

农民等半无产阶级的特殊性在于，他们在出卖劳动力商品（打短工）的同时，仍部分保有“自己生产自己作为农业劳动力商品”的能力。

- 他们能相对自主地安排农事，即控制着自己部分劳动力商品的生产过程；
- 但这种控制是脆弱、依附的，受制于地租、市场等，使其劳动力商品的生产过程时刻面临中断或扭曲。

因此，他们残存着部分的【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掌控能力】(I)与【生产完整性】(II)。他们的阶级摇摆性，正源于其对劳动力商品生产掌控能力的不完整与高度不稳定：既想完全拥有这份“生产权”（成为自耕农），又时刻面临被完全剥夺（彻底无产化）的威胁。

③ 资本家阶级：社会总劳动力商品生产过程的组织者与支配者

资本家的阶级权力，不仅在于占有生产资料，更在于“购买并支配他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过程”。

- 他们通过雇佣合同，购买了一定时间内对他人劳动力商品的使用权与支配权；
- 他们组织生产，实质是组织所购得的劳动力商品进行协同劳动，实现资本的增殖；
- 他们制定规章、提供培训，目的是确保所购买的劳动力商品能持续、高效地按照资本的需要进行“再生产”。

需要明确的是，资本家本质上是资本的人格化——他们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部社会个体中拥有最强的掌控能力，能够自主决定生产组织形式与劳动力支配方式，但这种“自主”并非完全的自愿自由，其决策核心始终听命于资本增殖的内在意志，受市场竞争、利润最大化等资本逻辑的刚性约束，无法脱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自主选择。因此，资本家是“社会总劳动力商品生产过程的指挥官”，他们的【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掌控能力】(I)是垄断性的，他们的【生产完整性】(II)体现在对最终产品的完整控制上，而其权力核心【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III)在于对他人劳动力商品生命周期的支配能力。

④ 打工人[17]：文化霸权与法权残余下的“高知依附者”

当代“打工人”的处境需要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交织语境中加以理解(虽然前文一直聚焦于资本主义社会，但在这里同时考察一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有助于我们丰富视野)。他们陷入了一种由文化霸权与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共同塑造的深层“掌控权割裂”困境。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领域，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所揭示的文化霸权机制发挥着关键作用[18]。教育体系通过传授高度分散与专业化的知识，在赋予打工人特定技能的同时，系统性地阻碍其形成对自身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这种“能力碎片化”使得他们虽具备较强的形式掌控力，但其劳动价值的实现仍深度依附于资本提供的平台与架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深刻揭示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按劳分配”原则，仍然是一种默认了天然差异的“资产阶级法权”[19]。这种法权的残余持续在社会运行中发挥作用，具体体现在打工人在法权关系上对其关键劳动成果与核心生产资料缺乏最终支配权，其“形式上的高掌控能力”与“法权上的结构性依附”之间形成了深刻矛盾。

无论在哪种社会形态下，打工人的劳动都能产出看似完整的方案、代码或设计，但这些成果的所有权往往不属于创造者本人。他们创造的是“归属于资本或单位的完整性”，其“生产完整性”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幻觉。

因此，打工人是一个在当代复杂社会条件下，被文化霸权与法权残余共同塑造的高知依附者。他们怀抱着凭借专业知识实现自我实现的梦想，这种梦想本身正是文化霸权成功的体现；而他们在现实中则面临着法权关系与结构性依附带来的限制。他们的阶级焦虑，正源于这种“形式上的高掌控能力”与“实质上的系统性依附”之间的巨大落差，这一矛盾在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交织语境中显得尤为突显。

或者可以进一步的凝练为，“打工人”是劳动力商品化在知识经济中的深化形态。他们同样是出卖者，但其特殊性在于，他们劳动力商品的价值，高度依赖于持续、专精的知识投入。资本通过一套精密的系统（算法、绩效、职业发展），深度殖民了其劳动力商品的“生产”与“升级”过程：

- 技能发展导向被资本预设（学什么，由市场需求决定）；
- 工作与休息的界限模糊，闲暇时间被转化为劳动力商品的“维护”与“升级”时间；

- 其劳动过程中产生的个人数据，被资本无偿提取并转化为规训自身、优化劳动力商品生产的新型生产资料。

他们看似在“投资”自己这个商品，实则其“投资”方向与评估标准已被资本全面掌控，其“自主性”只是资本优化其商品性能的杠杆。

综之而得，通过将阶级划分标准锚定于“对（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我们将阶级分析彻底重归于“劳动力商品化”这一政治经济学原点。这使我们能清晰洞见：阶级差异的本质，是对“自身劳动力商品生产过程的自主支配权”与“对他人劳动力商品生产过程的支配权”的分配差异。当代剥削的深化，正体现为资本对这种掌控权的殖民从显性的“时间购买”，转向隐性的“生产过程编程”。这为后续剖析剥削形式与异化机制，奠定了统一而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 剥削形式之深化：从价值占有到生命过程殖民[20]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精辟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商品，并在生产过程中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21]。然而，这一经典定义主要揭示了剥削的经济结果（剩余价值的转移）。要直面其实现过程与权力实质，我们必须追问：资本家何以能够持续、稳定地实现这一占有？答案在于，剥削得以可能的前提，是资本家（作为生产资料占有者）首先完成了对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控制能力】(I) 的功能性剥夺。

这一剥夺的直接后果，是劳动者【生产完整性】(II) 的瓦解。在工业革命后的工厂制中，这种瓦解主要通过资本主义分工实现：一个完整产品的生产被分解为无数局部、重复的环节。其表面表现是劳动者与最终产品的疏离；其深层本质，则是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完整性”的丧失——他无法再自主地、完整地掌控自身劳动能力的运用、发展与呈现方式。而这，直接导致了劳动者【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III) 的根本性丧失。当劳动者无法通过掌控生产资料来实现自身劳动力价值时，其唯一出路是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此时，其【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III) 便从一种自主的潜能，被异化为一种依附性的、只能在市场规则下出售自身劳动时间的“商品化潜能”。因此，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始于【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控制能力】(I) 的剥夺，显现于【生产完整性】(II) 的瓦解，而最终奠基于一对【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III) 的系统性丧失。后续一切剥削形式，都以此为基础。

剥削形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资本积累的时空拓展而不断升级。这一升级，本质上是资本为突破剥削边界、最大化剩余价值而不断重构支配方式的过程。从“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控制能力”的丧失到“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的丧失成为支配性逻辑，其历史性转折大致发生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分工的尺度从工厂内部、民族国家内部，跃升为全球产业链与国家间的结构性分工。这使得资本的支配逻辑必须超越对固定空间内劳动过程的直接监视，转向对更具流动性、更抽象的“劳动力商品”的生产与再生产标准的掌控。（当然，这一逻辑在全球化之前便以更血腥的形式存在，如殖民地的强制劳动，但其系统性与精密性在全球化时代才达到空前高度。）

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一剥削逻辑实现了双重深化，呈现出“双重丧失”的结构性耦合：

第一重丧失：对数字生产资料（算法、平台、数据）的掌控权缺位。

这延续并强化了经典意义上对【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掌控能力】(I) 的剥夺。劳动者既不拥有数字基础设施的所有权，也无法实质性理解或支配其劳动赖以展开的算法逻辑、平台规则与数据资源——决定订单分配的算法、设定交互规则的平台架构、构成价值基础的数据流。这些新型生产资料及其掌控权，高度集中在平台资本手中。

第二重丧失（当代异化的核心）：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被系统性剥夺。

这标志着剥削的焦点，从对劳动成果的占有，深化为对劳动力商品生产过程的全面殖民。它具体体现为：

①生产过程的失控：劳动的具体节奏、技能的应用场景、绩效的评价标准，日益由外部算法与管理软件设定。劳动者对“如何工作”失去主导权，沦为执行精密指令的“人机接口”。

②再生产过程的殖民：本用于自由发展的学习、休息、社交与健康管理，被系统地重塑为服务于劳动力商品“保值”与“增值”的“人力资本投资”。其目的与节奏被市场逻辑与竞争焦虑主宰，生命时间被资本增值的循环全面征用。

③产品（数据化劳动力）的异化：个人的行为数据、情感投入、社交关系，作为劳动力生产过程的副产品被平台无偿提取。这些数据反过来成为训练算法、优化管理、精准预测乃至进一步规训劳动者自身（及他人）的新生产资料。劳动者在生产数据的同时，也在生产着深化自身被剥削境遇的新条件。

现象学案例：

1. 外卖骑手是诠释“双重丧失”的典型。他们的接单、路径与收入受算法绝对支配，其劳动被原子化为孤立任务，对生产节奏毫无掌控。在第一重丧失（对生产资料掌控力的剥夺）层面，他们不拥有决定订单分配、路径规划和薪酬计算的算法系统，也不拥有产生数据价值的平台。这些数字生产资料及其掌控权完全归于平台资本。在第二重丧失（对劳动力生产掌控能力的殖民）层面，剥削表现为对其生命过程的深度编程：① 生产过程失控：接单、路线、时间被算法绝对支配，劳动者沦为执行指令的“人机接口”；② 再生产过程殖民：为避免差评和维持收入，骑手必须自行承担车辆维护、健康风险和“等待时间”的成本，其休息与安全本应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环节，却被迫异化为需要自己优化和承担的“经营成本”；③ 数据产品异化：骑手的轨迹、速度、服务数据被平台无偿提取，用于优化算法、训练 AI，进而生成更严苛的规训体系。他们不仅在送餐，更在持续生产着用于深化自身剥削的数据生产资料。外卖骑手的困境表明，剥削已不再是简单占有其送餐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是系统性地剥夺其安排工作节奏、维护自身再生产、占有自身数据产品的全部能力，从而将他们的整个生命周期编织进价值提取的循环。
2. 程序员、设计师等数字创意工作者，则呈现了“双重丧失”更为隐蔽和精细的形态。在第一重丧失层面，他们虽熟练使用开发工具与平台，但关键的生产资料——软件知识产权、云服务器、算法核心、用户数据——的所

有权与控制权仍属于资本。在第二重丧失层面，剥削通过制造“创造性自主”的幻觉而深化：① 生产过程的隐性编程：他们的“创造力”被预先框定在商业需求、技术栈选择和产品逻辑之内，算法甚至能替代部分创意编码；② 再生产过程的终身化捆绑：技术快速迭代迫使他们将大量闲暇时间用于学习新技能，其职业生涯发展完全依附于资本设定的技术风向，劳动力价值的“保值”与“增值”成为劳动者自我施加的终身压力；③ 产出的全面异化：其代码、设计、创意方案一经产出，知识产权即归属公司，并可能被用于开发监控工具或优化剥削系统。他们看似在生产“完整”的产品，实则只是生产了“资本控制下的完整性片段”。数字创意工作者的境遇揭示，当代剥削的最高形式，是让劳动者在保有“形式上的高技能掌控感”的同时，系统性剥夺其对劳动目的、发展方向和最终成果的实质掌控权，从而将他们的智力、激情与终身学习能力，无缝转化为资本增殖的智能养分。

他们的共同本质在于：其“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在不同维度、以不同方式被侵蚀，他们作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者，却日益丧失对这一商品生产过程的自主权。这些案例共同印证，当代剥削已从“在生产过程中占有剩余价值”，升级为“在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全过程中塑造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前文所述，“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不仅指向对自身劳动力的掌控，更在阶级意义上体现为一种社会权力：即一个阶级（资产阶级）能够系统性地支配另一个阶级（无产阶级）的劳动力生产过程。资本家通过雇佣关系、管理结构与市场制度，购买并安排一定数量、特定结构的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将其整合进价值增殖的轨道。因此，剥削的深化，同时也是资本对社会总劳动力生产过程的规划与支配能力的深化。

综上所述，剥削形式的升级，是一条从“剥夺【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掌控能力】(I)以占有剩余价值”，到“瓦解【生产完整性】(II)以控制劳动过程”，最终走向“殖民【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III)以支配劳动力商品生产与再生产全过程”的历史与逻辑链条。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所展现的“双重丧失”，正是这一链条发展的最新阶段。它意味着，剥削已从工作场所内的阶段性行为，演变为贯穿劳动力整个生命周期的系统性支配；不仅占有劳动产品，更塑造着劳动主体本身。这为理解下一节将阐述的全面异化现象，提供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三) 异化链条之完成：四种异化的整合与异化的新发展[22]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异化劳动理论，将其从哲学思辨领域“拉回”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现实之中，奠定了以“生产资料占有”为核心的批判基础[23]。这一理论体系深刻揭示了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关系下，劳动者全面非人化的四重图景：

1. 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自己越贫穷，产品成为支配他的异己力量。

2. 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成为外在的、被迫的、痛苦的谋生手段。

3. 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人的类本质）被贬低为维持肉体生存的工具。

4. 人与人相异化：上述异化的必然结果，体现为阶级对立与普遍的社会疏离。

然而，一个长期存在的理论关切在于：从“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关系”这一宏观生产关系，到“四重异化”这一具体而微的个体体验与对抗性社会关系，其间的因果链条究竟是如何具体展开的？马克思的经典论述指明了起点与终点，但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即异化如何像一台精密的机器般被逐级生产出来——仍有待更清晰、更具操作性的理论阐释。

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的两大核心支柱，共同定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在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驱动下，不断推进生产过程的专业化与分工细化。正是在这一历史性进程中，“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掌控能力”（I）的匮乏与“生产完整性”（II）的瓦解，作为一对相互关联的剥夺机制，被系统地制造出来。而这二者的结合，其最终指向与完成形态，正是劳动者“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III）的根本性异化与丧失。在经典工业时代，这一丧失主要表现为（I）与（II）丧失后的被动结果；而在当代，对（III）的系统性殖民已反过来，成为能动的、持续地再生产出（I）与（II）丧失状态的核心动力源泉。

第一序列：劳动者与劳动过程、劳动产品的异化

——经济异化的直接形成

劳动者与劳动过程、劳动产品的异化，是整个异化链条的开端与最直接的经济表现。在本质上，它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一资本主义根本事实的必然结果与第一个现象形态。

其发生遵循一个清晰的逻辑链条：

1. 根源：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掌控能力的结构性剥夺

这一异化的总根源，并非抽象的观念或技术，而是资本家（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垄断者）通过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关系，对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掌控能力”所完成的结构性、制度性剥夺。农民失去土地，手工业者失去作坊与工具，现代劳动者不拥有数据、算法与平台——这种剥夺使劳动者丧失了独立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正是这一剥夺，为后续的一切分离铺设了道路。

2. 核心机制：劳动者与自身劳动能力的第一次分离

由于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劳动者唯一剩下的“财产”就是自身的劳动能力。为了生存，他必须在市场上将这种能力作为商品出卖。“劳动力商品化”在此刻实现了一个根本性转变：劳动者与自身劳动能力发生了“第一次分离”。劳动能力不再是他可以直接运用来实现自身目的的内在力量，而变成了一个需要先出售、其使用价值才能被他人（资本家）激活的“外在之物”。这是掌控权的分离：劳动者让渡了对自己劳动能力在特定时间内的使用支配权。

3. 直接表现：生产完整性的瓦解——劳动者与所生产商品的分离

上述分离的直接后果，便是“生产完整性”的彻底瓦解。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后，为了最大化效率与利润，必然通过精细分工将完整的生产过程分解为无数局部、

重复的环节。劳动者被困于其中一个节点，如同螺丝钉。他/她不再能经历从构思到成品的完整创造循环，无法指认任何最终产品是“我的作品”。

这便是“第二次分离”：劳动者与自己亲手参与生产的商品相分离。产品作为异己的、陌生的力量站在他面前，它的设计、意义和归属均与劳动者无关。劳动从一种完整的、对象化的创造性活动，沦为无目的的碎片化动作堆积。

于是，第一序列异化的完整逻辑便展开在了我们的面前：

资本家剥夺生产资料掌控权 (I) → 迫使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者与自身劳动能力分离） → 资本家利用支配权瓦解生产完整性 (II)（劳动者与产品分离） → 最终表现为劳动过程（痛苦）与劳动产品（疏离）的全面异化。

这一序列清晰地表明：经济层面的异化，绝非主观感受，而是劳动力商品化后，劳动者的掌控权被系统性剥夺所必然产生的客观生存状态。

这种异化，在劳动者的日常体验中呈现为一种撕裂的双重感受：

- 在劳动过程上，由于先天缺乏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潜能，工作对他而言成为一种由他人设定、受他人监督的“外在活动”。劳动不再是自我的表达与延伸，而成为对自我的否定与逃避。
- 在劳动产品上，由于生产完整性被彻底瓦解，产品与他之间的关系被庞大的分工体系彻底中介和遮蔽。那不再是其个体劳动的对象化结晶，而是一架庞大而陌生的机器（资本）的冰冷产出。他无法在其中直观自身的本质力量，产品反而作为一个独立的、异己的商品世界与他冷漠地对峙。

因此，劳动过程与劳动产品的异化，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支配权的先天匮乏（结构性根源），一面是创造意义的被彻底掏空（现象学表现）。这第一重异化，奠定了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秩序中无根与疏离的基本生存境遇，并为更深刻的异化——与自身类本质的分离——埋下了伏笔。

第二序列：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

——劳动力商品化后的存在论剥离

当劳动者与自身的劳动过程、劳动产品全面疏离之后，异化便从具体的经济活动领域，上升至人的根本存在维度，即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将人的“类本质”界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一种能够自我主宰、并通过完整的创造性对象化来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生命活动。

这一重异化，本质上是“劳动力商品化”逻辑在存在论层面的彻底完成与深化。其核心逻辑在于：经济活动领域的异化（第一序列），必然导致人的根本存在方式的异化。

1. 深层根源：劳动力与劳动者的彻底分离与独立化

在第一序列中，劳动力已作为商品与劳动者发生了“使用支配权”的分离。而在第二序列，这一分离被推向极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持续塑造下，劳动力不仅是被出售的商品，它日益成为与劳动者个人相分离、相独立、甚至相对立的

“异己存在”。

- 它遵循市场的定价逻辑（工资），而非劳动者的生命发展逻辑。

- 它的“使用价值”（劳动）被资本家在规定时间内、规定流程中消费，与劳动者自身的意愿和节奏无关。

- 它的“再生产”（技能学习、身心恢复）越来越像是对一件工具的维护和升级，服务于其市场价值的保值增值，而非人的丰富性与完整性。

于是，发生了“最深刻的分离”：劳动者与自身最本质的生命力量——其劳动力——在存在意义上被割裂了。劳动力不再是“我”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生命表达的媒介，反而成了一个需要被不断管理、投资、出售以换取生存资料的“它者”。

2. 对“自由自觉”的双重剥夺：类本质异化的具体机制

我们的分析框架揭示，这种存在论层面的异化，具体表现为对“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本质的双重剥夺，而这恰恰对应着前文核心范畴的丧失：

- “自由”维度的丧失：源于“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掌控能力”（I）的彻底匮乏。

“自由”首先意味着对自身活动过程的自觉支配。当劳动者因（I）的丧失而无法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何生产时，其劳动从始至终便是一种由资本意志主导、受外在节奏规训的被动活动。劳动不是自我主宰的实践，而是必须服从的苦役。“自由”的丧失，标志着劳动者对其生命活动自主权**的沦丧。

- “自觉”维度的瓦解：直接体现为“生产完整性”（II）的系统性瓦解。

“自觉”意味着在完整的对象化过程中反观并确证自身的本质力量。当（II）瓦解，劳动被碎化为无意义的片段，劳动者无法参与或见证一个完整产品的诞生，其活动便丧失了有始有终的创造性循环。劳动不再是一个能将内在创造力、智慧与情感转化为外部可直观对象的“对象性活动”。“自觉”的瓦解，抽空了劳动的内在意义与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3. 本质归结：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的彻底沦丧

因此，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其最深刻的现实根源，可精确地归结为“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III）的彻底沦丧。

- 因为失去了（III），劳动者才无法自由地支配自身的劳动能力；

- 因为失去了（III），劳动者才无法在完整的对象化过程中实现自觉。

（III）的丧失，意味着劳动者对其生命过程（从技能塑造、时间安排到身心再生产）的总体性主权被剥夺。劳动之所以从“自由自觉的类生活”彻底降格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正是因为劳动者对自己生命活动本身的生产与主导权，已被资本逻辑完全殖民。

第二序列的异化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剥削劳动者的经济产品，更异化了其作为人的本质性存在方式。它将人从“活动的主体”贬低为“劳动力的载体”，将丰富的“类生活”压缩为抽象的“商品再生产”。这是比经济异化更为根本的剥夺，也为第三序列——人与人关系的全面异化——铺平了道路。

第三序列：人与人的异化

——社会关系的全面对抗与疏离

人与人的异化，是前述所有异化的社会性总和与最终完成。它并非一个独立的环节，而是私有制下生产关系矛盾在人际领域的必然表现。我们的分析框架，能够清晰揭示其从生产领域生发并弥漫至全部社会生活的双重逻辑：

1. 生产关系的对抗性结构：异化关系的根源

人与人异化的最深刻基础，直接源于生产领域“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的阶级性垄断。而这一根源性垄断又造成了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潜能的垄断，而无产阶级则系统性地匮乏此种潜能。这种基于“能力常量”的根本对立，确立了剥削与被剥削、支配与被支配的阶级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平等个体间的偶然冲突，而是由生产地位预先决定的结构性对抗。因此，“实际掌控能力”的两极分化，是塑造对抗性社会关系（即阶级关系）的物质内核。

2. “生产完整性”瓦解与社会联系的物化

“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的丧失，又必然的造成了劳动者“生产完整性”的普遍瓦解，则塑造了这种对抗性关系得以运行的普遍社会形式。当每个劳动者的产品都不是其完整本质的对象化，而只是匿名商品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就必然被物与物的关系（即商品交换关系）所中介和掩盖。

- 劳动者 A 与劳动者 B 之间，不再作为共同创造者发生联系，而是作为各自碎片化劳动产品的所有者（或出卖者）发生关系。

- 人的丰富个性、情感与需求，被抽象为冰冷的交换价值和货币额度。

这种社会关系的普遍“物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联系被遮蔽，相互视为实现各自目的的工具。它构成了“人与人相异化”在日常生活层面的弥漫性体验。

3. 从经济对抗到全面疏离的演进

最终，生产领域的阶级对抗与交换领域的普遍物化相结合，催生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面疏离：

- 在阶级之间，表现为利益的根本对立与情感的冷漠隔阂。

- 在阶级内部，竞争取代了联合，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沦为相互竞价的原子。

- 在最广泛的社会层面，货币逻辑侵蚀一切，信任、共同体与真实的情感联结变得稀缺。

因此，“人与人相异化”是这样一个过程：它始于生产关系中“实际掌控能力”的垄断所奠定的阶级对抗，经由“生产完整性”瓦解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物化而得以普遍运行和深化，最终呈现为整个社会层面的深度疏离、工具化与对抗状态。

由此，马克思的四重异化不再是彼此分割的孤立环节，而转化为一个相互贯

通、层层递进的动态因果生成序列。

资本主义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关系 → 决定了劳动者“实际掌控能力”的结构性匮乏（根源性的能力剥夺） → 导致了劳动“生产完整性”的必然瓦解（现象学的意义抽空） → 首先表现为劳动者与劳动过程及产品的异化（直接的经济事实） → 进而上升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存在的根本异化） → 最终，通过阶级对抗与关系物化的双重逻辑，完成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异化（社会关系的全面对抗与疏离）。

至此，我们从历史脉络中起笔，提炼出“劳动力”与“掌控”这一组核心概念，并将它们锻造成一个“三元辩证联动”的分析框架。凭借这一框架，我们得以对阶级图谱、剥削的深化与异化的生成序列，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时代化的重新阐释。

然而，理论的深化永无止境。我们剖析了资本升维在诸多领域的现象，但倘若不能洞察驱动这一切现象的总根源，我们的批判仍将停留于表面。资本的升维，不仅要求我们的分析视角进行重构，更意味着构筑了整个资本主义系统的那个最基本矛盾本身，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形式显现出来。对它进行当代的重构与诊断，是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全部危机的钥匙，也是任何解放实践无法回避的理论前提。

第三章：基本矛盾的当代重构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论证：资本主义的全部社会结构、矛盾与运动，都根植于“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一历史事实，即劳动力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我们进一步指出，随着资本主义从工业时代步入数字时代，这一本质性关系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冲击并重塑其外在表现形式。

在经典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剥削与支配的主要实现形式与可见标志，是实体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工厂、机器、土地）。然而，这种对“物”的占有，其深层目的始终是为了实现对“力”——即活劳动或劳动力本身——的持续支配与价值提取。只是这一本质目的，在彼时被牢牢包裹在“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表层结构之下，尚未完全显现其独立形态。

而在当代，尤其是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崛起，一种深刻的理论“倒置”或“显现”过程正在发生：资本对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全过程的私人掌控，这一资本主义的本质目的，正日益摆脱对固定、有形生产资料的依赖，通过算法、平台、数据与协议等新型权力形态，实现其直接的外化。剥削的核心场域，从对劳动成果的占有，转向对劳动能力再生产过程的殖民；支配的逻辑，从对生产资料的静态垄断，深化为对生命过程的动态编程。

至此，本质与表象正日趋融合。生产资料（尤其是数据、算法等数字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越来越清晰地显现为服务于一个更根本目标的手段：即实现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的系统性剥夺与私人垄断。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被精辟地概括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24]。这一经典论断，精准把握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矛盾冲突的主导形态与历史手段。它揭示了资本通过剥夺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掌控能力，迫使其出卖劳动力，从而占有剩余价值的过程。在这一阶段，异化的直接体现是劳动者生产完整性的瓦解，其对自身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被异化为一种依附于市场的商品化潜能。这是矛盾运动的第一个完整历史链条：丧失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掌控能力 → 瓦解生产完整性 → 异化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

然而，这一经典形态并非矛盾的终结形式。随着资本主义向数字时代演进，其矛盾运动呈现出更为深刻的逻辑。资本统治的深层目的——即持续占有活劳动并掌控其再生产——始终如一，但实现目的的手段与矛盾的显现方式发生了历史性跃迁。对实体（及数字）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其根本服务于确立与维系对劳动力生产过程的私人掌控权这一核心目的。在工业时代，这一目的尚隐蔽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表象之下；而在当代，它正以前所未有的直接性显现与外化，甚至开始主动地、系统地再生产出对前两者的剥夺状态。

由此，矛盾实现了本质层面的历史性复归与深化。其核心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特定历史形态，演进为更普遍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

对劳动力商品化的系统性生存依赖，与资本对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全过程的资本主义私人掌控”之间的根本对立。理解这一从“手段性剥夺”到“目的性殖民”的演进，是诊断当代支配形态的关键。

理论实例的深层剖析：以美国“ALICE 阈值”为例

美国社会近年引发关注的“ALICE”群体现象，正是这一矛盾本质外显的深刻注脚。

历史链条的当代映证：ALICE 家庭的困境，完整复现了上述历史链条。他们因财务脆弱性（如无力支付 400 美元紧急开支）而丧失对基本生活资料的控制（对生产资料实际掌控能力的丧失），生活被捆绑于即时收入（生产完整性的瓦解），最终彻底失去对自身劳动力进行健康再生产的自主权（对劳动力生产实际掌控能力的直接剥夺）。

系统性筛选与本质外化：超过 40%的美国家庭处于此阈值下，其脆弱性与“福利悬崖”结合，使得一次意外即可触发“收入归零→信用崩塌→住房丧失”的连锁崩溃。这绝非偶然的社会失灵，而是资本为维持剥削效率，通过操控再生产成本，对“劳动力商品再生产失败群体”进行的系统性筛选机制。它赤裸裸地表明，矛盾已从对“物”的占有，外化为对“力”的生产过程本身的规划和筛选。

因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当代深化，并非对经典范式的简单替换，而是将其内在本质——对劳动力生产过程的掌控——从历史手段的背后推至前台，成为支配逻辑本身。这要求我们的解放理论，必须将焦点同等深刻地锚定于“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这一根本命题之上。

(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重构

任何理论重构都必须建基于坚实的历史起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的深化形态，根植于一个不可动摇的历史事实：正是生产的社会化（生产力的革命），为劳动力的普遍商品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创造了历史条件。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最终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成为普遍现实，劳动力得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自由买卖。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总前提。

然而，当这一历史前提完全确立，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成熟的、自我扩张的有机系统开始运转后，其内在矛盾便展现出新的、更深刻的形态。我们认为，这一矛盾在当代可被重构为：

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对劳动力商品化的系统性生存依赖，与资本对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全过程的资本主义私人掌控之间的矛盾。

这一表述并非描述其历史起源，而是诊断其系统性的存在方式与自我瓦解的悖论。其生成遵循以下逻辑：

从历史前提（生产社会化）到系统特征（生存依赖）

一旦劳动力商品化成为社会的骨骼（历史前提完成），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便与之形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共生关系。此时，“生产社会化”不再仅仅是促发商品化的历史动力，其自身的存在形式也彻底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

产”——一个完全建立在雇佣劳动与商品交换之上的庞大系统 [1]。这个系统的每日生存与持续扩张，在结构上绝对依赖于劳动力商品持续、稳定、大规模的供应。这种“系统性生存依赖”，是成熟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一性系统特征。它意味着，系统的脆弱性已内在化：其存续的命脉，系于其所剥削的对象。

从剥削实现（私人占有）到支配深化（私人掌控）

为了维系这一系统并实现增殖，资本必须不断深化其支配形式。经典矛盾中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是实现剥削的权力基石。但在系统运行中，这一权力必然追求对生产过程的全面支配。这导致了支配逻辑的两次跃升：

第一次跃升：从占有“物”（生产资料）到支配“力”的消费过程（劳动过程），其结果即劳动者“生产完整性”的瓦解。

第二次跃升（当代关键）：从支配“劳动过程”到殖民“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资本必须确保这个特殊商品能被持续“制造”出来，并符合其增殖需要。于是，通过算法、数据、管理技术与对教育、医疗等再生产资源的控制，资本实现了对劳动力生命过程的“私人掌控”。这构成了系统的第二性系统特征，即其最活跃、最具侵略性的权力内核。

系统特征的内在冲突：依赖与掌控的悖论

至此，系统的两个特征构成了致命的自我冲突。

特征一（生存依赖） 要求：劳动力商品必须健康、稳定、可持续地再生产。

特征二（私人掌控） 的逻辑却必然导致：为了榨取更多价值、赢得竞争，资本会不断强化控制、加剧压榨、转嫁成本，从而破坏劳动力的健康、稳定与可持续性。

自我指涉的系统危机

因此，我们重构的矛盾，揭示的是一个成熟资本主义系统的存在性危机。它不再仅仅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古典冲突，更是该系统自身生存条件与自身运行逻辑之间不可调和的自我对抗。这为理解数字时代的全面危机提供了更精确的透镜：一切危机，本质上都是“系统性生存依赖”与“全过程私人掌控”这一根本矛盾在不同领域（经济、社会、生命）的展开形式。解放的道路，也因此必须指向打破这一悖论，即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

(三)理论定位：矛盾重构的唯物史观根基

前文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重构为“生存依赖”与“私人掌控”的自我冲突，并非建构一个脱离经典范式的新矛盾，而是旨在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根本矛盾，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实现了其历史性的深化与完成。

这一深化的核心机制在于，矛盾斗争的焦点已从“生产什么”与“由谁占有”的层面，彻底推进至“生产者本身如何被生产”这一更为本质的维度。经典表述——“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精准地抓住了工业化时代矛盾在客体层面的激化形式。而当代的“生存依赖”与“私人掌控”之矛盾，则标志着同一矛盾在主体层面的充分展开与激化。

深化的动力，源于生产力对“活劳动”要求的根本性变革。当代社会化生产力（数字化、自动化、全球网络）的内在逻辑，要求其能动要素——劳动力——必须具备高度的可塑性、协作性与持续创新力。在资本主义框架下，生产力的这一客观历史要求，被系统地扭曲为整个经济体系对“标准化、可再生产的劳动力商品”的刚性生存依赖。因此，“系统性生存依赖”是生产力发展要求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一种异化且强制性的表现形式，它构成了矛盾深化的现实起点。

深化的完成，体现为生产关系系统形式的极致化。为驾驭这种由自身所催生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依赖”，资本权力必须超越对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的控制，深入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全过程。于是，“对劳动力生产的私人掌控”便不再是某种辅助手段，而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维系自身、应对其内在脆弱性的必然的、彻底的统治形态。它标志着剥削关系从对劳动时间的占有，深化为对生命时间的规划与殖民。

由此，我们所揭示的矛盾，正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为体系的生存依赖）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极限形态（体现为对生命过程的私人掌控）在历史进程中达成的最深刻对峙。这并非矛盾的转移，而是其逻辑的彻底化：矛盾双方在“人的生产”这一核心领域短兵相接，使得体系的生存前提与体系的运行逻辑直接成为死敌。ALICE 阈值所揭示的系统性再生产危机，正是这一深化矛盾无法被内部消化的必然产物。

这一深化，也为澄清当代诸多社会现象的经济根源提供了统一视角。当资本的“私人掌控”必须渗透至教育、医疗、闲暇与情感结构时，大量看似属于文化、心理或技术自主性的统治现象（如绩效伦理、数据异化）便得以生成。我们的分析表明，这些现象绝非悬浮的上层建筑衍生物，其驱动力与实质内容，始终源于经济基础中“生存依赖”与“私人掌控”之间不断激化的张力。上层建筑扮演着管理、疏导与合理化这一根本冲突的中介角色，却无法消除冲突本身。

综上所述，这一理论构建，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部完成的一次自觉的理论深化。它将经典范式对矛盾在“客体世界”中表现的分析，坚定地推进至对矛盾在“主体世界”中如何被生产与再生产的分析。这并非对经典原理的替代，而是其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决定性展开与具体完成，为我们理解数字时代全面而隐蔽的支配，以及构想以“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为核心的解放政治，奠定了更为坚实与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四)资本主义的自我升维

顺着上文对当代基本矛盾的揭示，一个更为深邃且严峻的历史图景得以显现。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狡计”与统治奥秘，或许并非如经典危机理论所乐观预估的那样，在于其矛盾将导致其简单崩溃；相反，在于它通过持续的技术与组织“升维”，成功地将自身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锚定并隐藏在了其系统最核心、最富活力的要素——“劳动力”之上，并借此将爆炸性的矛盾转化为系统动态平衡的隐秘引擎。

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的辩证炼金术下，成为一种三位一体的、自我指涉的怪物：

作为生产力：它是价值创造唯一的源泉，是推动机器运转、数据流动的活性

能量[25]。

作为生产关系：它的商品化形式（雇佣劳动）构成了整个剥削结构的起点，其再生产过程（教育、健康）日益成为资本规划和争夺的场域[26]。

作为特殊商品：它自身在市场上被买卖，其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构成了剥削可能性的前提[27]。

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正是将自身全部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的对抗——不断地吸入、压缩并转写入“劳动力”这一特殊实体的生命政治方程式之中。矛盾并未消失，而是被精妙地内置化了：体系对劳动力商品的“生存依赖”与资本对劳动力生产的“私人掌控”之间的死结，恰恰成为了驱动资本不断革新管理技术（从泰勒制到算法治理）、开拓生命领域（从工厂纪律到情感劳动）、并制造结构性稀缺与焦虑（如 ALICE 困境）的核心动力源。每一次危机的爆发（如再生产危机），非但不是系统的终结，反而常常成为其进行内部筛选、重组并强化掌控的契机。

于是，矛盾的激化在现象层面呈现为一系列复杂、弥散且看似“无关紧要”或属于个人失败的症候：“内卷”被视为个人不够努力，“倦怠”被归咎于心理调节失灵，“朝不保夕”被解释为市场经济的自然风险。资本通过将系统性的矛盾转化为个体生命层面的现象学体验与责任，成功地将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对抗，隐匿于心理学、成功学与技术乐观主义的浓雾之后。批判的视线于是被误导，在绩效、情感、身份等上层建筑领域漂浮，却难以击中那个将一切痛苦锚定于“劳动力生产”这一生命过程之上的、冰冷的经济学内核。

因此，我们重构这一基本矛盾的理论努力，其终极意义不仅在于诊断，更在于执行一次坚决的祛魅与再锚定：它要求我们穿透所有那些纷繁复杂的当代症候，直指其根源——即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将矛盾升维并植入我们的生命本身，来实现其统治的深化。这揭示了，“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绝非一个温和的改良口号，而是一场针对资本主义存在论根基的、旨在破解其核心加密程序的总体性革命。唯有意识到矛盾已被隐藏得如此之深、绑定得如此之紧，解放事业才可能获得与之相称的彻底性与深度。

第四章：全景敞视：生命三个领域的编程与失权

（一）教育场：从“人的培养”到“人力资本的训练”

资本主义的支配艺术，首先体现在其将未来工厂的秩序，提前铭刻在今日校园的结构之中。鲍尔斯与金蒂斯所揭示的“符应原则”在此提供了穿透性的理论透镜：教育系统的内在组织逻辑，绝非价值中立的知识传递，而是对职场权力关系与劳动分工需求的镜像复刻与预先演练[28]。

在制度的宏观层面，这种复刻首先表现为科层制权力结构的同构。从校长、主任、教师到学生的层级链条，精准地对应着企业中的总裁、经理、工头与工人序列。学校中严格的考勤制度、统一的着装要求、对课堂纪律的绝对强调，乃至对“服从指令”的行为奖赏，其深层功能是向学生反复灌输一种对权威的惯性服从与对规则的无条件接纳。

这种对接绝非模糊的隐喻，而是通过一套由政策保障的、精密的制度性筛选与资源分配机制得以刚性实现。以美国为例，其公立教育的“学区制”将教育质量与地方房产税强行绑定，形成了“富人区拥有优质公校，穷人区教育凋敝”的恶性循环。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和多项研究均证实，富裕学区的生均经费常年数倍于贫困学区，导致师资、设施与课程质量的天壤之别[29]。这种始于基础教育阶段的资源配置不公，通过标准化考试与分流政策不断放大，最终在高等教育入口处凝结为冷酷的阶级壁垒。例如，一项关于社会流动性的长期研究指出，在美国顶尖大学中，来自收入最高 1% 家庭的学生数量，已超过来自收入最低 60% 家庭的学生总和[30]。这并非能力筛选，而是阶级出身通过教育资源转化为学业优势的系统性过程。

英国的“文法学校”体系则以更公开的筛选，完成了精英劳动力的提前标识。通过 11 岁入学考试（11-plus），少数学生得以进入文法学校。大量社会学研究一致表明，文法学校的学生中，来自高收入专业人士家庭的比例畸高，而工人阶级子女的比例则严重偏低。这套筛选机制实质上是对文化资本与家庭资源的制度性确认。其效果直接传导至劳动力市场，教育部和独立研究机构的追踪数据显示，文法学校毕业生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比例远高于普通综合中学，且这种差距无法完全由考试成绩解释，揭示了阶级背景的深刻影响。这完美印证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对应原则” [28]：职业导向的教育路径（如英国的 V Levels 或美国的社区学院）毕业生，最终大量进入低收入、低自主性的岗位，而学术导向的路径（A Levels 或四年制大学）则更多流向管理与专业领域。教育系统就这样，通过政策设计，将阶级出身转化为学业凭证，再将学业凭证兑换为职业等级，完成了劳动力等级的代际预制与固化。

资本对教育的殖民，若止步于宏观结构的塑造，其掌控仍将是外在且脆弱的。其真正的高明与深刻之处，在于它通过微观的意识形态规训与债务金融技术，将资本的逻辑转化为学生内在的思维习惯、价值判断与自我认知，从而完成“主体性的自愿臣服”。

这首先通过由国家法案强化的隐性课程与竞争伦理得以实现。美国的《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案》(ESSA) [31]与英国的《教育法案》[32], 均将标准化测试置于学校评价的核心, 塑造了“为考试而学”的普遍氛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机构的跨国比较研究反复证实, 美英等国的学生承受着远超许多欧洲国家的学业竞争压力[33], 并普遍内化了以考试成绩衡量个人价值的观念。更为根本的是, 一套经过世俗化改造的“社会进化论”逻辑, 被以科学或客观规律的名义, 无形中深深植入学生的认知框架。它将市场竞争与阶层分化诠释为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 使个体将失败归咎于自身的“不适应”, 从而在根源上瓦解了集体批判与变革的可能。多项长期价值观追踪调查显示, 在过去数十年间, 西方青少年将“高收入职业”作为首要人生目标的比例大幅攀升, 而对“社会公平”“公共服务”等价值的关注度显著下降。教育成功地将工具理性塑造为一代人的主导思维。

同时, 社会上流传着一种看似合理的教育叙事: 学习成绩优异的少数学生被认为“自主性更强”, 理应采用“放任式教育”培养其自主能力; 而学习成绩欠佳的学生则被贴上“自主性薄弱”的标签, 需要通过强制规范、律令约束等方式“迫使他们学习”。但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下, 当教育场已沦为资本对劳动力生产进行殖民的首要培育场所时, 这套叙事便彻底暴露了其统治谎言的本质——它刻意遮蔽了两个根本事实: 其一, 人作为具有思维与主体性的存在, 与生俱来便拥有自主探索、自我建构的内在潜能, 自主性绝非少数人的专属特权, 而是人的类本质的核心构成; 其二, 学习成绩与自主性本无必然关联, 成绩优劣更多受家庭资源、文化资本、科目适配性、教学模式等多重因素影响, 一个学生拒绝某一异化的科目、讨厌被强制灌输的知识, 恰恰是其自主性的直接体现, 绝不能因成绩不佳就否定其自主意志。

那么, 教育领域的“自主性分化”何以产生? 根源绝非学生个体的天赋差异, 而是资本增殖逻辑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需求。资本要实现利润最大化, 必然需要将劳动力划分为三六九等: 既需要少量掌握核心技能、能优化资本增殖效率的“精英人力资本”, 也需要大量服从指令、可批量投入生产的“标准化劳动力”, 更需要底层从事重复劳动的“廉价劳动力”。这种分层需求, 通过教育系统被转化为一套精密的筛选与规训机制:

所谓“放任式教育”, 绝非赋予少数学生真正的自主性, 反而暗藏着资本对“精英劳动力”的精准规训。他们看似能自由选择学习方向、探索兴趣领域, 但这种“自由”从一开始就被限定在资本主义教育的分科体系与资本划定的“精英技能赛道”之内——自然科学、金融、高端技术、管理等学科被奉为“高价值领域”, 而人文社科中与资本增殖无直接关联的方向则被边缘化。更关键的是, 他们的专业选择、技能深耕, 最终仍要臣服于市场就业环境的指挥棒: 学金融是因为资本运作需要顶尖操盘手, 攻技术是因为数字资本扩张需要算法开发者, 选管理是因为跨国资本需要高效的劳动力组织者。他们从未真正拥有根据自身兴趣与本质能力自主决定“学什么、干什么、用什么创造价值”的权利: 一个热爱自然的学生可能因“环境专业就业面窄”被迫转向计算机, 一个擅长思辨的学生可能因“哲学变现能力弱”妥协选择金融, 一个热衷手工创造的学生可能因“传统工艺市场价值低”放弃初心。这种被资本需求筛选、被市场逻辑绑架的“自主”, 本质是让其劳动力商品具备更高的稀缺性与增值潜力, 成为资本增殖的“高效工具”, 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实现。

而针对多数“成绩差学生”的强制规范，则是资本对“普通劳动力”的标准化塑形——将他们的自主拒绝污名化为“叛逆”，将他们的兴趣探索贬低为“不务正业”，通过律令约束磨灭其天然的自主探索欲，将其训练为服从流程、耐受重复劳动的“合格零件”。

更具欺骗性的是，这套机制刻意制造了“少数优秀者”与“多数落后者”的对立——让学生相信，自主性的有无是自身能力所致，阶层分化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但本质上，这种对立只是劳动者内部的虚假分裂：无论是被贴上“自主精英”标签的学生，还是被判定“缺乏自主”的学生，都未曾真正拥有对自身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前者的“自主”被限定在资本需要的技能方向上，后者的“被动”则是资本规训的直接产物，二者最终都将沦为服务于资本增殖的劳动力商品，只是被分配到不同的剥削环节而已。资本正是通过这种“制造差异、强化对立”的策略，瓦解了劳动者的集体意识，让他们在相互竞争中遗忘了被共同殖民的本质，从而巩固了对劳动力生产全过程的私人掌控。

在此基础上，“人力资本”理论与金融化政策共同编织了一个完美的债务陷阱。美国政府推动的“助学贷款市场化”，将高等教育成本大规模转移至个人。截至2023年，全美助学贷款债务总额已突破1.7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住房抵押贷款的第二大消费者债务[34]。根据美联储和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超过60%的大学毕业生身负贷款，且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平均负债额显著高于高收入家庭。这笔债务绝非中性金融工具，而是一条将劳动力锁定在资本增值轨道上的经济锁链。大量经济研究指出，沉重的助学贷款债务显著影响了毕业生的职业选择、购房决策和创业意愿，迫使大多数人优先选择高薪行业以偿还债务。教育，本应是拓展人生可能性的翅膀，在资本主义金融工程下，却异化为束缚职业选择、迫使知识劳动力优先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金手铐。

西方批判理论家的洞见，为我们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更深层的理论坐标。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在此显现为将特定阶级的价值观（竞争、个人奋斗、社会进化论）塑造为整个社会的“常识”[35]。布迪厄的“文化资本”与“社会再生产”理论，则揭示了看似中立的学校教育如何通过偏好精英阶层的品味、知识与行为模式，系统性地将工人阶级子女边缘化[36]。研究表明，即便在能力相近的情况下，拥有更多“文化资本”（如特定的语言风格、艺术修养、社交礼仪）的学生，更容易获得教师的积极评价和更高的学业期待。教育系统于是扮演了一个看似中立、实则高效的“社会炼金术”角色：它将先天的阶级不平等，转化为“文化素养”与“学业潜力”的差异，再通过制度将其合法化。

综上所述，当代资本主义下的教育场域，已通过政策性的资源分层、制度化的筛选机制、金融化的成本转移以及系统化的意识形态灌输，彻底沦为资本规划劳动力生命周期的战略起点。它不仅在结构上预制了未来的职业等级，更在灵魂深处塑造了服务于资本的思维与人格，最后用债务的锁链确保其成果为资本所用。劳动者在尚未正式出售其劳动力之前，其“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便已在经济前提、技能方向、价值认同乃至时间主权上被系统性预支和殖民。因此，夺回教育的自主权，绝非仅仅是一场教学改革，而是斩断资本对劳动力生命过程殖民的首要革命环节。

（二）工作场：从“职业约束”到“算法设定的丧失”

如果教育是对劳动力生产的预编程，那么工作场便是这套程序全速运行的终端。在这里，资本的支配逻辑展现得最为直接，却也最为精妙。较之于教育场域的隐性规训与生活场域的弥散渗透，工作场的控制无疑是显性的——它直接关乎时间的售卖、身体的消耗与价值的提取。然而，相较于 19 世纪工厂中工头鞭影下的赤裸暴力，当代的支配已蜕变为一套更复杂、更无形的“柔性专制”系统。资本主义的统治者们，深谙生产力发展与阶级矛盾的历史辩证法，他们为自己粗暴的权力披上了理性、科学与福利的“文明”面具，试图在满足劳动者“肉体生存”的同时，系统性地剥夺其“类本质”实现的可能。

I 支配形式的升维：从“物理规训”到“算法治理”

19 世纪工厂的支配，建立在对劳动者身体与时间的直接、同步的物理监控之上。围墙、钟表、哨声与监工的巡视，共同构筑了一个封闭的“规训社会”微观模型。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掌控能力的丧失，直接外化为对自身身体移动和劳动节奏的彻底失控。其生产完整性的瓦解是肉眼可见的：他站在庞大生产线的固定节点上，对自己参与的最终产品既无理解，也无情感联系。

而在当代，尤其是数字平台经济中，支配的形态发生了关键性跃迁。资本的代理人——工厂主或监工——似乎退场了，取而代之的是看似客观中立的算法、绩效指标（KPI）与数据面板。这种支配不再是同步的、物理在场的，而是异步的、无形的、却无时不在的。外卖骑手不再被工头呵斥，但他手机里的导航算法和倒计时，以一种更精准、更无情的方式规划着他的每一秒；程序员不再被要求在车间站立，但他代码提交的频率、线上故障率等量化指标，构成了一个全景散视的数字化牢笼。在这里，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掌控能力的丧失，表现为对决定工作核心流程的算法黑箱与数据所有权的彻底无权。劳动者不拥有、也无法理解支配自己的这套数字生产资料的运行逻辑。

然而，这种“隐性”支配的本质，却是将控制深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它不再仅仅规定“做什么”，而是精细地规定“如何做”、“以多快的速度做”、“达到何种标准”。它成功地制造了一种“自主性”的幻觉——劳动者似乎可以“自由”选择接单、安排路线——但所有“自由”的选择都是在算法设定的、以效率与压榨为唯一导向的狭窄参数空间内进行的。劳动者的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并未因暴力的消失而回归，反而被这套精密的系统更彻底地殖民：他的技能（如最快路线）、他的身体（如持续的移动）、他的情绪（如对好评的焦虑），都被无缝整合进价值提取的链条。这标志着剥削从对劳动时间的占有，深化为对生命活动本身的塑造。

II 福利面具与“类本质”异化的深化：被赎买的“生存”与被剥夺的“生活”

正是在这里，当代资本主义展示了其最深刻的狡黠。为了维系这套高度依赖劳动者主动配合（甚至自我驱动）的柔性专制系统，它发展出一套复杂的补偿与安抚机制，即所谓的“高福利社会”模型。带薪年假、医疗保险、员工股权计划、心理咨询、开放式办公空间与咖啡吧……这些福利绝非统治者的仁慈，而是系统维持稳定再生产所必需的“生命政治投资”。其目的，是确保劳动力商品能够持续、健康地回到生产循环中，并降低因过度异化而导致的社会反抗风险。

然而，这套福利机制恰恰构成了对马克思所述“人的类本质”异化的最深刻掩盖与完成。马克思指出，人的类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与工业剥削，首先将劳动贬低为维持肉体生存（动物的机能）的谋生手段，

这是第一次异化。而当代的“高福利”资本主义，则上演了更为精妙的第二次异化：它通过满足、甚至刻意提升劳动者“肉体生存”的质量与安全感，来系统性地置换和消解其对“自由自觉活动”的追求与可能性。

公司提供一流的健身房，是为了让劳动者以更好的身体状态回到工位；提供心理咨询，是为了疏导由工作本身产生的压力，而非消除压力源；提供“创新时间”和“黑客松”，是为了更高效地收割劳动者的智力剩余。这一切福利，都在强化一个隐秘的暗示：你的“生活”（肉体生存的优化）是公司赐予的，因此你更完整的“生命”（创造性的类本质）也应当属于公司。劳动者的闲暇、健康与心智发展，不再是与工作对立的、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而是被重新编码为劳动力商品的“维护时间”与“升级时间”。

于是，异化的链条在此完成闭环：劳动者不仅在工作中丧失生产完整性（无法掌控产品），不仅在制度上丧失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掌控能力，更在存在论层面被剥夺了对自身“类生活”的定义权与主导权。他的全部生命过程，从工作到休闲，从身体到心灵，都被资本逻辑所殖民。他看似拥有福利保障的“生存”，却彻底丧失了构成人之为人的、超越性的“生活”可能。这种异化不再是痛苦的呐喊，而是一种在舒适牢笼中的平静无力，是支配升维至生命政治层次后的终极形态。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福利制度，表面上呈现为统治者对劳动者的妥协与让步，仿佛一种文明的进步。然而，在其温情脉脉的面纱之下，隐藏着一种更为深刻且恐怖的统治逻辑——它不是统治的削弱，而是统治的深化与智能化。这是资本逻辑在触及自身生存边界的时刻，所启动的一场精密的、系统性的自我防御手术。

1. 福利的本质：资本逻辑自我指涉矛盾的“止血剂”与前文重构的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对劳动力商品化的系统性生存依赖”与“资本对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全过程的私人掌控”之间的矛盾——直接催生了福利制度。当资本的私人掌控过度压榨，导致劳动力再生产普遍崩溃（如大规模贫困、过劳死、社会动荡），危及系统存续所依赖的劳动力商品稳定供应时，矛盾便以危机形式显现。福利制度正是在此临界点登场，它并非源于道德觉醒，而是资本逻辑为应对其内在的、自我毁灭性的悖论所被迫采用的“系统止血剂”。通过医疗、教育、失业救济等社会支出，资本暂时修复被自身破坏的劳动力再生产条件，向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支付“赎金”，以期延缓其集体觉醒与反抗。这并非统治者的仁慈，而是其为了不自我灭亡而进行的被动且精于算计的妥协。

2. 福利的麻痹机制：以“小恩惠”置换“总体的革命权”福利制度的统治艺术，在于其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危险的“价值置换”。它将对劳动力再生产最低限度的、维持系统运转所必需的保障，包装并宣称作为一种“社会进步”与“阶级和解”的象征。其核心诡计是：让劳动者将争取“福利权益”的局部斗争，误认为是解放事业的终极目标，从而在微观改善的幻觉中，忘却了夺回对生产资料和自身劳动力生产过程的总体性掌控权这一根本革命任务。

劳动者获得的福利，本质上是其自身创造的剩余价值中被资本策略性返还的极小一部分（例如，经合组织国家社会福利支出占 GDP 的比例，远低于资本积累与财富集中的程度）。然而，正是这部分“返还”，制造了“体制可改良”的错觉，分化了工人阶级的斗争阵线——一部分获得相对稳定保障的“劳工贵族”可能成为

体制的维护者，而最底层的贫困则被归咎于个人失败或福利不足，而非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福利制度如同一剂政治麻醉剂，它不消除病根（资本主义私有制与雇佣劳动），而是缓解病痛，让病人在相对舒适中放弃寻求彻底治愈的方案。

3. 福利对数字资本矛盾的“延缓”与“加密”作用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福利制度的这一功能变得尤为关键和诡异。平台经济、零工雇佣与数据剥削带来了更尖锐的“双重丧失”，本应更快地激化基本矛盾、催化革命意识。然而，福利制度通过精准的“社会政策补丁”对其进行缓冲和消解。

· 对于朝不保夕的零工劳动者，针对性的临时救济或最低收入保障，缓解了他们因毫无安全网而产生的生存恐惧，将可能导致集体抗争的“绝对剥夺感”，转化为可以个体承受的“相对贫困”问题，却绝不触动平台对数据和算法的垄断性掌控这一剥削根源。

· 对于可能沦为“新穷人”的中产技术劳动者，教育升级补贴、职业培训计划等福利，引导他们将自身困境解读为“技能不足”，从而将政治经济矛盾个人化为一场需要不断自我投资的“人力资本”竞赛，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依附。

因此，福利制度非但没有解决当代基本矛盾，反而通过提供一套精密的社会安全与阶层流动的叙事，将矛盾产生的革命性能量引导、分散并消耗在体制内改良的渠道中。它延缓了矛盾总爆发的时刻，破坏了无产阶级因清晰感知自身“对劳动力生产实际掌控能力”被全面殖民而可能形成的统一的、彻底的阶级意识与革命决断。资本通过这场“以退为进”的恐怖斗争，试图为其自身的内在矛盾加密，让掘墓人在被赎买和安抚中，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揭示了，任何不旨在最终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的福利斗争，都可能在客观上成为延长资本逻辑统治寿命的帮凶。

III 隐秘的刚性：福利面具下的机械刻板

尽管戴上了福利的柔性面具，资本增殖的核心逻辑——对效率与剩余价值的无限追逐——从未改变。因此，在看似弹性、人性化的工作安排背后，一种更为精细、也更为彻底的机械性与刻板性被植入劳动者的日常。

这种刻板性不再表现为统一的工厂钟声，而是表现为：

日程的碎片化与即时响应义务：弹性工作制往往意味着“24 小时待命”，工作通过通讯软件侵入家庭、深夜与假日。

绩效评估的量化暴政：一切创造性、复杂性劳动被简化为可量化的 KPI，劳动者的价值被还原为一组随时波动的数字，活在持续的数据审视与排名焦虑中。

流程的过度标准化：即便是研发、创意等岗位，其流程也被“敏捷开发”、“设计思维”等管理方法论高度框定，创新的方向与节奏已被预设。

这实质上是以新的技术手段，复活并强化了泰勒制科学管理的灵魂。劳动者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在这套系统中被异化为一种“自我优化以符合系统参数”的能力。他的自主性，仅仅体现在如何更高效地完成算法或管理系统下达的指令。生产完整性则以另一种方式被摧毁：他可能完成一个完整的项目，但项目的目标、评价标准与最终处置权从未属于他。他生产的，始终是“资本掌控下的完整性”。

因此，当代工作场绝非一个支配弱化的场所，而是资本逻辑完成其“生命过程殖民”的核心中枢。它通过算法与绩效管理将显性控制隐形化、科学化，又通过福利资本主义将深刻的类本质异化装扮成进步的馈赠。在这双重面具之下，是对劳动者生命时间更全面、更精密的征用与编排。在这里，劳动者不仅出售他的劳动时间，更在被迫出租他的创造力、他的情感、他的健康乃至他对于何谓“美好生活”的想象力。夺回工作场的掌控，因而意味着不仅要打破生产资料的私有，更要破解这套将人的全部生命活动吸纳为增殖要素的生命政治方程式，将被福利赎买的“生存”，重新夺回为能够自由自觉展开的“生活”。

而这也昭示一旦当劳动力的强度与质量足以维持这一自我指涉的基本矛盾时，他们便会像美国政府对待“ALICE 阈值”下的家庭一样，冷酷地将那些无法再生产出合格商品的劳动力——即那些因过度消耗、技能过时或身心崩溃而“质量不行”的劳动者——无情地抛弃出系统的循环之外。ALICE 阈值所揭示的，绝非偶然的社会失灵，而是一种系统性的筛选与清除机制：当资本通过福利制度完成了对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限度维稳后，其逻辑的冷酷性便立刻显现——它只维持那些尚能为其增殖服务的“有效”劳动力，而将再生产失败的个体视为必须剥离的“不良资产”。这以最赤裸的方式印证了第三章的论断：资本主义的生存依赖与私人掌控之间的矛盾，最终会转化为对劳动力生命价值本身的功能性评判与残酷淘汰。福利的面具在此滑落，暴露出其底层运算永远服务于一个冰冷的目的：不是保障人的生命尊严，而是维系资本自我指涉的生存游戏。任何劳动者，若其生命过程无法被持续编码为合格的、可增殖的劳动力商品，便将在“系统优化”的名义下，被悄然移出棋盘。

（三）生活场：从“社会规训”到“闲暇与数据的失控”

如果工作场是生命时间被集中征用的战场，教育场是生命潜能被预先编程的车间，那么生活场——这个看似由个人主权最后掌控的私人领域——则已沦为资本逻辑完成其统治闭环的终极殖民之地。在这里，娱乐、医疗、社交乃至睡眠，这些本应指向人的再生产、自由发展与自我实现的领域，被系统性重构。它们的意义被彻底扭转：不再服务于人自身的完整性与解放，而是无一例外地服务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外在目的——维持并提升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质量与效益，以满足资本永无止境的剥削需求。生活，由此被全面工具化，成为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隐秘延伸。

1 娱乐的异化：从“自我实现”到“效能充电”

在资本逻辑的全面殖民下，娱乐丧失了其古典意义上的“闲适”与“无目的性”，被深刻地功能化。它不再是亚里士多德笔下“一切围绕自身”的自由活动，而是蜕变为一种为工作效能服务的“充电”行为与被精心设计的消费仪式。

所谓的“休闲产业”提供登山、越野、健身，其潜台词是锻造更能承受高强度工作的坚韧体魄；流行的“知识付费”与“听书软件”，将碎片化时间填塞为“认知升级”的通道，休息本身成为隐性劳动；即便是看似纯粹放松的流媒体观影与游戏，也通过算法推荐和成瘾性设计，精准消耗劳动者的剩余精力，使其在次日的工作中保持“平静的专注”，而非产生批判性的剩余思想。娱乐不再是对异化劳动的逃避，而是成为一种让劳动者从一种被剥削状态（显性工作）平滑过渡到另一种被剥削状态（隐性再生产）的中介。其最高形态，便是将“爱好”直接转化为可展示

的“技能”或可变现的“副业”，使闲暇时间的最后一寸价值也被资本逻辑吸纳。在此，劳动者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遭受了最隐秘的剥夺：他连如何“浪费”自己的时间，都无法自主定义，因为“浪费时间”本身已被建构为一种需要克服的“道德缺陷”或“投资失误”。

II 医疗的转向：从“健康目的”到“生产力维护”

现代医疗体系的演进，清晰地标示了生命政治支配的深化。它从一种以“消除病痛、恢复健康”为自身目的的人道实践，日益转向以维护和恢复劳动力的生产效能为核心目标的资本辅助系统。

企业配备的年度体检、EAP（员工援助计划）中的心理咨询、强调“重返岗位”的康复疗程，其首要关切并非劳动者的生命福祉本身，而是其作为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存续期与产出稳定性。对慢性病的管理、对精神压力的药物干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减少因病假造成的生产损失，维持劳动队伍的“出勤率”与“在岗效能”。更深刻的是，随着生物技术与数字医疗的发展，医疗干预的前沿已从“治疗”跃向“优化”与“预测”。基因检测、可穿戴设备监测的生理数据，其最终指向往往不仅是健康预警，更是对个人工作耐力、抗压能力甚至职业风险的评估。医疗数据由此成为新型的生命生产资料，但它并不归属于生命个体，而是流向保险公司、雇主与数据平台，用于更精密的生命管理与风险定价。这标志着资本对劳动力生命过程的掌控，已从外在的劳动纪律，侵入到最内在的、生物性的层面。医疗，这本该是生命主权的最后堡垒，却成为资本将生命体彻底工具化为高效、可靠、可持续生产单元的技术帮凶。

III 数据的全面提取：生活即生产，存在即剥削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生活殖民的完成形态，体现为生活的彻底数据化，以及数据被资本的无偿提取与剥削。

劳动者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移动、每一次社交互动、每一次消费选择，都在不知疲倦地生产着数据。这些数据不再是生活的被动痕迹，而是成为了具有极高价值的原材料。平台资本通过算法将这些数据加工为消费偏好、信用评分、社交图谱乃至情绪状态画像。其恐怖之处在于：

1. 生产过程的隐匿性：数据是在劳动者“生活”（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过程中被悄然生产的，剥削因而披上了“自由使用”的外衣。

2. 产品的异化性：这些关于劳动者自身生命的数据，一经产生便与主体分离，成为异己的、反过来用于规训和操控自身的工具。例如，消费数据用于推送诱导性广告，位置数据用于优化外卖平台的压榨逻辑，社交数据用于评估个人信用或职业风险。

3. 剥削的全面性：它意味着，只要劳动者存在、生活、呼吸于数字环境中，他就在持续进行着无偿的数据劳动，为资本的价值增殖贡献原料。

至此，生活场完成了其最终的异化：它不再是工作的对立面或避难所，而是成为了一个没有围墙的工厂，一个永不落幕的生产车间。娱乐、医疗、社交等所有活动，都在同时履行双重功能：一方面是劳动者自身再生产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为资本生产可用于进一步支配和剥削的数据剩余价值的过程。劳动者的生产

完整性在生活领域遭到了最彻底的瓦解——他甚至无法拥有自己“生活”的原始记录与真实意义。其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最终表现为对其自身数字生命的失控：他的喜好、健康、社交乃至无意识的行为模式，都已成为被分析、被预测、被商品化的对象，服务于那个唯一的、冷酷的终极目标——让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在职场还是居所，都能更高效、更稳定、更顺从地满足资本增殖的永恒饥渴。

（四）被围困的生命与解放的出路

教育、工作、生活——这三个领域构成了一个无缝的、闭环的生命政治编程系统。它从源头（教育）预制潜能，在核心（工作）榨取价值，并在边缘与基底（生活）完成再生产与数据回收。资本逻辑通过这个系统，实现了对人之生命过程从摇篮到坟墓、从技能到身体、从行为到意识的全景式殖民。劳动者“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在此系统下被层层剥夺，最终陷入一种系统性的失权状态。

然而，正如第三章所揭示的，这一系统的维系，正建立在“生存依赖”与“私人掌控”这一自我撕裂的基本矛盾之上。其对生活领域的殖民越深，将生命工具化的程度越高，其内在的脆弱性与反抗的潜能也越被积聚。夺回掌控权的斗争，因此也必须是一场总体性的生命革命：它不仅要夺取工厂和平台，更要夺取学校、医院、社区和数字空间；不仅要改变我们如何工作，更要改变我们如何学习、如何休息、如何交往、如何定义健康与幸福。这场革命的最终纲领，正是摧毁将生命贬值为劳动力商品的全套编码，在夺回对生产资料掌控的基础上，最终夺回对我们自身生命生产过程每一个环节的、完整的、具体的掌控能力，让生命的时间从资本的循环中解放出来，复归于其自身自由而丰富的展开。这，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在当代最深刻、最彻底的内涵。

第五章：夺回掌控：无产阶级解放的两阶段纲领

（一）第一阶段：政治革命——夺回生产资料与粉碎国家机器

对生产资料（包括传统的实体生产资料与数字时代的数据、平台、算法等新型生产资料）的实际掌控权的夺回，是解放事业不可逾越的政治前提。其核心在于，必须彻底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斩断资本“私人掌控”劳动力生产过程的权力根系，这是历史的铁律，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基石。马克思、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37]，始终锚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和平夺权的虚妄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决定了革命爆发的必然性，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赋予了暴力革命的关键性。这一核心逻辑，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因资本统治的升维而更具不容置疑的现实针对性。我们并非否认无产阶级解放路径的多元可能，但历史与现实反复印证：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暴力革命即便不是唯一选择，也是最可能、最重要的实现形式。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统治形式的精细化与隐蔽化，各类质疑甚嚣尘上。这些论调看似立足“时代新变化”，实则要么刻意遮蔽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要么彻底误读革命的历史逻辑。结合当代批判视角与前文理论框架，我们对这些谎言逐一戳破，厘清暴力革命在当代的核心价值：

1 戳破“国家中立化、民主化”的虚伪假面：福利与民主终究是阶级统治的遮羞布

部分伪理论家宣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选权、福利制度与司法独立，已使其从“阶级暴力工具”蜕变为“全民利益代表”，无产阶级可通过议会道路实现和平过渡。这纯粹是自欺欺人的谎言。他们完全无视前文重构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对劳动力商品化的系统性生存依赖”与“劳动力生产的资本主义私人掌控”的根本对立，而福利制度与民主程序，恰恰是资本化解这一矛盾的策略性工具，是包裹在剥削本质外的糖衣。

资产阶级民主的“中立性”从来都是意识形态伪装。普选权从未动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根基，资本通过政治献金、媒体垄断、游说机制（如美国“旋转门”制度[38]），依旧牢牢掌控政策制定权。即便无产阶级夺得部分议会席位，也改变不了议会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核心属性。所谓福利制度，绝非资产阶级的“仁慈让步”，而是资本逻辑自我续命的“止血剂”：当资本对劳动力的过度压榨引发再生产危机时，福利支出以最低保障修复劳动力资源，本质是将劳动力再生产的部分成本社会化，却始终回避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根本症结。正如前文所揭示的，福利制度的核心诡计，就是用“小恩小惠”麻痹劳动者，让其在微观改善中忘记对劳动力生产掌控权的争夺，最终沦为资本维持剥削秩序的工具。

国家的司法、行政体系看似独立，实则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的延伸。当劳动者的斗争触及资本根本利益时，所谓“独立性”瞬间崩塌：从警察暴力镇压罢工，到司法体系对左翼政党的系统性打压，再到数字时代算法对劳工权利的隐性剥夺，无不在印证资产阶级国家维护阶级统治的本质。妄图用资本规则设定的议会工具，去废除资本的阶级权力，无异于与虎谋皮。议会道路终究是无法触及根本的改良，唯有通过暴力革命粉碎这一阶级工具，才能为生产资料公有化扫清障碍。

II 驳斥“矛盾缓和、无产阶级消亡”的荒诞谬论：阶级对立从未消解，革命性只会愈发坚定

另有论调鼓噪，资本全球化、福利制度与技术革命已消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工人贵族”的出现弱化了阶级对立，传统产业工人的减少意味着“无产阶级消亡”，暴力革命已丧失客观条件。这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误读。他们看不到阶级矛盾的“空间转移”与“形态变异”，更无视前文所揭示的当代剥削深化与阶级属性的本质逻辑。

资本全球化从未消除阶级对立，只是将剥削链条从国内延伸至全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贵族”地位，本质上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资源的掠夺之上。通过全球产业链分工，资本将高污染、低报酬的生产环节转移至边缘国家，让本国劳动者分享少量剥削红利以缓和国内矛盾。但从全球范围看，无产阶级队伍正以新形态空前壮大：数字劳工、零工从业者、移民工人等群体，虽不占有数据、平台等新型生产资料，却同样遭受算法控制、数据掠夺等新型剥削，其“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被系统性剥夺，完全符合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

传统产业工人的减少，绝非无产阶级的消亡，而是无产阶级范畴的当代拓展。前文早已阐明，阶级属性的核心判定标准，是“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的丧失程度。当代无产阶级无论身处工业还是服务业，无论从事体力还是脑力劳动，都因生产资料被资本垄断而丧失生产完整性，都因劳动力再生产被资本殖民而陷入异化。这种异化不是主观感受，而是客观生存状态：数字劳工的劳动过程被算法精准规训，创意工作者的成果被资本无偿占有，零工从业者的劳动时间被碎片化剥削。他们与传统产业工人一样，面临着“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掌控能力”丧失、“生产完整性”瓦解、“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被殖民的三重困境。

这种共同的阶级处境，决定了其革命性从未减弱。前文分析阶级属性时早已指出：革命性的根源并非生产组织形式的集中或分散，而是对劳动力生产实际掌控能力的丧失程度。当代无产阶级虽面临分散化、个体化的劳动形态，但这种“完全丧失”掌控权的处境，使其同样能超越对个别资本家的愤怒，清醒认识到与整个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对立。而这种阶级意识的觉醒，绝非不可实现。通过思想启蒙打破资本的意识形态霸权，通过联合行动凝聚分散的阶级力量，当代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必将以新形式爆发，成为推动暴力革命的核心动力。

技术革命非但没有消解剥削，反而让资本对劳动力的殖民更趋深化。数字技术催生的算法治理、自动化生产，从未改变“活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本质——算法的优化、数据的价值，终究源于劳动者的生命活动。资本通过算法设定劳动节奏、量化绩效指标，将劳动过程拆解为可精准控制的碎片，使劳动者沦为“人机接口”，其生产完整性被彻底瓦解；同时，技术迭代迫使劳动者将闲暇时间用于技能培训，将劳动力再生产异化为“人力资本投资”，进一步丧失了对自身生命过程的主导权。而福利制度的“缓冲作用”是暂时的，全球化带来的资本过剩、生态危机、贫富分化（全球 1% 人群掌握 45% 的财富），正不断积累着新的革命势能。这些矛盾的深化，而非缓和，恰恰证明暴力革命仍是打破资本统治的关键选择。

III 反驳“暴力革命非人道、易极权”的片面指责：正义革命是终结暴力的“止战之战”

自由主义者指责暴力革命伴随流血冲突与社会动荡，违背“人道主义”，且易导致极权主义。这一论调混淆了“剥削性暴力”与“解放性暴力”的本质区别，更误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内涵。

首先，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人道性”，根植于其“止战之战”的本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系统性的暴力——从原始积累的殖民掠夺、圈地运动，到当代的算法剥削、数据殖民，资本的增殖史始终伴随着对劳动者的压迫与剥夺。这种暴力并非偶然的个体行为，而是嵌入生产关系的结构性暴力，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贫困、饥饿、生态灾难。维护这种制度的“和平”，才是最大的不人道；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正是为了终结这种结构性暴力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它不是对“人道”的违背，而是对真正人道的捍卫——通过打碎剥削性的国家机器，建立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新制度，从根源上消除暴力产生的社会基础。

其次，无产阶级专政绝非“极权主义”。前者的本质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核心是维护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抵御资产阶级复辟反扑（如十月革命后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具有鲜明的历史阶段性；后者则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与无产阶级解放的初衷完全背离。革命后的暴力使用，始终服务于“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这一终极目标——通过废除私有制，将生产资料转变为公共财产，让劳动者重新获得生产完整性，掌控自身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这种暴力是“建设性暴力”，而非“压迫性暴力”，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彻底解放，让暴力成为历史。

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暴力革命，议会斗争、跨国劳工联合、非暴力不合作、游行维权等常态化行动，都是重要的抗争路径。但必须明确的是，这些斗争并非替代暴力革命的选择，而是为暴力革命积蓄力量、凝聚阶级共识、壮大革命队伍的必要途径。从历史发展规律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作逻辑来看，资本主义的灭亡终究需要暴力革命来实现根本性突破，无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的最终胜利，也必然需要暴力革命奠定坚实基础。这并非要求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走过暴力革命的相同路径，而是立足历史纵深与国际视野得出的宏观论断——对于高度发达、统治机器日趋坚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暴力革命仍是打破阶级壁垒、粉碎资本枷锁最可能、最重要的实现形式。但无论形式如何演变，其核心逻辑始终不变——只有通过有组织的革命力量，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彻底夺回生产资料的实际控制权，才能为后续的社会革命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没有这一政治前提，一切关于“夺回劳动力生产掌控权”的构想，都将沦为空中楼阁。这不是对暴力的盲目迷恋，而是对历史规律的清醒把握，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现实的深刻认知，更是无产阶级实现解放的必由之路。

(二) 第二阶段：社会革命——夺回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

在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即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解放事业便进入了更为深刻和复杂的第二阶段。此阶段的核心任务，是防止公有制流于形式上的“所有权”而实质上的管理权与支配权被新的官僚或技术精英所垄断，从而避免产生一种“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的异化形态。这一风险的根源在于：若仅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形式，却未打破“劳动力商品化”这一资本主义的核心桎梏，资本逻辑对劳动力生产的支配便会以新的形态复归。因此，本阶段的终极目标绝非维持劳动力作为商品的异化状态，而是彻底废除劳动

力商品化，实现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这既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革新、防止蜕变的生命线，更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实质性跨越。当然这也是一场极为漫长，极为深刻，甚至要经历多次反复的社会改革。

需要明确的是，“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绝非绝对化的“自我放任”，而是“社会生产服从性”与“再生产自主性”的辩证统一：在直接生产领域，劳动者需服从社会生产的总体规划与协作要求，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必然；但在劳动力再生产的核心场域——教育、健康、闲暇、生活等关乎人自身发展的领域，劳动者应拥有完全的自主自觉决定权，彻底摆脱资本逻辑与外在强制的支配同时必须作出声明：任何妄图精准预测未来社会具体形态的尝试，本质上都是脱离历史实际的空想。我们在此展开的所有讨论，并非确立不可动摇的真理，而是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刻剖析，对解放路径作出的大胆探索与理论预设。它可能存在疏漏与偏差，无法为具体实践提供标准化的操作手册，但旨在为人类解放事业描绘一种可能性方向；它不具备终极真理的权威性，却希望能为冲破资本桎梏的思考提供启发，引领我们望向更自由、更平等的远方。这一辩证统一的实现，需要围绕以下四个维度展开系统性重塑：

I 技能的塑造与习得（劳动力价值构成的民主化）：从“资本需求导向”到“自主发展与社会需求相统一”

废除劳动力商品化，首先要打破技能培训被资本需求单方面绑架的异化格局。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劳动者的技能是“人力资本”的核心构成，其塑造方向、内容选择均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短期目标，劳动者沦为“技能工具人”，丧失了发展的自主性与全面性。社会主义的技能塑造，核心是实现“自主选择”与“社会需求”的辩证统一——技能习得不再是为了将自身打造成更具市场价值的商品，而是为了实现人的潜能与社会发展的有机契合。

这种转变的关键是教育主权的民主化重构：教育内容的设置需兼顾个体禀赋与社会公共利益，既保留支撑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技能与学科体系，又彻底摒弃“唯就业导向”的功利化课程，增设鼓励创造性、批判性思维的跨学科内容；教育方式应打破标准化规训，采用项目式、合作式学习，让劳动者自主探索兴趣方向，而非被动接受资本预设的“技能模板”；教育决策机制需吸纳学生、教师、行业代表、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确保技能发展方向既不脱离社会生产的总体要求，更不违背人的全面发展诉求。其终极目标是让技能习得成为“实现自我”与“服务社会”的统一过程，使劳动者既能胜任社会化生产的协作需求，又能摆脱劳动力商品化下“单一技能附庸”的异化状态。

II 身心的维持与恢复（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公共保障）：从“资本再生产成本”到“自主支配的生命权利”

在资本主义语境下，劳动者的健康维护、闲暇休息都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私人成本，其目的是为了持续向资本出售劳动力，本质是资本增殖的附属环节。废除劳动力商品化，就要将身心维持从资本的成本核算中解放出来，确立为劳动者自主支配的基本生命权利——在生产领域服从协作要求的同时，劳动者对自身身心状态的维护与恢复，拥有绝对的自主决定权，不受资本逻辑或外在强制的干预。

社会主义的制度保障需围绕“公共供给+自主选择”展开：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普惠高质全民医疗与公共卫生体系，不仅提供疾病治疗服务，更注重预防保健

与心理健康支持，劳动者可自主选择医疗方式、作息节奏，无需为“不影响工作”而牺牲健康；大规模建设公共文化、体育、休闲设施，丰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闲暇时间不再是“恢复劳动能力的被动时段”，而是劳动者自主支配的“自由发展时间”——可用于陪伴家人、发展兴趣、增进社交，完全遵循自身意愿；推行保障型住房政策，遏制住房商品化、资本化，确保劳动者拥有宜居的生活环境，摆脱“房贷压力下的被迫劳动”，让身心恢复成为自由生命的自然展开，而非资本需求的附属品。

III 时间的安排与出售（对劳动时间的集体主权）：从“商品交换媒介”到“生产协作与自由时间的辩证分配”

“时间就是商品”是劳动力商品化的核心法则——劳动者的时间被分割为“出卖给资本的工作时间”与“用于自我修复的私人时间”，二者均受资本逻辑支配。废除劳动力商品化，就要打破这种时间异化，实现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辩证统一：在生产领域，劳动时间的安排需服从社会化大生产的协作要求，确保生产效率与社会整体利益；但劳动时间的总量控制、自由时间的支配权，完全归属于劳动者集体与个体，彻底摆脱资本对时间的剥削性占有。

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双重保障：一方面，通过技术进步与生产关系优化，持续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消除资本主义下“过剩生产的无效劳动”“营销竞争的内耗劳动”“监控劳动者的管理劳动”，将生产效率的提升直接转化为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增加；另一方面，探索灵活自主的劳动组织形式，推行弹性工作制、共享工作制，劳动者可在符合社会生产总体规划的前提下，自主协商具体工作时段，兼顾生产协作与个人生活节奏。必须明确，8小时工作制是保障劳动者时间主权的起点而非终点，其核心价值不仅在于维护个体健康，更在于为劳动者预留充足的自由时间——用于自主支配生活、参与社会管理、发展精神世界，既满足社会化生产的协作需求，又实现个体时间的自主掌控，彻底打破劳动力商品化下“时间被资本支配”的异化格局。

劳动能力本身的维持、更新与适应（发展过程的自主性）：从“资本淘汰压力”到“自主适应与社会支持相统一”

资本主义的技术迭代与市场波动中，劳动者的能力更新是被动的——为了不被资本淘汰，被迫接受资本主导的“再培训”，本质是为了迎合资本新的剥削需求。废除劳动力商品化，就要实现劳动能力更新的自主性：在社会化生产的总体要求下，劳动者自主决定能力更新的方向、节奏与方式，社会提供支持而非强制，彻底摆脱“被资本筛选、被技术淘汰”的焦虑。

社会主义的能力更新体系应坚持“自主主导+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免费或低成本终身学习体系，劳动者可根据自身意愿与社会生产的发展趋势，自主选择培训内容，而非被动接受行政命令或资本要求的“技能改造”；构建灵活的职业转换机制，打破行业壁垒、身份限制，为劳动者自主转型提供制度支持与资源保障，让能力更新成为“提升自我、适应社会”的主动选择；在技术变革过程中，通过社会协商平衡技术进步与劳动者权益，避免“技术失业”带来的生存危机，让技术真正成为解放劳动的工具，而非压迫劳动的手段。这一过程的核心，是让劳动者从“资本需求的被动适应者”转变为“自身发展的主动主导者”，既胜任社会化生产的动态需求，又牢牢掌控能力发展的自主权利。

综上所述，“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的实质，是彻底废除劳动力商品化这一根本桎梏，实现“生产领域协作服从”与“再生产领域自主支配”的辩证统一。它要求对生产关系的改造不能停留在生产资料所有权层面，而必须深入劳动力再生产的全流程——在服从社会化大生产总体要求的前提下，将教育、健康、时间、发展的自主决定权还给劳动者。

这是一场比夺取政权更为漫长深刻的“日常生活革命”，关乎“人”能否真正摆脱“劳动力商品”的宿命。唯有赢得这场革命，才能彻底瓦解资本主义将人工具化的社会基础，让社会主义公有制真正落地为“人的解放”的制度保障，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共同体，开辟坚实而现实的道路。

（三）革命主体的重构：在历史辩证法中锻造解放的先锋与根基

在明确了“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这一解放的终极目标与“两阶段革命”的行动纲领之后，一个根本性的、实践性的问题便无可回避地横亘在我们面前：谁，将承载并执行这一历史使命？谁能带领我们冲出资本逻辑编织的生命牢笼？对革命主体的界定，直接关系到解放事业的动力源泉、战略支点与成败可能。

1. 经典范式的辉煌与基石：工业无产阶级与工农联盟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对此给予了清晰而有力的回答。在《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所描绘的工业资本主义图景中，革命最坚实、最先进的主体力量是工业无产阶级[39]。其革命性的根源在于：他们因彻底丧失生产资料而“自由得一无所有”，被迫将自身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他们在大工业的集中生产中，被锻造出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与协作精神；他们因遭受最直接、最赤裸的剩余价值剥削，而与资产阶级私有制形成不可调和的根本对立[40]。与此同时，经典理论深刻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最广大的同盟军。在封建残余浓厚的国度，农民同样深受压迫，与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反帝反封建诉求。工农联盟由此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最深厚的阶级基础与力量源泉。这一“工人为先锋，农民为根基”的主体结构，在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等一系列伟大实践中得到了光辉印证，其历史正确性毋庸置疑[41]。

2. 经典范式在当代的深刻不适应：主体景观的变迁与支配的升维

然而，正如资本主义本身完成了从“生产资料垄断”到“生命过程殖民”的升维，其统治下的阶级结构与主体境遇也已发生历史性巨变。固守经典的主体图式，将使我们无法准确把握当代斗争的真实脉搏。

首先，物质生产领域的结构性变迁动摇了经典主体的数量基础。全球范围内，传统产业工人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已显著下降并趋于稳定，而服务业、信息产业等领域的劳动者已成为就业人口的绝对主体。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全球化，使得生产的空间组织日益分散、弹性化，经典意义上高度集中、同质化的产业工人阶级队伍在形态上已不复往昔。

其次，更为根本的是，剥削与支配形式的升维，使得经典理论所聚焦的“生产资料占有”矛盾，在现象层面趋于隐蔽。正如本书第二、三、四章所系统揭示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已深化为“社会化大生产对劳动力商品化的生存依赖”

与“资本对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全过程的私人掌控”之间的悖论。剥削的核心场域，已从车间的“价值占有”转向贯穿教育、工作、生活的“生命过程殖民”；异化的完成形态，体现为劳动者“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被系统性剥夺。这种支配不再仅仅表现为贫困，更表现为在物质相对丰裕下的“存在意义的虚空”与“生命节奏的失控”。资产阶级通过算法治理、绩效伦理、消费主义与文化霸权（如将“内卷”归因于个人），成功地将经济领域的根本对立，转化、稀释为弥漫性的个体心理焦虑与社会文化现象。这导致了一个关键困境：尽管阶级整体被殖民的深度和广度空前加剧，但形成清晰、统一的“自为阶级”意识，却因支配的隐匿化与痛苦体验的个体化而变得异常困难。

3. 新主体的锻造：先锋、根基与战略的当代辩证统一

面对主体境遇的历史性变迁，我们必须秉承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根本立场的前提下，对革命主体进行符合时代的重构。我们主张，当代解放斗争的主体，应是以无产阶级（广义，即所有丧失对劳动力生产实际掌控能力的雇佣劳动者）为根本力量，以学生中处于资本编程控制领域中的、准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丧失者为先锋，以现代工人阶级（包括产业工人、服务业劳动者等）为坚实根基，以农民为重要战略同盟的复合型、动态化联盟。其中，将特定学生群体定位为“先锋”，需要予以重点的理论阐明。

为何是“学生中的准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丧失者”为先锋？

这一定位，根植于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殖民逻辑的深刻把握：

首先，必须明确这里所说的“一部分学生”，其阶级属性并非模糊的“知识青年”或“知识分子”，而是在本书第二章“阶级、剥削与异化”及前叙其他章节中，依据“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这一核心标准进行重构时，便已明确指出：那些处于教育系统末端、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其技能塑造与价值取向已被资本逻辑深度预设和编程的学生，其“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正处于被系统性剥夺的前夜，是“准丧失”状态。他们虽未正式出卖劳动力，但其生命过程（学习方向、时间安排、价值认同）已实质性地从属于资本对“未来合格劳动力商品”的生产规划，并在社会结构性压迫中处于无产阶级一方。因此，他们本质上属于**无产阶级的预备队**，是“准无产阶级”。我们的先锋定位，正是精准指向这一已被理论界定、具有共同政治经济学处境的特定群体，而非泛指所有受过教育的人。

第一，他们身处资本编程体系的“入口”与“脆弱点”。当代资本主义为确保其“劳动力商品”的持续优质供应，必然将教育场域作为生命政治编程的战略起点。学生，特别是高等教育阶段及职业教育中的学生，正是资本精心培育的“准商品”。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国家力量、家庭投入与社会期待）为确保这一“未来人力资源”的开发，不得不为其提供相对充裕的物质条件与一段被迫悬置了直接生存压力的时间。这一特殊处境，使得他们相比深陷日常生计劳作的劳动者，更有可能暂时摆脱“肉体生存”的即时逼迫，从而将思考的焦点投向自身“存在意义”、“发展潜能”与“生命可能”等关乎类本质的终极问题。当教育的异化（沦为人力资本训练）、未来的焦虑（被预设的职业轨道）与自我的探寻发生激烈碰撞时，他们最先也最敏锐地体验到那种“被设定、被优化、被殖民”的窒息感——这正是本书序言所指出的普遍生命体验在学生群体中的集中爆发。

第二，他们是“反编程”意识最易觉醒的群体。正因为他们的“商品化”过程尚

未完成，仍处于“编程进行时”，资本逻辑对其生命轨迹的粗暴干预与对其主体性的压抑，便显得尤为赤裸和令人反感。他们对“为何学习”、“成为何人”、“时间何属”的追问，直接撞击着资本教育逻辑的虚假核心。一旦经由理论启蒙（如揭示“三元辩证”与“生命殖民”的分析），他们便能迅速识破“绩效竞争”、“精致利己”、“职业规划”等意识形态面纱，认识到自己并非在“自我投资”，而是在被“系统编程”。这种从“编程对象”到“反编程自觉者”的转化，在这一群体中具有较高的可能性与内在动力。

第三，他们承载着乌托邦激情与对总体性解放的直觉。不直接参与物质生产，使其免受现实生产关系中复杂利益的即刻羁绊，从而保有对社会发展更为理想化、更具总体性视野的关切，乃至一种“不顾后果的激情”。这种激情若被正确引导，不被引入虚无的激进姿态或妥协的精致利己，便能转化为追求彻底解放——即“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的宝贵精神力量。他们对于打破一切领域（教育、闲暇、社交、数据）异化状态的渴望，与第二阶段社会革命所要求的“日常生活全面民主化”的目标天然契合。

历史对此已有先声：当我们将视线投向历史，更能清晰看到学生作为先锋的潜能。无论是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还是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都在不同层面印证了这一点。在“五四运动”中，最先觉醒并走上街头、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正是深感民族危亡与旧文化窒息的学生。他们不仅是反帝爱国斗争的先锋，更掀起了深刻的思想启蒙，为后续更广泛的社会革命播下了火种。在“五月风暴”中，巴黎学生率先对僵化、异化的教育体制与社会压抑提出激烈抗议，其口号“严禁禁止！”（Il est interdit d'interdire!）直指一切不合理规训的本质。他们迅速与罢工工人结合，形成了“学生要自由，工人要权力”的共振局面，学生高呼着“想象力夺权”，而工人则追求对生产过程的掌控。这两次运动虽结局不同，但都鲜明展示了：当学生群体将其对自身处境（被教育体系规训、对未来异化的预感）的敏锐批判，与工人阶级对社会经济基础的深刻诉求相结合时，便能爆发出撼动旧秩序的惊人力量。

当然，称这部分学生为先锋，并非指其主动承担了革命历史纵深中冲锋陷阵的核心任务，而是在当下新的时代格局与资本形态下，革命的火种极有可能由这一部分学生群体以自觉或自发的行动点燃。他们未必在主观上承担启蒙者的角色，却必然以自身行动向世界宣告变革的到来。而真正启蒙和唤醒广大革命主体的，也不是这部分学生本身，而是他们所开展的斗争。这部分学生并非独立于无产阶级之外的旧式精英，而是无产阶级内部最先感知现实苦难、最先向苦难发起抗争的先锋力量。他们或许会因经验薄弱、组织性较差遭遇阶段性失败，但必然完成自身使命：向资本主义下达第一份判决书，向工人、农民，向所有丧失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实际掌控能力的劳动者，向全体无产阶级发出第一份抗争的邀请函。

需要特别澄清的是：将学生中的这一群体定位为“先锋”，绝非基于对其组织能力、斗争经验或历史主动性的浪漫想象。恰恰相反，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个群体因其尚未被雇佣劳动完全吸纳的处境，往往组织涣散、经验薄弱，他们的抗争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能以失败告终，甚至被历史湮没无闻。

但这并不构成对这一判断的否定。

因为“先锋”的意义，从来不是由“成败”来衡量的。先锋的存在，根植于历史

矛盾自身的运动逻辑，而非任何个体或群体的主观意愿。

只要资本对劳动力生产的编程还在继续——只要教育仍然是“人力资本”的驯化，只要技能塑造仍然被就业市场绑架，只要年轻人仍然在被“未来出路”的焦虑驱策——那么，那些对这一编程感知最敏锐、对这一异化体验最切身的群体，就必然会站出来。

这不是因为他们是“先知”或“英雄”，而是因为：他们是矛盾最密集的载体。他们的焦虑、迷茫、挣扎，本身就是资本逻辑在生命层面的展开形式。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这种展开必然外化为行动——哪怕是不成熟的、盲目的、注定失败的行动。

至于站出来的具体是哪些人，哪一波人会失败，哪一波人会被遗忘——历史并不在乎。正如潮汐不在乎某一朵浪花能冲到多高，地质运动不在乎某一块岩石在何处碎裂。重要的是：只要矛盾还在，浪就会涌；只要张力还在，石就会裂。

失败，是矛盾积累的形式。

遗忘，是矛盾换装的方式。

而“站出来”本身，就是矛盾在运动中的必然显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不寄希望于学生的“成功”，也不恐惧于学生的“失败”。我们只是确认一个事实：只要资本对劳动力生产的殖民没有终结，这个群体就必然会以自己的方式，向世界发出第一份判决书。这份判决书可能被撕毁，可能被遗忘，可能在当时看不出任何效果——但它的意义，不在它产生的“后果”，而在它本身就是矛盾存在的证据。

后人会看到这个证据。不是因为他们记住了具体的人，而是因为他们会发现自己也站在同样的矛盾中，也会被同样的力量逼着站起来。到那时，前人的失败就成了后人的地平线——不是作为“榜样”，而是作为“必然”的又一次证明。

这才是“先锋”在历史辩证法中的真实位置：他们不是火炬的传递者，而是矛盾自身的脉搏。他们的每一次跳动，都在说：只要编程在，反抗就在。

因此，将这一学生群体视为先锋，并非否定工人阶级的根本作用，而是基于当代支配逻辑的研判：斗争的前沿已从工厂围墙之内，扩展至劳动力被生产与再生产的全部生命政治领域。先锋队的任务，首先在于在意识形态层面刺破殖民的幻象，在尚未被雇佣劳动完全规训的心灵中，播下“生命主权”意识的火种。历史经验表明，学生的先锋作用能否转化为真正的历史推动力，关键在于其批判意识能否与工人阶级的根基性力量、与广大劳动者的物质诉求深刻结合。“五四”精神最终汇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五月风暴”的激浪也深刻冲刷了战后西方的社会政治景观。在今天，这意味着觉醒的学生必须将“反编程”的诉求，与外卖骑手反抗算法支配、程序员争取数据权利、产业工人要求缩短工时并参与管理等一系列夺回“劳动力生产掌控能力”的具体斗争紧密联系起来。

工人阶级（包括广大产业与服务业劳动者）依然是革命的根基。他们承受着剥削与殖民的最直接、最沉重的肉身化代价，是变革生产关系最坚决的物质力量。农民作为受资本全球化与农业资本化压迫的重要群体，是斗争中不可或缺的战略同盟。

因此新的革命主体，是在资本全景殖民下，所有感受到自身“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被剥夺的个体的历史性联合。其中，觉醒的学生先锋扮演着“殖民逻辑的率先识破者”与“解放意识的初期点燃者”的角色；工人阶级是“制度性力量的承载者”与“根本变革的实行者”；农民是广泛的“反体系斗争的同路人”。历史启示我们，只有当先锋的敏锐洞察与根基的深厚力量、同盟的战略支持在具体的斗争中辩证统一，形成共振，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凝聚起足以撼动资本生命政治统治的、具身化的革命伟力。

(四) 统一战略：无产阶级革命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自其开端便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然而，这一事业的实践展开，却始终扎根于具体民族国家的社会土壤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点明这一辩证关系——既强调“工人没有祖国”，指明无产阶级解放的世界性超越性；又明确“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确立民族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场域[42]。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43][44]，更是从实践层面印证：脱离民族性的世界性是虚妄的，脱离世界性的民族性是狭隘的。因此，正确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是决定革命成败与发展方向的关键战略问题。任何将二者割裂或对立的倾向，都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一方面，片面强调民族性而忽视世界性，将导致革命的自我封闭、身份撕裂与最终蜕变。这种路径将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狭隘地锁定于建立一种自给自足的民族自立政权。然而，在一个依然由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所主导的星球上，这种政权将立即陷入一个无法回避的“阿克琉斯之踵”式的矛盾：当无产阶级在国内成为“国家的主人”，却必须让这个“主人的国家”以被压迫的“工人”身份（即提供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边缘位置）参与到不平等的世界市场体系中去时，其阶级身份与民族国家地位将发生根本性冲突。为了在竞争中求存，政权将被迫对内加大提取力度以积累资本，对外接受不平等的交换条件，从而在国内再生产出压迫性结构（强化官僚机器、压抑劳工权利），在国际上则可能滑向与帝国主义霸权进行实力角逐的民族主义，甚至与本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兄弟形成竞争关系。这种对内的资源抽取，本质上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边缘国家的剥削具有同构性——正如西方教育体系通过分层筛选为资本塑造等级化劳动力，这类政权的内部压迫，实则是资本逻辑在民族国家边界内的异化再现，最终将无产阶级的解放目标异化为国家资本的增殖需求。苏联后期的发展轨迹便是典型例证：冷战格局下，苏联逐渐走向与西方世界的全面隔绝，片面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民族-国家集团属性，忽视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性联结。为了在军备竞赛中与美国争霸，苏联不断强化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资本积累，加大对农业和轻工业的资源抽取力度，导致民生短板长期存在；对外则将阵营团结异化为大国主导的势力范围划分，违背国际主义原则，最终使社会主义建设偏离初衷，成为解体的重要诱因。最终，革命的国际主义灵魂被民族生存的现实主义所吞噬，“社会主义”极易蜕变为一种对内专制、对外依附或争霸的、带有浓厚国家资本主义乃至封建色彩的封闭体制。

另一方面，空洞强调世界性而忽视民族性，则会使革命沦为脱离实际的虚妄口号，招致惨重失败。如果不深入研究本国具体的社会矛盾、阶级结构、历史传统与文化心理，而试图机械照搬他国模式或等待一场抽象的“世界革命总爆发”，

那么革命策略必将脱离群众，成为无根之木。这种“虚张声势”的世界主义，会导致革命力量无法在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政治斗争的基本场域中，建立起巩固的阶级联盟与政权基础。第二国际后期的破产堪称深刻教训：部分理论家陷入空洞的世界主义误区，主张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盲目宣扬“工人没有祖国”，却未能结合不同国家的殖民处境、封建残余等现实制定革命策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多数社会民主党领袖放弃国际主义原则，转而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战争政策，号召工人“保卫祖国”，直接导致第二国际的瓦解。其结果，要么是盲动主义带来的直接溃败，要么是革命成果因缺乏深厚的民族社会根基而异常脆弱，无法有效组织防御与建设，最终在内外压力下夭折。

因此，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必须实现民族性与世界性在具体历史实践中的有机统一。这要求：

1. 立足民族场域，完成具体革命：必须首先在民族国家范围内，通过深刻的社会分析，制定出符合本国实际的革命战略与纲领，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完成夺取政权与基本制度变革的历史任务。这是世界性事业的出发点和坚实基础。

2. 利用世界体系，壮大自身根基：在取得政权后，必须具有高超的战略智慧，主动利用而非被动隔绝于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市场与经济联系。其目的，是在承认不同制度长期共存的现实下，借助全球化生产链、技术扩散与贸易网络，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夯实其物质与文化基础，以此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生命力。

3. 把握世界规律，推进国际联合：与此同时，必须时刻牢记革命的最终视野。这意味着，要科学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危机周期与霸权变迁规律，将本国的发展与国际阶级斗争的全局相联系。要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在实践中探索符合新时代条件的无产阶级国际联合形式（如战略协调、经验共享、对共同敌人的揭露与抵制）。民族政权的巩固，最终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世界范围内对资本的批判与超越。

唯有坚持这种辩证统一，无产阶级的革命与建设才能既脚踏实地，又不失星辰大海的航向；既能在资本主义的围堵中站稳脚跟、发展壮大，又能始终保持其超越民族国家局限、指向人类普遍解放的崇高革命性。这既是历史的教训，也是未来的指南。

(五)历史辩证法的统一——从资本主义批判到社会主义的自我革命

在系统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全景敞视”机制完成对生命三个领域的殖民，并重构了其“生存依赖”与“私人掌控”之间的根本矛盾后，一个不可避免的、更具历史纵深的问题浮现出来：为何在许多已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第一阶段政治革命”的社会中，劳动者依然普遍体验到与资本主义社会相似的“内卷”、“倦怠”以及对自身生命节奏的“失控感”？

这种境遇的相似性，绝非历史的偶然或理论的悖论，而是历史辩证法在当代最深刻的显现之一。它非但不能否定我们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有效性，反而以一种近乎残酷的实证方式，确证了我们所揭示的支配逻辑的顽固性，并为我们所提出的“两阶段革命”纲领——尤其是其不可或缺的第二阶段社会革命——提供了最迫切的现实注脚。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者所承受的异化之苦，其根源具有双重历史性质，必须予以清晰辨析：

第一重根源，是旧世界体系的残余与侵袭。社会主义政权诞生并存在于一个仍由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金融体系和技术范式所主导的全球环境之中。资本逻辑作为一种强大的“引力场”，通过贸易链条、技术依附、文化渗透以及竞争压力，持续从外部施加影响，试图将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关系拉入其价值增殖的轨道。更为关键的是，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极具预见性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9]。这种深刻的论断揭示了，即便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确立之后，“资产阶级的法权”观念与管理形式——如默认天然差别的分配原则、科层化的生产指挥、对劳动绩效的物化衡量——仍会在社会肌体中残留，并可能在新制度的外壳下，异化地再生产出某种与资本主义同构的支配关系，导致劳动者“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在形式上被承认，却在实质上被悬置，即劳动力的商品化买卖随着私有制被废除，被禁止。但劳动力的商品化安排仍然存在，而这便是第二阶段，也就是迈向共产主义社会所需要进行的革命与变革，也就是下面的第二重根源的在法权残余上的体现

然而，第二重根源才是更具本质性的：它是“未完成的革命”所标定的历史任务。初级阶段所暴露的这些矛盾，恰恰是“第一阶段政治革命”（夺回生产资料）胜利后，“第二阶段社会革命”（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尚未彻底展开或完成的直接症候。如果社会主义事业在夺取政权后便宣告终结，停滞于法律意义上的所有制变更，那么，旧世界的法权残余与资本逻辑的入侵，便会迅速填补“劳动力生产过程”这一权力真空。教育可能再度沦为技能驯化，工作场所可能退化为新型绩效牢笼，闲暇生活可能被消费主义与数据提取重新殖民。劳动者的痛苦，在这个时候，便不再是遭受外部资本家剥削的痛苦，而是“自身解放进程被中断、自身革命主体性被架空”的痛苦。这是一种更深层的历史性焦虑，它昭示着，没有第二阶段对生活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民主化改造与生命主权的夺回，第一阶段的政治胜利便有被悄然侵蚀甚至逆转的危险。

因此，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生命政治殖民的批判，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在张力的洞察，在历史辩证法的进程中统一于同一个解放坐标之上。它们从正反两面，共同论证了“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这一纲领的绝对核心地位：

-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夺取这一能力，意味着人的彻底物化与生命时间的全面殖民，最终将激化其“生存依赖”与“私人掌控”的致命矛盾。

-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夺取并实践这一能力，意味着革命可能止步于上半场，旧世界的幽灵将在新的形式下还魂，使“解放”的承诺停留于纸面。

于是，我们两阶段的革命纲领，便超越了单纯的政治更替方案，升华为一个关于“人的解放何以必须是一场持续贯透全部社会生活领域的深刻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宣言。它要求我们，无论在何种制度起点上，都必须将斗争的焦点，坚定不移地指向那个最终决定我们是自身生命的主人，还是被某种逻辑（无论是资本增殖的逻辑，还是其变异的官僚计划逻辑）所编程的对象的根本权力——即对我们自身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全过程的、具体的、可实践的掌控权。唯有完成

这一步，从资本主义中脱胎而来的新社会，才可能真正跨越其“初级”阶段，向着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条件的共同体，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六）关于劳动力商品化的几点补充

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对未来解放道路的探索中，“劳动力商品化”始终是我们一切分析的基石。马克思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揭示了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一历史事实，如何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部奥秘与全部残酷性的起点。然而，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一个更为精细的理论区分逐渐浮现，它对于我们理解资本升维后的统治逻辑，以及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阶段性任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这个区分在于：传统的“劳动力商品化”概念，往往被我们笼统地理解为劳动者在市场上“出售”自身劳动力的那一刻。然而，为了更精准地剖析当代资本对生命过程的全面殖民，我们必须认识到，劳动力商品化是一个包含三个内在统一、却又可被清晰辨析的环节的完整过程。这三个环节分别是：劳动力的商品化生产、劳动力的商品化买卖，以及劳动力的商品化安排。

对这一“三分法”的澄清，并非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否定，而是其“劳动力”与“劳动”区分的逻辑延伸与当代深化。它让我们得以穿透现象，看清资本支配的完整链条，并为本书提出的“两阶段革命”纲领，提供了更为坚实和精微的理论注脚。

一、劳动力商品化的三重维度

1. 劳动力的商品化生产：这是最深层的、也是资本主义得以启动的前提性环节。它指的是，劳动者自身劳动力——这种原本内在于生命、用于实现自主目的的能力——其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本身，开始从属于资本增殖的逻辑。这里的“生产”，不仅指生物学意义上的繁衍，更关键的是指通过教育、技能培训、健康维护、社会化过程，将一个人塑造为符合市场要求的、可被雇佣的“劳动力商品”的全过程。当教育沦为“人力资本”的投资，当健康维护被视为维持“劳动效能”的手段，当闲暇时间被编码为“自我升级”的时段，劳动力的商品化生产便已完成。在这个环节，资本不直接购买劳动力，但它像一位远见的“育种师”，从源头上规划着未来商品的“规格”与“品质”。

2. 劳动力的商品化买卖：这是最经典的、也是马克思理论聚焦的核心流通环节。它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将自身在一定时间内的劳动力使用权，作为商品出售给资本家的行为。这个环节的标志是雇佣合同的签订，劳动者获得工资，资本家则获得对劳动力的支配权。这是“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法律与形式表现，是整个剥削体系得以建立的形式契约。

3. 劳动力的商品化安排：这是最直接的、也是资本完成价值增殖的决定性生产环节。它指的是，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之后，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这一商品进行消费、调度与组合的方式。这包括了劳动分工、流程设计、技术手段（如算法）、管理规章、绩效考评等一系列将劳动力转化为现实劳动、并榨取剩余价值的制度与技术安排。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丧失了“生产完整性”，沦为流水线上的一件零件或算法网格中的一个节点，正是“商品化安排”的直接后果。

这三个环节构成一个严密的闭环：

- 生产为市场预备可供买卖的“合格”商品；

- 买卖完成商品所有权（使用权）的合法转移；
- 安排则是对已购商品的最终消费，并在此过程中生产出新的价值和商品，同时为下一轮劳动力的再生产（即重新回到第一个环节）提供物质条件和新的规训。

其中劳动力商品化的生产是这一切的基础。而劳动力商品化的买卖则是整个流程的核心与关键，而关于劳动力商品化的安排，则是对生产与买卖可高效进行的保障。

二、革命的靶点：两阶段革命对劳动力商品化的逐层清除

正是基于对劳动力商品化三重维度的划分，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为何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必须是“两阶段”的，而绝非一次政治夺权就能一劳永逸。他以废除劳动力的商品化生产这一根基为彻底性目标——即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彻底的废除劳动力商品化——分两阶段分别针对劳动力的商品化买卖与劳动力的商品化安排进行革命。

· 第一阶段革命：政治革命——废除“劳动力的商品化买卖”

本书第五章明确指出，第一阶段革命的核心任务是“夺回生产资料与粉碎国家机器”，彻底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从劳动力商品化的视角看，这一阶段革命的锋芒，正是精准地指向了“劳动力的商品化买卖”这一环节。

当生产资料收归公有，当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关系被废除，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的前提条件便已瓦解。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被消灭，劳动者不再需要将自身的劳动力使用权作为商品，出售给任何私人所有者来换取生存资料。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力的商品化买卖”在法律和形式上被彻底革除了。这是解放事业的决定性一步，它斩断了资本通过所有权垄断来控制劳动力的那条最粗的绳索。

· 第二阶段革命：社会革命——废除“劳动力的商品化安排”，最终消灭“劳动力的商品化生产”

然而，第一阶段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商品化的终结。正如我们在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在张力时所揭示的，如果革命止步于此，“劳动力的商品化安排”便可能以一种新的、异化的形态残存下来。在公有的生产单位内部，如果劳动过程仍然由一套僵化的、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所支配，如果劳动者仍然无权参与生产决策、无权掌控劳动节奏、无权决定技能的运用方式，那么他们作为“劳动力商品”在生产过程中被“安排”的异化命运就并未改变。他们可能不再是为某个资本家打工，但依然像是在为某种抽象的“国家计划”或“官僚意志”提供被动的、工具化的劳动。这便是旧世界法权残余与管理形式在新制度外壳下的复归。

因此，第二阶段革命的终极任务，就是直指这个更隐蔽、更顽固的环节——废除“劳动力的商品化安排”。通过教育、健康、时间、发展等领域的民主化重塑，通过建立“劳动力生产组织安排委员会”等权力制衡机制，让劳动者真正成为自身劳动过程的主人，实现“生产领域协作服从”与“再生产领域自主支配”的辩证统一。当劳动者能够自主地决定“如何生产”、“为何生产”，当劳动过程不再是外部强加

的一套程序，而是劳动者联合体自由自觉的活动时，“劳动力的商品化安排”才被最终废除。

而“劳动力的商品化安排”一旦被废除，其上游的“劳动力的商品化生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当劳动不再是为了生产可供买卖和安排的“商品”，而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的真实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时，对劳动力的“生产”（即教育和培养）也将随之发生质变。它将从一种服务于市场交换的“人力资本投资”，彻底回归为一种服务于人自身潜能绽放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过程。至此，劳动力商品化的全部三个环节，才被真正、彻底地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三、 理论意义

这一补充的意义在于，它将我们“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这一核心纲领，锚定在了对“劳动力商品化”的深层解构之上。它清晰地告诉我们：

- 第一阶段革命，革的是“买卖”之命，是形式的解放；
- 第二阶段革命，革的是“安排”之命，并最终消灭“生产”之命，是内容的解放、实质的解放。

没有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无源之水；没有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可能走向异化。只有将两阶段革命视为对劳动力商品化这一复合体的逐层、彻底的清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何“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是一场关乎人类存在方式的、最为深刻的总体性革命。这便是我们在思考的终点，返回起点，所获得的新启示。

第六章：权力的解放

前文我们系统性地分析了资本的当代升维，并通过两阶段的革命路径，系统性地打破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第一阶段革命）与劳动力商品化（第二阶段革命），彻底抽掉了资本主义的根本基石——劳动力商品化，彻底破坏了资本主义不断生长的现实土壤。但真正的解放，不仅要警惕资本主义复辟，还要防止权力的异化。而关于权力的解放，必须放在历史与当下去考量。

（一）权力的来源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权力被明确界定为源于私有制[45]。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私有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它总是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这一相对模糊的面具示人——无论是奴隶主占有奴隶本身（将人视为生产资料的一部分），封建主占有土地，还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家占有工厂与机器，权力的运作始终被包裹在“对物的支配”这一可直观的表象之下。然而，这只是历史为权力披上的外衣，而非其赤裸的真相。

直到数字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与壮大，私有制最深刻的目的与最根本的追求，才逐渐摘下它伪装的面具，使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本书第三章已揭示当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层奥秘：对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私人掌控。这一资本主义的本质目的，正日益摆脱对固定、有形生产资料的依赖，通过算法、数据、平台和协议等新型权力形态，实现其直接的外化。资本不再满足于占有工厂让工人在其中劳动，而是要直接编排劳动的全过程——从技能习得的方向、工作节奏的快慢、身心再生产的质量，到闲暇时间的利用、情感投入的深浅，乃至无意识层面的欲望与焦虑。至此，私有制几千年来来的真正野心终于显现：它从来不是要占有物本身，而是要通过对物的占有，获得对“活的东西”——即人的劳动力及其生产过程——的支配权。

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制约，这一本质目的始终无法直接登场，只能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这一中介形态出现在人民面前。奴隶社会生产力低下，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高度依赖对奴隶身体的直接占有，于是权力呈现为“对人身的占有”；封建社会以土地为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劳动力附着于土地，于是权力呈现为“对土地的占有”；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机器大工业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劳动者成为“自由得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于是权力呈现为“对资本（物化劳动）的占有”。每一时代的权力形态，都是其生产力水平所允许的最有效的支配形式。

因此，权力的真正来源，是对劳动力的组织与安排的需要；权力的实质，则是一种对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支配权[46]。这一来源与实质，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具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它总是以该时代最核心的生产资料为中介，通过对物的占有来实现对劳动力生命过程的掌控。

这一逻辑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经历了一次关键的理论突破。马克思通过对“劳动”与“劳动力”的严格区分，将“劳动力商品化”确立为剩余价值的基石[1]，从而在科学上第一次揭示：资本家购买的不是“劳动”（这是无法买卖的），而是“劳动力”——即劳动者在特定时间内运用自身能力进行创造的可能性。这一区分，已经

触及了权力的真正内核：资本要支配的，不是已经完成的劳动成果，而是尚未发生的、正在进行的、持续生成的劳动力本身。然而，即便如此，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私有制仍然处于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它仍然需要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支撑和掩盖其真正的目的，因为离开了对工厂、机器等有形物的垄断，资本就无法实现对劳动力的有效支配。直到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其具体发生机制前文已有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言），当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资料、算法成为新的管理工具、平台成为新的组织形态时，资本才第一次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固定有形物的依赖，直接对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全过程进行精细化编程。至此，权力的真正来源与真实面貌，终于在资本主义的巅峰时刻第一次完整地来到我们面前。

于是，我们终于可以给出一个贯穿全部文明史的权力定义：

权力，植根于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特殊能力——即劳动力的组织、安排与支配的欲望；它在千百年的历史中，始终将自己隐藏在生产资料（或更简单地理解为“资源”）的背后，以对物的占有为面具，行对人的支配之实。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正是要撕下这副面具，让权力回归其作为“社会组织共同生产能力”的本来面目，使对劳动力的支配，转化为劳动者对自身生命过程的自觉掌控。

（二）权力异化的防御

前文我们通过两阶段的革命理论来突破资本复辟，所用到的方法是断其本源、自溃于内的打法——彻底抽掉劳动力商品化这一资本主义的根本基石，使其丧失不断再生的现实土壤。那么，对于权力异化的防治就万不可如此了。因为对劳动力的有效支配，不仅仅是权力的基石与根源，也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必要举措，或者说要素。若抽离了这一根本，将会造成“人不将人”的后果，就会使我们陷入一种盲目倒退回家庭手工业时代的错误思潮。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点：只要人类社会还需要组织，只要人类社会还需要生产，只要人类社会还需要发展，权力就必然存在。我们无法、也不能像革除资本主义那样，通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去彻底打破其不断生长的温床。权力不是一种需要被“根除”的病灶，而是社会有机体赖以运转的神经系统——它可以发炎、可以病变，但不能被切除。因此，对于权力，我们必须采取一套防治的机制，而非根除的路径。

当第一阶段革命胜利、无产阶级专政得以确立之后，一个根本性的课题便摆在面前：我们如何防止新生的公共权力蜕变为新的支配力量？苏联的官僚异化、东欧的“国家资本主义”转向，早已用血的教训警示我们：生产资料公有化并不能自动保证权力的公有化，所有权的转移并不能自动防止支配权的异化。如果不能在夺回生产资料的同时，同步建立起对权力本身的制约机制，那么革命胜利的果实就可能被新的官僚-技术精英所侵蚀。

但必须首先明确：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权力防御机制，并非脱离全书主线之外的“附加题”，而是与“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这一核心目标同步推进、内在统一的。它是同一场革命在权力层面的必然展开——如果说“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是要在经济基础层面废除劳动力商品化、实现劳动者对自身

生命过程的自主支配，那么权力的防御机制则是在上层建筑层面确保这种自主支配权不会因权力的异化而被架空。二者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经济基础的变革，权力防御只是空中楼阁；没有权力层面的制约，经济成果终将被新的支配形式所侵蚀。因此，本节所讨论的一切制度设计，都从属于且服务于“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这一最终目标，是这一目标在公共权力运作领域的具体实现形式。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早年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理想[47]，获得了具体的制度指向。这一理想在本书的理论脉络中，转化为一个具有深远历史维度的制度要求：成立“劳动力生产组织安排委员会”。若从性质上来看它不是一个强制性的管理机构，更不是一个凌驾于劳动者之上的“统治”机构。恰恰相反，它是一个站在劳动者立场上、帮助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生产过程进行监督与管控的服务性机构。它的职能不是“统治”个人的劳动力生产与安排，而是帮助劳动者管理好社会层面的劳动力生产与安排——即协调千百万劳动者个体自主决策之间的相互关系，处理单个劳动者无法独自应对的宏观协调问题，提供个体决策所必需的社会信息与公共资源。它如同一个“服务台”或“协调站”，而非“司令部”或“指挥部”。劳动者不是委员会的“下属”，而是委员会的“主人”；委员会不是向劳动者“发号施令”的上级，而是接受劳动者“委托授权”的公仆。这一性质界定，是我们讨论委员会一切具体制度设计的根本前提。

这一委员会的建立，发生在第一阶段革命之后、无产阶级专政至共产主义社会的漫长历史时期。它不是在资本逻辑内部对劳动力市场的“改良”，而是在推翻资本统治之后，对劳动力这一核心社会资源进行自觉配置的公共权力机构——但这里的“公共权力”，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统治权”，而是一种正在向“服务职能”转化的、尚带有强制痕迹但日益淡化的过渡性权力。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无产阶级将完成从“被统治阶级”到“统治阶级”再到“阶级消灭”的辩证否定，国家将从“阶级统治的工具”逐步消亡为“公共事务的管理机构”并最终归于消失，而劳动力作为社会再生产核心资源的事实却将永远存在。因此，劳动力生产组织安排委员会的形式、使命与原则，必然随着历史阶段的发展而不断调整、演变乃至最终扬弃自身。本节仅从宏观视角对这一制度的基本框架进行概述，其具体形态的展开，有待于未来无数代劳动者在实践中探索、试错与创造。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当资产阶级刚刚被推翻、旧社会的痕迹依然浓重、劳动者普遍缺乏自我管理经验之时，委员会必然带有较多的“国家”色彩——它需要借助一定的强制力来镇压反抗、组织生产、保障供给。此时的委员会，是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权力来源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志，其运行依赖于铁的纪律和集中统一。但即便在这一阶段，委员会的服务性质也必须得到坚持：它的强制力指向的是阶级敌人和旧社会残余，而非劳动者自身；它对劳动者实行的“组织”和“安排”，本质上是劳动者阶级通过自己的代表对自己实行的自我管理，而非外在强加的奴役。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剥削阶级被彻底消灭、劳动者自我管理能力的普遍提高，委员会将逐步“去国家化”。它不再需要借助强制力来推行决策，而是日益成为纯粹的协商平台；它的决策不再是指令性的“命令”，而是基于充分讨论形成的“共识”；它的成员不再是被任命的“官员”，而是由劳动者直接选举产生并可随时撤换的“代表”。这是委员会从“统治工具”向“共治平台”过渡的关键阶段。

最终，当阶级彻底消亡、国家完全消亡、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时，委员会也将完成其最后的蜕变。它将不再具有任何“权力”属性——因为那时已不存在任何需要被“统治”的对象，也不存在任何可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制力量。它将成为一种纯粹的技术性、服务性机构，其职能仅仅是收集信息、提供建议、协调节奏，而所有决策都将由劳动者共同体直接做出，所有执行都将基于自觉自愿的协作。此时的委员会，已经不再是“权力机构”，而是“自由人联合体”内部的“服务节点”。

本节以下讨论，将从宏观视角勾勒这一委员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基本制度框架。至于其在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及共产主义社会的演变形态，则有待于历史实践的展开和后人智慧的填充——任何试图为遥远未来绘制详尽蓝图的做法，都将是脱离历史辩证法的空想。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劳动力生产组织安排委员会”的使命是明确的：在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社会总劳动力如何配置、生产技能如何培养、劳动时间如何分配、再生产资源如何投入——这些曾经由资本逻辑自发调节（实则盲目统治）的领域，必须转入自觉的社会调节。委员会正是承担这一调节职能的核心机构。它不是高高在上的“计划者”，而是由劳动者代表、技术专家、社会公众共同构成的协商平台；它的决策不是自上而下的指令，而是经过充分讨论、信息透明、可追溯、可问责的集体意志的表达。劳动者通过委员会实现对社会层面劳动力生产与安排的监督与管控，同时保留对个体层面劳动力支配的最终自主权——二者的有机结合，正是“夺回劳动力生产掌控能力”在制度层面的完整实现。

正是在这一制度框架内，我们可以批判性地吸纳 HakkiTan 论文中的一系列精妙设计[48]，将其从“反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语境，转化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防异化”的治理机制：

其一，机构凋亡（Institutional Apoptosis）机制的植入。该论文提出的“凋亡”概念，借鉴了生物学中细胞编程性死亡的原理——当机构达到预设的“行政熵值”（如官僚化程度超标、决策效率下降、与基层脱节加剧）时，自动触发解散程序。这一机制可以直接嵌入“劳动力生产组织安排委员会”的制度设计：委员会实行任期制，届满后必须重组；同时设置动态评估指标，当内部层级超过一定数量、决策流程超过一定时限、或成员连任超过一定次数时，自动启动“凋亡”程序，由新产生的委员会取而代之。这是对米歇尔斯“寡头铁律”[49]的结构性破解——不是依靠领袖的品德或群众的警觉，而是依靠制度的自动瓦解机制，防止任何机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走向僵化与异化，确保委员会始终作为“服务者”而非“统治者”存在。

其二，否定性主权（Negative Sovereignty）与分形切断（Fractal Severing）的融合。该论文对施米特“主权就是决定例外状态”的经典定义进行了彻底颠倒：主权不再是“统治的权利”，而是“停止的能力”——且这一能力被移交给了最脆弱的个体。在我们设计的委员会框架中，这意味着：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每一个劳动者，在其劳动力被组织与安排的过程中，如果感受到这一安排对其生命过程造成了实质性侵害或异化风险，拥有无须理由、即时暂停该安排的权利。这就是“否定性主权”在劳动力生产领域的具体化——不是对生产过程的否决，而是对侵害性安排的暂停。它直接服务于“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这一目标，是劳动者在权力层面握有的最后防线，也是委员会“服务性”而非“统治性”的最有

力保障——因为劳动者始终保留着对委员会决策的最终否决权。

但问题随之而来：如果每个个体都拥有这样的暂停权，会不会导致“否决权暴政”（vetocracy），使整个社会生产陷入瘫痪？这正是该论文以“分形切断”机制回应的难题。所谓“分形切断”，是指受害节点有权暂停侵害性流程，但这一暂停是局部隔离的——它只中断针对该个体的侵害性安排，而不影响宏观网络的整体运行。在劳动力组织安排的场景中，这意味着：当某位劳动者对其被安排的岗位、工时、培训方式提出异议并行使暂停权时，受影响的是与该劳动者直接相关的安排环节，而非整个委员会的工作流程。暂停期间，委员会必须对该安排进行重新审议，并向劳动者提供明确的目的性告知（详见下文）；若事后证明该暂停是“战略性受害者”（即滥用权利），则其网络特权将被清零。这一设计，既保障了个体对抗异化的最终防线，又防止了权利的滥用对集体生产能力的破坏——它尤其适用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既要保障劳动者权利、又要维护社会生产连续性的复杂要求。

其三，目的性明确告知的制度化。在我们设计的委员会框架中，每一个劳动力安排决策，都必须向被安排的劳动者提供完整的、可理解的、可追溯的说明：这一安排是为了实现什么社会目标？它是如何服务于这一目标的？在这一安排的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哪些异化风险？委员会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防范这些风险？劳动者对这一安排拥有哪些监督权、申诉权和暂停权？

这一“目的性明确告知”的要求，正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权力透明度的具体落实。劳动者之所以接受安排，不是因为他们被权力强迫，也不是因为“国家代表人民”的抽象口号，而是因为他们理解并认同这一安排的社会必要性，且确信自己的权利边界得到了制度性保障。当安排的目的被遮蔽、过程被黑箱化、风险被隐瞒时，服从就沦为奴役；而当一切都被置于透明的、可追问的光照之下时，服从就转化为自觉的协作。这种自觉协作能力的培育本身，就是对“夺回劳动力生产掌控能力”在意识层面的深化，也是委员会“帮助劳动者管理”这一服务性质的具体体现——它不是替劳动者做决定，而是帮助劳动者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然而，当我们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制度设计之后，回过头来看，却发现真正的制度不应该是纸上谈兵的幻想，而是必须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试错、在实践中发展。我们必须认识到：事为之防，曲为之制[50]。如果我们用一种精妙绝伦的制度设计去试图防止权力的异化时，也必须去直面这一制度设计可能会引起的精密性停摆的问题——机制越精细，环节越复杂，任何一个节点的故障或滥用，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局部乃至全局失灵。分形切断会不会被滥用？凋亡机制会不会误触发？目的性告知会不会沦为形式主义的“告知义务”而非真正的“理解保障”？这些问题，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设计能够事先给出完美答案。

但无论如何，权力的实质总是对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有效支配权，它的根源是且只能是劳动力的组织与安排。那么，我们对权力异化的防止，也绝无法绕开这一根本：即使劳动力的组织与安排已经在法律或其他层面被归为“共有”，但只要劳动力还需要被安排，权力就时刻存在着异化的风险。我们的革命与改革，也永远不会停息。

这正是我们将“权力解放”置于第二阶段革命之后来讨论的深层用意所在。第一阶段革命（夺回生产资料）可以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胜利时刻”——当资产阶级

国家机器被粉碎、生产资料实现社会化占有时，我们可以说“革命成功了”。但第二阶段革命（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权力解放”，却不可能有这样一个终点。因为只要社会还需要组织生产，权力就必然存在；只要权力存在，异化的可能性就永远潜伏其中。因此，第二阶段革命的真谛，不是建立一个“完美无缺”的制度，而是建立一套能够持续自我批判、自我革新、自我革命的制度。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夺权，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防御战”——防御权力从“共治权”退化为“统治权”，防御机构从“服务者”异化为“吞噬者”。

而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劳动力生产组织安排委员会”及其配套机制——凋亡、否定性主权、分形切断、目的性明确告知——正是这场“防御战”的第一道防线。它们建立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实基础之上，与“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这一核心目标同步推进，是这一目标在权力层面的具体实现形式。它们在第二阶段革命的漫长征程中接受实践的检验、试错与发展。它们不是对权力的“根除”（那是不可能的），而是对权力的“驯服”——让权力在必然存在的前提下，始终保持对劳动者主体的可问责性，始终保持被质疑、被暂停、被重组、被“杀死”的开放性。

这一切探索的最终归宿，将在社会的进展中展开——当权力真正实现了从“统治”到“共治”的转变，当每一个劳动者都成为自身生命过程的主人，当社会不再需要强制性的政治权力来维持秩序时，我们或许可以开始谈论那个古老的梦想：权力的自我扬弃，即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最终飞跃[51]。但在那之前，我们必须扎根于这永不停息的、艰难的、充满困境的制度实验之中。

第七章：政治经济学的贫困

当代批判理论正沉醉于一种表面的繁荣。绩效伦理、情感剥削、算法治理、生命政治……这些范畴如精密探头，深入描绘着我们时代的神经症候：内卷的焦虑、倦怠的虚空、情感的麻木、数据的囚笼。以韩炳哲、霍赫希尔德及诸多平台批判者为代表的思潮，无疑贡献了一幅幅关于统治微观形态与主体痛苦体验的精细图谱。

然而，在这繁荣的诊断背后，一种深刻的理论倒置与随之而来的贫困已然成型。当批判的智识全力聚焦于权力运作的“如何”（技术、策略、话语）与主体感受的“何样”（焦虑、倦怠、异化）时，那个驱动所有“如何”与“何样”的“为何”——即作为总发动机的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与生产关系——却从视野的中心悄然滑落。痛苦被无比细腻地刻画，但其最根本的经济发生学却被悬置了。批判由此沦为对统治效应的精妙评论，而非对其经济动因的彻底清算。我们的时代陷入了一种“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贫困”——一种在上层建筑与主体性迷宫中的熟练导航，却伴随着对经济基础坐标系的选择性遗忘的状态——之中。

这种政治经济学的贫困，并非偶然的学术风尚，其根源恰恰在于资本主义统治方式本身的历史性深化与隐匿化。正如前文所论证的，资本的支配核心，已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与控制”（I）所实现的显性经济剥削，深化为“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III）的系统性剥夺所实现的隐性生命过程殖民。在流水线旁，剥削是可见的延长工时、压低工资；而在写字楼与算法平台中，统治则化身为对工作节奏的无形驱策、对职业发展的精细规划、对身心再生产的全面征用。前者是劳动者眼中可明确指认的“经济暴政”；后者则带来一种弥漫的、却难以溯源的焦虑、倦怠与空洞感——一种“感觉上的痛苦”。

正是统治形态的这种转变，蒙蔽了批判的视线。当痛苦不再直接呈现为饥寒交迫，而是呈现为“内卷”、“burnout”（倦怠）、“共鸣缺失”或“身份焦虑”时，理论便极易被引导，将批判的矛头从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转向承载和表达这些痛苦的文化形式、政治身份、心理结构或技术中介。于是，一种历史性的理论倒置发生了：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的诸种现象（文化、心理、技术），被误认为是痛苦自身的根源。

（一）与“生命政治”的根本分野

我们的前文的分析，尤其是对教育、工作与生活之全景殖民的聚焦，极易被归入“生命政治”[52]或社会批判的既定谱系。然而，我们必须进行一次坚决的方法论澄清：本书的批判视角，绝非对福柯式生命政治学说或任何当代悬浮理论的简单嫁接与延伸。

相反，我们的整个分析框架，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内核的范畴——“劳动力商品化”——出发，经过严格的内在推演所必然导出的当代结论。其逻辑链条坚实而清晰：

1. 历史前提：资本主义的根基，在于劳动力普遍转化为商品。

2. 经典命题：由此生发出雇佣劳动制、剩余价值剥削，以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劳动过程及产品的全面异化。

3. 当代深化：当资本积累从外延扩张转向内涵深化，其增殖逻辑必然要求超越对“劳动时间”的占有，进而寻求对“劳动力商品”自身生产与再生产全过程的掌控。资本必须关心如何更高效、更低成本地“制造”并“维护”其剥削对象。

4. 逻辑完成：于是，对生命过程（教育、健康、闲暇、情感、技能再生产）的系统性规划与殖民，便不再是某种外在于经济逻辑的文化或权力现象，而是资本为驾驭其自身生存条件（即可剥削的劳动力）而必须采取的统治形式的终极发展。

因此，我们揭示的“生命过程殖民”，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于福柯所描绘的、源于某种权力理性自治的“生命政治”[52]。福柯谱系学精妙地回答了权力“如何”管理生命[52]，却悬置了“为何在资本主义社会，生命必须以这种特定方式被管理”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我们的框架则致力于提供这一根本答案：因为劳动力是商品，而商品的生产必须符合资本增殖的需要。当资本增殖的逻辑从对“劳动时间”的占有，深化为对“劳动力商品”自身生产过程的掌控时，教育、医疗、闲暇、家庭乃至无意识领域，因其直接关乎劳动力的质、量与适应性，便必然被纳入资本的规划视野。

最终，这宣告了一种“从经济基础中长出的生命政治分析”的诞生。它坚持，任何试图脱离价值规律、剩余价值剥削与雇佣劳动关系来讨论当代生命权力运作的理论，无论其描述如何精妙，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中都是无根的浮萍。这样的理论或许能细致描绘牢笼的花纹，却无法指出锻造牢笼的钢铁来自何处，以及打开牢笼的钥匙藏于何方。

(二)收编手术：在政治经济学的光源下透视“悬浮批判”

在统治形式从显性经济剥削向隐性过程支配转型的背景下，一系列聚焦于文化、心理与技术的当代批判理论应运而生。它们虽敏锐捕捉了新的痛苦症候，却普遍因未能穿透现象而陷入“悬浮”。而这也正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运用我们以“劳动力商品化”及“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对其进行一场彻底的收编手术。

这场手术的核心切口在于：我们必须扭转一种根深蒂固的理论倒置。悬浮批判将统治的症候（内卷、倦怠、情感麻木、数据焦虑）视为分析的起点甚至终点，从而在文化、心理、技术的迷宫中流连忘返。我们的框架则坚持，这些症候仅仅是次生现象，是更深层经济暴力在主体体验与上层建筑领域的投射与变形。真正的起点，必须是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其生命过程被资本逻辑系统性殖民的政治经济学现实。基于此，我们可以展开一场连贯的清算。

以“绩效社会”理论[53]为例，它正确地指出自我剥削已成为当代人的生存常态，却错误地将这种强迫性的“自我驱动”归结为某种“肯定性”的文化精神或心理学转向。这一诊断的谬误，在于它抽离了驱使个体无尽优化的经济强制力。在弹性积累成为主流、长期雇佣关系瓦解的背景下，劳动者“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已脆弱不堪。为了在市场上维系自身劳动力商品的交换价值，个体不得不将整个生命时间与能量，重塑为一场针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持续投资与效能竞

赛。“绩效”并非一种文化选择，而是在不稳定的商品地位中维持生存的强制性生存策略；“倦怠”也非心理调节的失败，而是这种策略长期运行后必然的身心耗竭。因此，批判的锋芒不应指向“绩效”观念本身，而必须穿透这层心理迷雾，直指制造这种普遍竞争性与生存焦虑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雇佣制度本身。解放的可能性，不在于调节心态，而在于改变劳动力作为商品被估价、出售与不断“优化”的命运。

类似的逻辑倒置也弥漫于泛化的“情感劳动”论述中[54]。该论述成功地将再生产劳动，尤其是女性劳动，推至理论前台，却常常在道德化或去阶级化的泛论中模糊了斗争的焦点。当“情感劳动”脱离具体的雇佣关系与阶级位置，被抽象为一种普遍的“关爱”价值时，其批判的锋芒便被钝化了。我们必须进行精确的范畴界定：“情感劳动”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恰恰是在情感被资本标准化、商品化、监控与考核，劳动者彻底丧失对其情感表现的自主调控权之时。这标志着资本对劳动力的殖民已深入至最内在的情感与感受性领域，是对“劳动力生产掌控能力”在情感维度的公然剥夺。与此同时，家庭内部无偿的再生产劳动，其压迫性绝非“自然”的性别分工，而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功能耦合的历史产物，它确保了雇佣劳动力（尤其是传统男性劳动力）得以被低成本、高效率地每日“修复”与“重置”。在这里，被剥夺的同样是（主要是女性的）对自身劳动力用于何处的掌控权。唯有将市场的直接情感剥削与家庭的无偿再生产压迫，统合在“社会总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这一政治经济学框架下，我们才能看清，它们是如何作为一套协同运作的系统，完成对生命能量的全面汲取。

当批判的视线转向技术领域，一种新的物化陷阱悄然浮现。部分对“平台资本主义”与“算法统治”的剖析[55]，在精彩揭露技术监控之网的同时，却不自觉地将算法或平台逻辑奉为具有自主意志的新的统治主体。这种技术决定论的倾向，无异于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资本手中的鞭子，却放过了挥鞭的手与驱使挥鞭的剥削意志。算法并非天外来客，其特定的统治形态——极致的劳动分解、实时的行为调度、全面的数据提取——是由资本对剩余价值最大化、过程控制精确化、劳动力再生产可规划化的内在需求所直接塑造的。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数字时代的技术性对象化与架构性凝结。因此，平台算法对劳动过程的精密编程，绝非“技术的暴政”，而是资本对劳动者“过程主导权”的剥夺借助新技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与广度；而用户数据被无偿资本化，则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剥削性积累：劳动者在“生活”的同时，持续生产着用于深化未来剥削的生产资料。反对算法不公的斗争，其本质绝非简单的伦理呼吁，而是“围绕数字生产资料（算法、数据、平台）的实际控制权，以及由此衍生的对劳动力生产数据与过程的所有权而展开的阶级斗争”。

（三）告别贫困：以政治经济学锚定批判理论的解放航向

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所谓“贫困”，并非其范畴与工具的失效，而是它被一场理论繁荣的迷雾所暂时遮蔽。当批判在文化心理的星丛与技术迷宫中流浪得筋疲力尽时，它终将意识到，自己力量的引力中心从未改变——那依然是关于谁在劳动、谁在占有、谁在决定生命活动以何种形式被组织与再生产的古老诘问。

我们的探索，便是一次重返此一根源的努力。我们坚信，在数字资本主义所有炫目的中介与表象之下，跃动的依然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冰冷心脏：一切价值与权力的源泉，是活劳动[25]；一切统治形态的演变，都是对劳动支配形式的历史

性深化。所谓生命政治，不过是这一支配逻辑在当代完成其全域殖民时，所必然披上的又一袭外衣。

因此，“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这一纲领，其激进性正根植于此：它不满足于在资本精心编程的生命矩阵中争取更佳的个体参数，它要求的是重写整个系统的底层代码，并基于联合劳动者的民主意志，重新设计生命生产与再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这需要的，不是更多关于牢笼花纹的精致哲学，而是重返政治经济学那敢于从生产关系根部构思解放的、最彻底的革命想象力。

唯有经过这种毫不妥协的根源性洗礼，批判理论才能真正告别其悬浮的贫困，重获那种能够刺穿表象、撼动根基的，丰沛而坚韧的力量。

结语：在历史辩证法中迈向人的解放

当资本的逻辑将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全面殖民，当教育、工作、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沦为价值提取的场域，人类解放的命题便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迫切性与深刻性。我们循着历史的轨迹溯源，以“劳动力商品化”为贯穿始终的核心线索，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掌控能力—生产完整性—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的三元辩证联动框架，层层剖析了资本从“占有物”到“殖民生命”的升维统治，重构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剥削形态，并最终勾勒出“两阶段革命+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的解放纲领。这一路的理论探索，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深化，更是对全球劳动者普遍生存困境的回应与解答。

资本的统治从未停止自我革新。从工业时代的工厂规训到数字时代的算法治理，从实体生产资料的垄断到生命过程的全方位殖民，其支配形式日趋隐蔽、精密，但其剥削本质与阶级对立的内核从未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对劳动力商品化的生存依赖，与资本对劳动力生产的私人掌控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其无法自我消解的致命悖论。这一悖论既催生了“ALICE 阈值”下的生存危机，也孕育着反抗的潜能——当劳动者的“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被系统性剥夺，当异化渗透至生命的每一个维度，革命便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成为打破这一恶性循环的唯一出路。

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突进，而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辩证统一。政治革命以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占有，为解放奠定不可动摇的制度前提；社会革命则以废除劳动力商品化为核心，在教育、健康、时间、发展等关乎人自身的领域重塑自主性，让劳动者真正掌控自身的生命过程。这一事业既要立足民族国家的具体土壤，深入分析本国的社会矛盾、阶级结构与历史传统，制定符合国情的革命策略；又要坚守世界性视野，通过国际联合突破资本的全球统治网络，让局部的解放斗争成为全球解放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是对抽象真理的教条践行，而是在具体历史实践中不断调适、丰富的动态过程；不是对未来社会的精准预设，而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可能性的勇敢探索。

从资本原始积累的暴力剥夺，到数字时代无孔不入的全景监视，人类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下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异化历程。但历史的辩证法始终昭示：资本的统治越深化，其内在矛盾便越尖锐，解放的潜能便越充沛。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本质上是夺回人的“生命主权”，是将人从“劳动力商品”的宿命之中彻底解放出来，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伟大跨越。

这一解放之路注定漫长而复杂，它需要理论的持续革新，更需要实践的勇敢探索；需要阶级意识的觉醒，更需要集体行动的凝聚；需要立足当下的脚踏实地，更需要面向未来的坚定信念。但只要资本的剥削存在一天，只要人的异化尚未终结，这场关乎人类尊严与未来的革命便不会停歇。当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挣脱资本的编程与规训，在民族与世界的双重维度上联合起来，当“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成为全球劳动者的共同行动纲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共同体，终将从理论愿景变为现实。这是历史的必然，是资本逻辑自我否定的最终结局，更是人类文明迈向更高阶段的未来方向。

附录

历史定点论

——我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在历史的长河中，所有试图进行总体批判的理论，都容易被扣上同一顶帽子：线性论、决定论、目的论、简化论。

这套指控的语言如此娴熟，以至于它几乎成了理论界的“条件反射”——只要有人试图揭示历史的运动规律，就会被指责为“用一条线剪裁复杂的历史”；只要有人断言某种历史必然性，就会被嘲讽为“预言家的算命把戏”；只要有人提出超越资本主义的构想，就会被警告“警惕宏大叙事的陷阱”。

我们的三本书——《资本的当代升维》《双重视阈》《只有一个源泉》——自然也必然无法逃脱这种指控。批评者告诉我们：你们描绘了一条从“生产资料掌控权的丧失”到“生产完整性的瓦解”再到“劳动力生产掌控权的殖民”的线索，这是典型的线性叙事；你们断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导致革命，这是典型的历史决定论；你们构想两阶段革命纲领，这是典型的目的论。

这套指控看似锋利，实则建立在一个根本的误读之上：他们把“逻辑的层次”当成了“历史的线性”，把“必然的节点”当成了“预定的轨道”。

为此，我们必须进行一场辩护——不是为我们的理论辩护，而是为一切试图揭示历史规律的总体批判辩护。

一、被误读的马克思

这种误读由来已久。早在马克思在世时，就有人把他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曲解为“一切民族必须走的道路”。马克思本人愤怒地回应：

“我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56]

这段话写于 1877 年。一百五十年过去了，同样的误读仍在继续。

人们把马克思的“两个必然”[57]理解为一种预言：资产阶级必然在某年某月某日灭亡，无产阶级必然在某时某地某刻胜利。他们用 20 世纪社会主义的挫折、用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用苏联的解体，来“证伪”这个预言。

但他们忘了，马克思在同一篇序言中还写下过“两个决不会”：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8]

这哪里是线性决定论？这恰恰是在说：历史的必然性是有条件的，是取决于生产力发挥程度的，是取决于物质条件成熟与否的。

马克思还说过：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59]

这哪里是宿命论？这恰恰是在说：历史的节点是绕不开的，但路径的选择权在人的手中。

那些用“历史复杂性”来否定一切历史规律的人，从来没有认真读过这些文本。他们驳倒的是自己头脑中那个被篡改的“马克思”，而不是马克思本人。

二、什么是“历史定点”

为了澄清这种误读，我们提出“历史发展定点论”。

所谓“定点”，是指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必然决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法绕过的关键节点。

这个概念包含三个层次的规定：

第一，必然性。 定点不是偶然的，不是任意的，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根植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在逻辑。只要矛盾存在，它就会推动历史向这些定点运动。正如“资产阶级必然灭亡”这个定点——只要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在对立，这个定点就迟早会被历史撞上。

第二，节点性。 定点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个具体的、可以指认的“点”。政治革命是一个定点，社会革命是另一个定点。在这些点之间，是漫长的、曲折的、充满偶然性的历史路径。

第三，绕不开的历史性。 定点是历史必须经过的关口。一条大河可以从不同的支流汇入，可以在峡谷前绕行——但只要河水还在流淌，它就一定会遇到那些地质运动早已决定的峡谷，并且必须穿过它们。

定点不是“终点”——穿过一个定点之后，历史继续流淌，新的矛盾展开，新的定点在前方等待。

定点不是“目标”——它不是我们“设定”的，而是我们“发现”的。它不是“应当如此”，而是“必然如此”。

定点不是“路线”——它不规定“怎么走”，只规定“必须经过哪里”。

定点与路径的关系，可以凝练为一句话：定点不变，路径可变；定点必然，路径偶然；定点统一，路径多元。

三、辩证法的证明

有人会问：你说“必然”，又承认“偶然”，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这正是辩证法的精髓。

首先，必然性不是通过一条笔直的大道实现的，而是通过无数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十月革命的必然性，通过列宁回国那趟密封列车的偶然来实现；中国革命的必然性，通过长征路上一次次偶然的抉择来实现。必然性没有取消偶然

性，恰恰相反，它必须借助偶然性才能成为现实。

其次，在任何历史节点，都存在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可能继续发展，也可能陷入危机；革命可能爆发，也可能被镇压；社会主义可能胜利，也可能遭遇挫折。这些可能性同时存在，相互竞争。历史的定点，就是这些可能性中那个“最终会被矛盾运动迫使历史选择”的选项。但它不会自动实现——它需要人的斗争、人的选择、人的牺牲。

最后，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对内容有巨大的反作用。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是“内容”，如何灭亡是“形式”。内容统一，形式多样。用内容的必然性否定形式的多样性，恰恰是背叛了辩证法。

四、对“20 世纪挫折”的回答

那些用 20 世纪挫折来“驳倒”马克思主义的人，需要听到以下回答：

社会主义没有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胜利——这驳倒了什么？它只驳倒了“革命必须首先在发达国家爆发”[60]这个具体判断，并没有驳倒“资产阶级必然灭亡”[57]这个历史定点。定点论告诉我们：定点必然，但路径开放。社会主义可以在俄国首先胜利，可以在中国首先胜利——只要它胜利了，就证明这个定点已经出现。

资本主义通过福利国家、技术革命、全球化续命——这驳倒了什么？它只驳倒了“资本主义明天就会灭亡”的幼稚预言，并没有驳倒“资本主义最终必然灭亡”的历史判断。马克思早就说过：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58]。资本主义还在“容纳生产力”，但这不等于它永远都能这样。每一次缓和都为下一次危机埋下伏笔。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驳倒了什么？它只证明了：社会主义这个定点，即使实现了，也有可能失去。定点论从不承诺“一次胜利，永远胜利”。它只承诺：只要资本主义的矛盾还在，社会主义这个定点就始终是人类历史的可能选项。苏联的失败，是特定路径的失败，不是定点的取消。它恰恰提醒我们：穿过一个定点之后，新的定点在前方等待。苏联的悲剧，在于它以为穿过的第一个定点就是终点。

历史不会因为路径的曲折而取消定点，正如河流不会因为绕过一个弯就取消大海。

五、辩护的结论

我们的理论，从来不是画一条历史的轨道，而是指出那些历史无法绕过的星辰。

水手航海，需要星辰指引。星辰告诉他：你必须朝着这个方向走，你必须经过那个纬度。但星辰不告诉他：途中会遇到多大的风浪，会在哪个港口停靠，会和哪些海盗相遇。星辰只是定点，路径在他手中。

我们之前提到的三本书，就是希望成为这样的星辰指引。

《资本的当代升维》指出了三个定点：资本必然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深入到对劳动力生产过程的殖民，第一、二阶段革命的必然到来。

《双重视阈》指出两个定点：工作流域剥削链和生活流域剥削链必然形成闭环，劳动者的全部生命时间必然被纳入剥削的轨道。

《只有一个源泉》指出一个定点：无论技术如何演进，活劳动永远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至于从当下到这些定点之间有多少条路，哪条路走得通，哪条路走不通——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需要知道。

因为那是水手的事，不是星辰的事。

敌人可以嘲笑我们不知道具体怎么走。但敌人无法否认：无论怎么走，都必须经过那些定点。

这就是“历史发展定点论”的全部秘密。

它不承诺路径，只承诺节点。

它不提供地图，只提供星辰。

它不保证一帆风顺，只保证：只要矛盾还在，那个定点就一定会被历史撞上。

至于撞上之后是粉身碎骨还是乘风破浪——取决于每一个处于历史发展中的我们。

资本逻辑与解放路径辩论

附录说明

为更清晰地呈现本书核心论点在现实话语场中可能遭遇的挑战与辩驳，作者与人工智能(体制辩护者)模拟了这场脱离纯学术语境的思想交锋。它并非真实发生，却力求逼近观念斗争的本质。这场辩论最终没有分出胜负，但其间的激烈碰撞所具有的思维激发性，促使作者决定将其别录于此，作为正文理论的一种动态注脚与延伸思考的催化剂。

体制辩护者：

“感谢这位作者的精彩发言，您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却又无比熟悉的末日图景。是的，我们都有压力，都感到倦怠。但将这一切归结为一个名为‘资本’的庞然大物在对我们的生命进行‘殖民’，这是否是一种过于宏大的、甚至有些懒惰的叙事？”

“您谈到教育、工作、生活的全面编程。但我想问在座的年轻创业者、自由职业者、通过慕课学习新技能的普通人：你们感受到的是‘殖民’，还是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当算法为您推荐下一份可能热爱的工作，当平台让您能向全球提供服务，这难道不是一种‘赋能’吗？您将技术带来的复杂性与自由，简化为了单向度的‘控制’，这是否在否认人的能动性？”

“更让我担忧的是您的解决方案——‘夺回掌控’。这个词听起来很美，但历史告诉我们，所有试图‘彻底夺回’的乌托邦工程，最终都走向了新的、更僵化的控制。您指责算法不民主，但您设想的‘对劳动力生产的民主掌控’，由谁来设计？谁来执行？难道不会是另一个更庞大的官僚算法系统吗？您对旧世界的批判无比锋利，但您许诺的新世界，只是一个空洞的、可能更危险的符号。”

“最后，我想说，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场针对抽象‘资本’的总体革命，而是务实的、具体的改革：立法保障数据权利，完善失业救济，推动终身学习。这些改革不浪漫，但它们在切实地改善人们的生活。而您的理论，恕我直言，更像是一种哲学上的悲观主义，它无法为在座的任何人提供明天如何更好地工作、生活的答案。它将我们所有人都描绘成了无力反抗的受害者，但我相信，人类的故事，从来不是这样的。”

作者：

“是的，这位先生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无比现实、触手可及的利益蛋糕。但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事情真的如他描述的那般表象、那般简单吗？”

“我想，在座的各位，尤其是青年朋友，想必都曾感到过莫名的空虚——想休

息时，心底却翻涌着无来由的无力感。确实，资本太过宏大，宏大到我们难以察觉它的任何一次运作；资本又太过聪明，聪明到它不仅懂得与人们分享残羹剩饭，还会刻意制造虚假的‘生产完整性’，让劳动者误以为自己不是商品、不是附庸，而是拥有尊严的独立个体。但这种感觉终究是虚假的，是资本精心编织的幻象。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份‘残羹剩饭’看似愈发丰盛诱人，可本质仍是被剥夺后的剩余；它所施舍的‘生产完整性’再显真实，归根到底也是为了深化统治而进行的策略性让步。”

“同志们，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梦想吗？有几人真正将它坚守到了今天？而这些梦想胎死腹中的第一道阻碍，又有哪一个不是源于‘不好就业’没出路’的现实考量？这难道不是资本对人的尊严最赤裸裸的践踏吗？”

“没错，我们如今确实能吃饱穿暖，但精神世界却在遭受持续的侵蚀与践踏。我们是人，而非牲畜——牲畜可以用精神与尊严换取物质的充盈，但人，必须追求精神与物质的协调统一。一条狗或许会因主人换了个金饭碗而欣喜，但作为人，面对这样的‘恩赐’，我们必须认清其本质，并以最坚决的态度予以革除。”

体制辩护者：

“感谢您充满激情的回应。您谈到了梦想、尊严和精神生活，没有人能否认这些价值的重要性。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应该警惕，不要被一种怀旧式的浪漫主义所误导。”

“您说童年的梦想被‘就业出路’扼杀。但请想一想，前现代社会，一个农民的儿子梦想，难道不被‘土地’和‘出身’扼杀吗？一个中世纪工匠女儿的梦想，难道不被‘行会’和‘性别’扼杀吗？问题不在于‘资本’，而在于任何社会都必须面对的稀缺性与分工现实。现代社会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至少提供了流动的渠道（比如教育），而不是将人固定在生产完整性的幻觉中永远贫穷！”

“您将我们丰盛的物质生活称为‘残羹剩饭’。我很好奇，您是否愿意放弃这一切——您的智能手机、便捷的医疗、全球流通的知识——回到一个您所谓的‘完整性’但物质匮乏的时代？这不是人与狗的选择，这是文明与蒙昧的选择。我们是在用一部分自主性，换取前所未有的安全和繁荣，这是一个理性的社会契约。”

“最后，关于尊严。真正的尊严不是来自对生产过程的虚幻掌控，而是来自法律保障的权利、社会福利的安全网、以及通过努力获得成功的可能。我们正在不断完善这些制度。而您提供的，只是一种对失去的‘完整性’的伤感，和一个可能摧毁现有文明成果的、充满不确定性的革命承诺。理性要求我们改良，而非毁灭。”

作者：

“不得不说，你很擅长愚弄群众！当你指责我的观点是‘怀旧主义’时，你自己又何尝没有陷入怀旧的误区？你频频列举农民、古代手工业者的生存状态，这难

道不是一种刻意的怀旧？你用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条件，与现代物质充盈时代的群众生活做对比，本质上是在转移矛盾、架空理论。这种怀旧主义更显恐怖，因为它的怀旧是为了更好地愚弄人民。”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确实带有一种‘怀旧’的底色，但也正是这种‘怀旧’，让人民群众第一次看到了当家作主的希望，第一次懂得了为自身利益而斗争，第一次摆脱了统治者的话语垄断，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表达。”

“当你问我是否愿意放弃科技发展带来的便利，回到曾经‘生产完整性’尚存的古代时，便暴露了你不愿正视未来趋势、不敢面对矛盾运动结果的本质——你只能用这种拙劣的诘问，来支撑自己的论点。”

“我们所追求的‘生产完整性’，绝非个体层面的孤立完整，而是人民群众共享的公共生产完整性；我们对‘劳动力实际掌控能力’的追求，也绝不意味着要退回物质匮乏的过去。”

“你错了，你真的错了。你错误地将怀旧复古等同于彻底回归古代，但实际上，怀旧与复古的真正力量，在于用最本质、最不受干扰的核心逻辑，重新审视现实、提出发问。”

“最后你提到‘理性要求改良，而非毁灭’。那么我想问：什么是真正的改良？放任根本问题不管，只修改问题衍生的表面现象，这能叫改良吗？回避核心矛盾，只盯着表面滋生的‘浮油’清理，这能叫改良吗？当一栋大楼的根基已然朽坏，你却指责住户不去装修屋子，这难道就是你口中的改良？这样的‘改良’，本质上是在加速毁灭。而真正的改良，是筑牢大楼的根基，是拆除危房后重建新厦——唯有如此，才是走向毁灭的对立面，真正迈向发展。”

体制辩护者：

“您说要拆除根基有问题的大楼，进行彻底重建。蓝图很美好。但我想问在座的每一位：谁住在楼里？是您吗？是我吗？还是千千万万普通的劳动者、家庭、老人和孩子？”

“重建的过程，他们住在哪里？在您所说的‘过渡阶段’，他们的工作、收入、孩子的教育、亲人的医疗，由谁来保障？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任何宏大的‘重建’工程，其过程的代价，都是由最无力承受的普通人，用他们的生计、安全、乃至生命来支付的。”

“您指责我‘清理水面的浮油’而不解决污染源。我接受这个批评。但我的做法是：一边清理浮油，让水暂时能喝，一边研究更安全的净化技术，并寻找替代水源。而您的方案是：炸掉整个水库，并承诺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建一个更干净的。在您建好之前，所有人都会渴死。”

“这不是改良与革命的区别，这是‘对真实生命负责’与‘对抽象理念着迷’的区别。”

“是的，大楼根基有裂缝。但您的解决方案，不是去加固它，而是要点燃炸药。”

您说这是为了未来。但我必须说：任何不珍视当下具体生命的‘未来’，都是暴政的通行证。”

“我选择改良，不是因为我愚蠢到看不见问题，而是因为我恐惧——我恐惧于那些以‘未来’和‘本质’为名，却让当下生灵涂炭的‘伟大实验’。我的理性，正是对这种恐惧的清醒认知，和对每一个具体生命的卑微尊重。而您的勇气，或许只是尚未见识过真正的代价。”

作者：

“漂亮的诡辩，高明的威压。没错，大楼里住的正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这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科学社会主义时，便早已点明的彻底论断：无产阶级的革命，不仅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更要革除自身懒惰、庸俗的劣根性。”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愚弄人民的资本主义改良最本质的区别——我们不追求止痛药带来的短暂安宁，也不愿用回避本质的话术粉饰根本问题。我们要追求真理，更不畏惧向自己挥刀革新。”

“回到‘大楼’的问题上：我们在爆破危楼之前，必然会先打扫干净屋子，以最小伤亡为目标完成全员撤离。而你所推崇的‘粉饰太平式改良’，不过是让人们在摇摇欲坠的大楼里肆意活动——当大楼最终倒塌时，你的改良之路上早已挤满了无辜的牺牲者。而当我们的爆破正式启动时，这座大楼里，只剩下那些顽固不化的守旧者与愚昧的既得利益维护者。”

金句汇编

（一）核心论断

1. 资本的支配逻辑，已经完成了其决定性的“升维”，从对“生产领域”的垄断，扩张为对“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全过程”的系统性殖民。
2.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已表现为“社会化大生产对劳动力商品化的系统性生存依赖，与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全过程的资本主义私人掌控”之间的致命悖论。
3. 我们构建了剖析当代支配形式的核心手术刀：“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掌控能力-生产完整性-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三元辩证联动分析框架。
4. 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的存废程度，是判断劳动者异化深度与解放可能性的终极标尺。
5. 全世界致力于夺回自身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的劳动者们，联合起来！

（二）资本批判类

1. 我们所感受到的无力与烦躁，并非个性使然，而是资本逻辑在生命政治层面运作的客观效果；而你所渴望的自主与完整，也绝非空想，它必须通过对那种将人贬值为“劳动力商品”的全部社会经济关系的根本改造来实现。
2. 当代剥削已从“在生产过程中占有剩余价值”，升级为“在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全过程中塑造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
3. 生活场不再是工作的对立面或避难所，而是成为了一个没有围墙的工厂，一个永不落幕的生产车间。
4. 资本几千年的真正野心从来不是占有物本身，而是要通过对物的占有，获得对人的劳动力及其生产过程的支配权。
5. 资本通过将系统性的矛盾转化为个体生命层面的现象学体验与责任，成功地将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对抗，隐匿于心理学、成功学与技术乐观主义的浓雾之后。

（三）异化与解放类

1. 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本质上是夺回人的“生命主权”，是将人从“劳动力商品”的宿命之中彻底解放出来。
2. 生产完整性的瓦解并非终点，而是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发生根本性异化的症候。

3. 异化的链条在此完成闭环：劳动者不仅出售他的劳动时间，更在被迫出租他的创造力、他的情感、他的健康乃至他对于何谓“美好生活”的想象力。
4. 任何不旨在最终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的福利斗争，都可能在客观上成为延长资本逻辑统治寿命的帮凶。
5. 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必须包含两个不可分割的阶段：首先是政治革命，夺回生产资料，粉碎维护旧有生产关系的国家机器；其次是更为深刻的社会革命，目标直指“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
6. “先锋”的意义，从来不是由“成败”来衡量的。先锋的存在，根植于历史矛盾自身的运动逻辑，而非任何个体或群体的主观意愿。
7. 只要资本对劳动力生产的编程还在继续——只要教育仍然是“人力资本”的驯化，只要技能塑造仍然被就业市场绑架，只要年轻人仍然在被“未来出路”的焦虑驱策——那么，那些对这一编程感知最敏锐、对这一异化体验最切身的群体，就必然会站出来。
8. 他们的焦虑、迷茫、挣扎，本身就是资本逻辑在生命层面的展开形式。
9. 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这种展开必然外化为行动——哪怕是不成熟的、盲目的、注定失败的行动。
10. 潮汐不问浪花高度，地质运动不问岩石碎裂之处，历史只在乎矛盾是否存在。
11. 只要矛盾还在，浪就会涌；只要张力还在，石就会裂。
12. 失败，是矛盾积累的形式。遗忘，是矛盾换装的方式。

(四)历史与哲学类

1. 历史驳倒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线性化阉割。
2. 马克思在乎的是那些“不能跳过”的定点，而不是那些“必须走的路径”。
3. 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这就是历史辩证法的铁律。
4. 历史不是轨道，是指引星辰的航海。定点是星辰，路径在水手手中。
5. 敌人可以嘲笑我们不知道具体怎么走，但敌人无法否认：无论怎么走，都必须经过那些定点。
6. 苏联的悲剧，恰恰在于它以为穿过的第一个定点就是终点，于是停止了探索、停止了革命、停止了自我批判。
7. 历史不会因为路径的曲折而取消定点，正如河流不会因为绕过一个弯就取消

大海。

注释

[1] 劳动力商品化概念由马克思首次完成科学界定，其理论雏形体现于《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1—740页）；对“劳动”与“劳动力”的严格区分构成该概念的理论奠基，见于《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6—210页）；而其科学内涵、历史条件与理论体系的经典定型，则完成于《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205页，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第782—832页，原始积累与劳动力商品化的历史过程）。

[2] 资本原始积累的本质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强制分离，这一核心论断由马克思系统阐释，其经典论述见于《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81—832页“所谓原始积累”章节，其中第783页明确界定原始积累的本质，第784—790页以英国圈地运动为例分析其具体实现形式，第819—832页论述殖民掠夺、奴隶贸易等海外原始积累手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进一步补充了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关联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3—389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则结合历史事实深化了对原始积累暴力性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174页）。

[3]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84—790页）“所谓原始积累”章节中，以英国圈地运动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典型例证，详细论述了地主与新贵族如何通过立法与暴力手段剥夺农民土地，将公共土地与份地转化为私人牧羊场，迫使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沦为只能出卖劳动力的“自由”无产者；英国史学家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5—52页）中，进一步补充了圈地运动中农民流离失所的社会史细节。

[4]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19—832页）“所谓原始积累”章节中，深刻剖析了海外殖民掠夺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指出殖民扩张、奴隶贸易、鸦片贸易等方式为欧洲资本主义积累了巨量金银与原

始资本，揭示了殖民掠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内在关联；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174页）中进一步补充了殖民掠夺的暴力本质，阐明其对殖民地经济的破坏性与对欧洲资本积累的推动作用；埃里克·威廉斯在《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陆梅林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6—78页）中，则从经济史视角具体论证了奴隶贸易与殖民掠夺对欧洲原始资本积累的实际贡献。

[5]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200页）“货币转化为资本”章节中，明确阐释了劳动力“自由”的双重性内涵——劳动者既摆脱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成为法律上的自由人，又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这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前提条件；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7—212页）中，进一步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分析了这种“自由”状态的形成与资本原始积累的内在联系；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3—385页）中，则结合英国社会实际，具体描述了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自由得一无所有”的生存境况，印证了马克思的理论分析。

[6]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210页）“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章节中，阐释了劳动力商品化催生雇佣劳动关系的核心逻辑，指出劳动者出卖劳动力后，劳动的目的从生产使用价值转向换取工资，劳动过程的支配权也让渡给资本；在该卷第211—220页“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章节中，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生产资料向资本的转化，明确雇佣劳动关系下生产资料的职能从服务于个人劳动消费，转变为作为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本质——以支配他人劳动、剥削剩余价值为核心，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3—682页）“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章节中做了系统论证；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295页）中，还从纲领批判的视角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内在关联的分析，印证了从原始积累到劳动力商品化再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的历史与逻辑链条。

[7] 本文提出的“三元辩证分析框架”理论初现于笔者预印本成果《生产完整性与实际掌控力：破解财富分层范式的阶级分析新路径》（Zenodo, 2025-10-31, DOI: 10.5281/ZENODO.17492460），发展于《重归生产场域：基于“生产完整性”与“实际掌控力”的异化理论重构与批判》（Zenodo, 2025-12-21, DOI: 10.5281/ZENODO.18005399），成型于《生产完整性与劳动力生产掌控能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重构（以数字资本主义为视角）》（Zenodo, 2025-12-24, DOI: 10.5281/ZENODO.18044966），并在《无产阶级解放的新路径——夺回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Zenodo, 2026-01-03, DOI: 10.5281/ZENODO.18136564）中得到初步应用。【第一章第二节论述直接引自《生产完整性与劳动力生产掌控能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重构（以

数字资本主义为视角)》，为适配本文研究主题，仅做了局部表述调整。】

[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

[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90页。

[10] 阶级分析的理论雏形，最早见于笔者预印本成果《生产完整性与实际掌控力：破解财富分层范式的阶级分析新路径》(Zenodo, 2025-10-31, DOI: 10.5281/ZENODO.17492460)，彼时框架尚属初步构想，核心范畴与辩证逻辑未臻完善。本书本节立足该雏形，引入三元辩证分析框架对其进行系统性升维与重构，通过夯实生产完整性、实际掌控力、劳动力再生产的辩证关系，修正原理论对数字资本主义场域阶级分化阐释的局限，最终形成兼具历史深度与现实解释力的分析体系。

[11]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页)中，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为核心依据，明确界定资产阶级为“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为“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32页)“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章节中，进一步揭示生产资料与劳动的分离、集中趋势是资本主义阶级固化的深层经济根源，论证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下阶级对立的必然性；在《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0-335页)中，马克思系统阐明生产资料占有差异决定阶级属性的内在逻辑，指出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工人对劳动力的出卖，构成了阶级关系的核心内容；而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0-1001页)“阶级”章中，马克思更基于生产要素占有关系，提出单纯劳动力所有者、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三大阶级的划分框架，完善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的理论体系。

[12] 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926-939页。

[13]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8-369页)中揭示了单个资本家为追求超额剩余价值而展开的竞争，与资产阶级整体维护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内在矛盾；在该卷第831-832页中进一步阐明，这种个体与整体的矛盾本质上是资产阶级阶级局限性的体现。

[14]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

社 1991 年版，第 5-9 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1 页）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时代的鲜明特点是阶级对立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直接对立的阵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43-744 页、第 832 页）“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章节中进一步论证，资本积累的进程必然造成财富与贫困的两极分化，中间阶层不断被分化瓦解，最终推动社会向两大对立阶级演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70 页）中则重申了这一规律，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将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进而催生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力量。

[16]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1-45 页）中，首先从经济地位出发，指出无产阶级因彻底丧失生产资料、受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性；而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会与封建势力妥协，表现出动摇性与妥协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78-385 页）“协作”章节中进一步揭示，大工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将无产者集中在同一生产场所，不仅创造了共同的阶级利益，更锤炼了其组织性与团结性，直接塑造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力；列宁在《怎么办？》（《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17-320 页）中强调，这种生产组织带来的阶级自觉，只有在先进政党领导下才能转化为革命实践。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9 页）中结合中国实际，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因其分散的生产组织形式与经济地位的不稳定性，天生具有动摇性与妥协性，而无产阶级的集中化生产则强化了其革命性。

[17] “打工人”，是一个在理论层面用于描述信息技术革命初期，在第三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中形成的、尚未完成彻底内部阶级分化的新型产业工人群体。他们与工业无产阶级共享着不占有生产资料、出卖劳动力的阶级本质，但其劳动对象（数据、知识、平台）与形式（脑力劳动）具有时代特殊性。由于该产业形态尚不成熟，其阶级结构呈现出显著的过渡性与模糊性，“打工人”这一概念正是对处于这一特殊历史阶段、兼具“形式上的高掌控能力”与“实质上的系统性依附”这一普遍矛盾群体的一次战略性的理论界定。

[18] 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95-105 页。

[19]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4-315 页。

[20] 本节的核心框架，最早见于笔者预印本成果《生产完整性与劳动力生产掌控能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重构（以数字资本主义为视角）》（Zenodo, 2025-12-24, DOI: 10.5281/ZENODO.18044966）。本书本节基本沿用该预印本的核心论

断，仅对部分逻辑细节进行微调，并补充了外卖骑手、数字创意工作者等当代特殊案例，以增强理论的现实说服力。

[2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230页、第378-385页。

[22] 本节的理论雏形，最早见于笔者预印本成果《重归生产场域：基于“生产完整性”与“实际掌控力”的异化理论重构与批判》（Zenodo, 2025-12-21, DOI: 10.5281/ZENODO.18005399）。该早期研究仅构建了“生产完整性-实际掌控力”的二元分析工具，未形成完善的三元辩证分析体系。本书本章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化与拓展，将“劳动力生产再生产”维度纳入分析框架，发展为三元辩证体系，并对原始逻辑进行了补充与完善，使理论具备更强的系统性与现实解释力。

[2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2-65页。

[24]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核心论述见于两处文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2-875页）中，明确界定这一矛盾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对立，并论证其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43页）中，则从阶级对立视角阐释该矛盾的外在表现，指出其必然导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并推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变革。

[25]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60页、第225-230页）中明确指出，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者的活劳动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与价值增殖的活性力量。

[26]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1-35页）中强调，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劳动力的商品化不仅是剥削的起点，其再生产过程（教育、健康等）也日益成为资本争夺的场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21-630页）中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条件，揭示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持续维系的关键作用。

[27]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205页、第225-230页）中指出，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其价值由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其使用价值（劳动）却能创造出超过自身价值的新价值，这一矛盾正是资本主义剥削得以实现的根本前提。

[28] 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蒂斯：《美国：教育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王佩雄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40 页(该理论为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批判的核心论点)。

[29]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Public School District Finance Data: 2021–2022 (2023).

[30] Raj Chetty et al., Mobility Report Cards: The Role of Colle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2017), Harvard University Opportunity Insights.

[31] 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 Pub. L. No. 114-95, 129 Stat. 1802 (2015).

[32] Education Act 2002, c. 32 (UK).

[33] OECD,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2022 Results (2023).

[34]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Household Debt and Credit Report: Q4 2023 (2024).

[35]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8-57 页。

[36] 皮埃尔·布迪厄、让-克洛德·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 2022 年版，第 22-68 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66 页)中，首次明确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路径，公开宣称“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确立了暴力革命作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2-153 页)中，基于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深化提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的重要论断，补充了暴力革命需“打碎旧有国家机器”的关键实践逻辑；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1-45 页)中，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结合俄国革命实践明确“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系统论证了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在关联，将理论转化为具备可操作性的革命策略，由此形成马克思

列宁主义暴力革命理论从原则确立到实践深化再到策略完善的完整逻辑体系。

[38] 旋转门制度：指美国政界与商界、游说集团之间的人员双向流动现象。政府官员离职后常进入企业或游说机构任职，利用其政府人脉为资本服务；同时，企业高管或职业说客也常被任命为政府官员，将资本的利益直接带入政策制定过程。这一机制是资本通过人事渗透来影响和掌控政治的典型方式。

[39]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1 页）中，在工业资本主义图景下明确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最坚实、最先进的主体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7 页）中，指出无产阶级因丧失生产资料而“自由得一无所有”、被迫出卖劳动力。

[40]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83 页）中，阐明大工业生产塑造了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与协作精神；在第 251 页论证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因剩余价值剥削形成不可调和的根本对立。

[41]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62 页）中，提出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最广大的同盟军，在封建残余浓厚的国度与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反帝反封建诉求，由此明确工农联盟构成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基础与力量源泉，形成“工人为先锋，农民为根基”的主体结构逻辑。

[4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2 页、第 47 页。

[43] 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44]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45]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阶级社会里一切政治权力与社会支配权的最终来源是私有制。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构成了权力得以产生、运行与维系的现实经济基础，统治阶级正是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实现对劳动力与社会生产过程的支配，并由此形成相应的政治统治与国家权力。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23 页；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1 页。

[46] 这里有必要与福柯式的权力观进行区分：福柯将权力视为弥散的、微观的、无主体的“毛细血管”，而本书坚持权力的阶级性与经济根源——权力的实质始终是对活劳动的支配权，其主体始终是特定生产关系中的统治阶级。

[47]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构成了本书劳动力生产组织安排委员会构想的理论源头。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48] Hakkı Tan, *The Negative Sovereignty Regime and Post-Lockdown State Theor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Damage Control Mechanisms Against the Ontological State*, 2026. 该文提出的“否定性主权”与“分叉式集团”等理论，为本书构建劳动力生产组织安排委员会的权力制衡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

[49] 罗伯特·米歇尔斯：《政党：现代民主制中寡头倾向的社会学研究》，参见其“寡头铁律”的核心论断：任何组织，无论其初始多么民主，最终都将走向寡头统治。

[50] 语出宋代欧阳修《论台谏官唐介等宜早牵复札子》：“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意谓对任何事情都要预先设立防范机制，对任何细节都要预先制定制约措施。

[5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8-929页。马克思将“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对举，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

[52]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安全、领土与人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53] 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24年版。

[54] 霍赫希尔德：《心灵的整饰》，成伯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55] 吴贵杰：《平台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与异化——以外卖骑手为例》，《马克

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6期。

[56]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58]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5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60] 这里是对“革命必须首先在发达国家爆发”这一机械线性观点的批判，这一观点曾在第二国际部分理论家（如考茨基）的论述中被教条化，可参见卡尔·考茨基《社会革命》，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